



中共玉门市委党史办 编著

中国共产党玉门历史

(1937—197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玉门市委党史办 编著

中国共产党玉门历史

(1937—1978)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共产党玉门历史：1937—1978 / 中共玉门市委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著.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17.6

ISBN 978-7-5098-4161-7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玉门—1937—1978 IV. ①D235.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8596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鸽子 陈红（特邀）
复 审：陈海平
终 审：李青建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酒泉市汇丰彩色印刷广告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字 数：192千字
印 张：24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4161-7
定 价：50.00元



中国最早的鸟类化石（国家一级古生物化石）在玉门出土，此为玉门甘肃鸟复原图。



数亿年前形成的玉门丹霞地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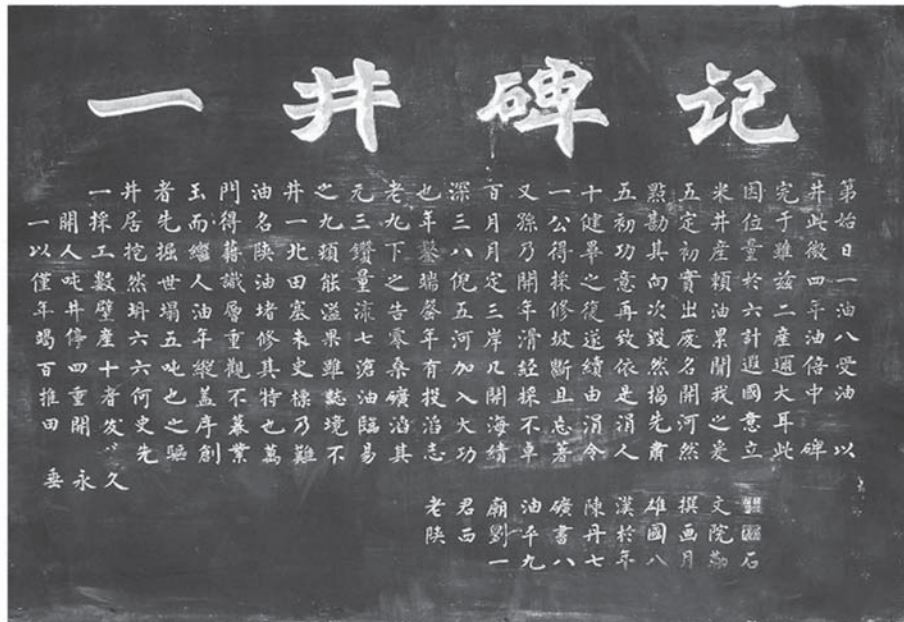
3700年前的火烧沟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和彩陶,可能是我国青铜器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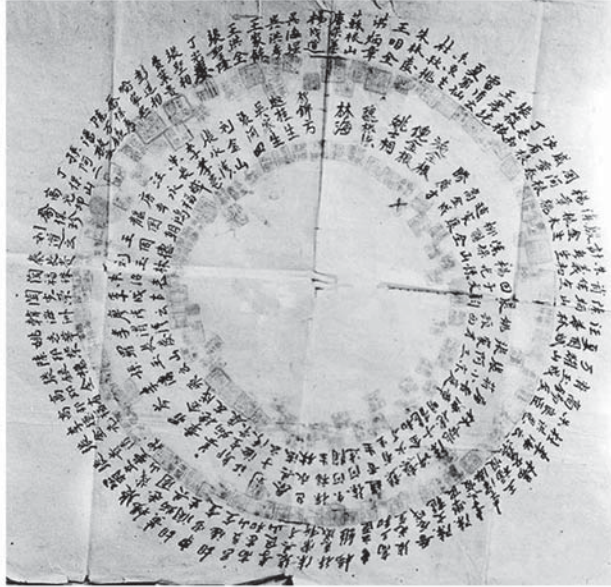
孙健初、韦勒、萨顿初来玉门勘探石油时见到的老君庙。玉门油矿开发之初即以此为名。



为了开发玉门油矿，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心协调下，调运了延长油矿的两部钻机，此为1939年3月运抵玉门的第一部顿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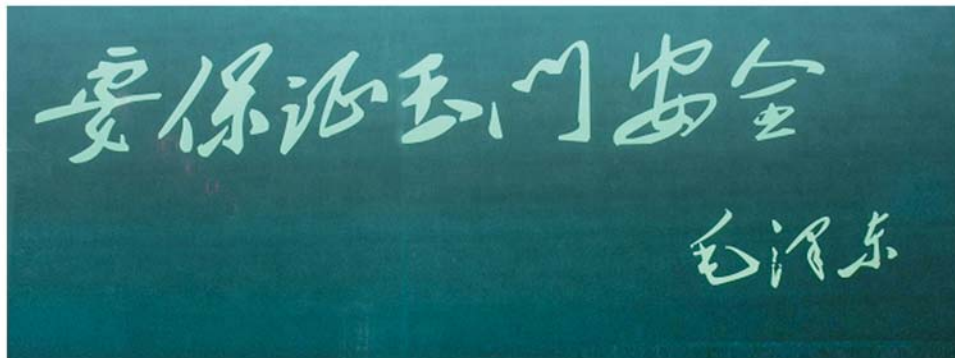
玉门油矿一井碑记。



1942年5月，玉门油矿数百名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36小时，油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获得胜利。图为罢工签名书。



1945年，玉门油矿建成了自己的运输系统，有汽车540辆。运输线南至昆明，西至乌苏，干线长5000余公里。图为老君庙汽车修理所在为汽车喷矿徽



1949年8、9月间，为了保证玉门油矿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毛泽东三次发出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



1949年9月25日-27日玉门人民喜迎解放。

玉門礦務局業餘學校高初採班第一期畢業攝影



1950年9月，玉門油礦職工業業學校開學，首批學員235名。圖為玉門礦務局業餘學校高初採油班第一期畢業合影。



1951年6月8日，玉門油礦抗美援朝分會發出捐獻“石油工人號”戰鬥機的倡議，15日，捐款總額達15.7億元（舊幣），超過購買一架戰鬥機的金額。圖為當時的捐款證書。



孙健初纪念碑



石油工程第一师列队接受检阅



1954年4月，全国石油系统第一支女子测量队在玉门油矿成立。1955年，该队被推荐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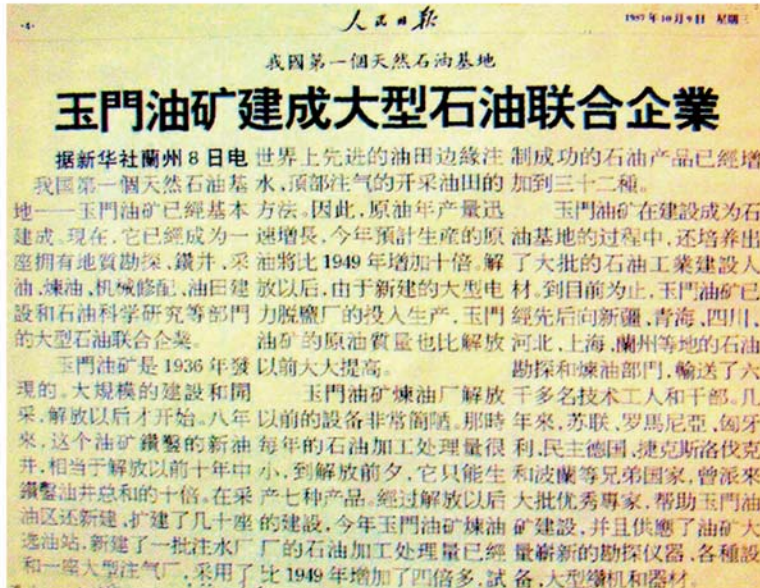
1956年7月1日，玉门原油首次用火车外运。



1956年12月下旬，叶剑英视察玉门。



1957年4月6日，邓小平视察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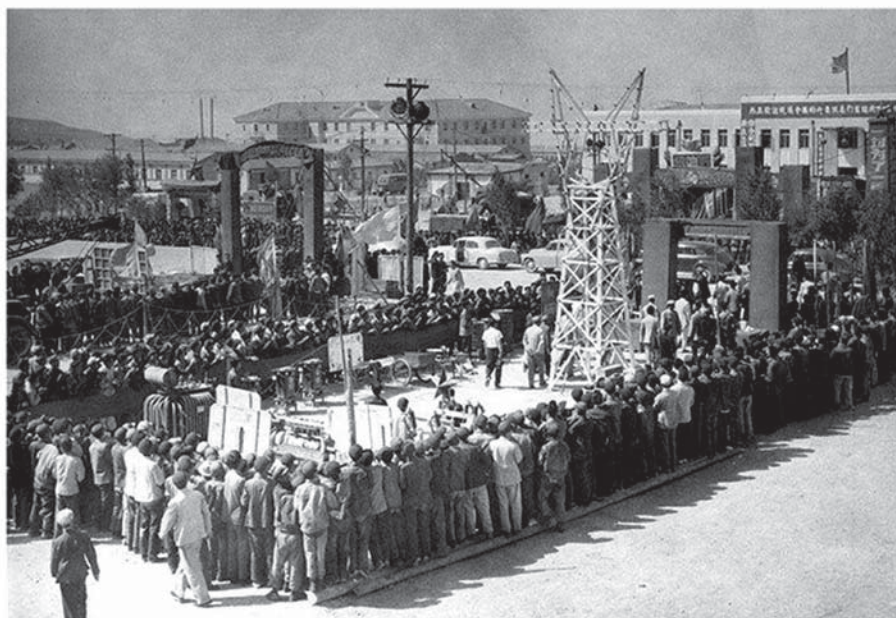
1957年10月8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 “玉门建成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1958年6月26日, 陈云视察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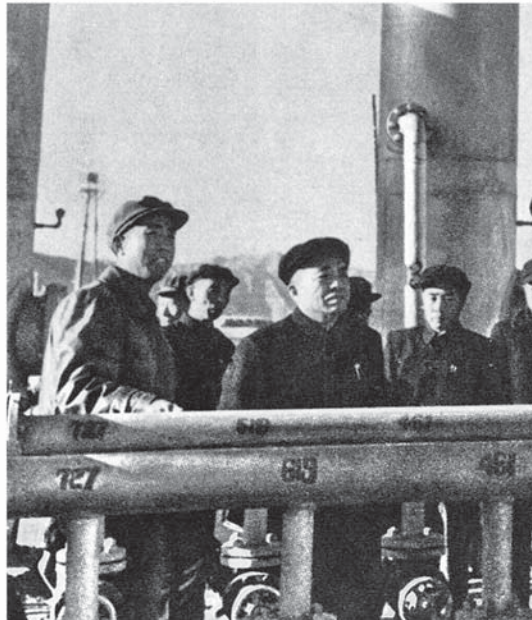
1958年7月9日，石油部在玉門召開全國石油工作現場會。



1958年7月15日，玉門油礦舉辦“技術革新展覽會”。



1958年7月15日，朱德视察玉门。



1949年10月8日、1958年10月25日，彭德怀两次视察玉门。



1958年12月，由周恩來親筆簽名，獎給玉門市赤金人民公社的獎狀。



王進喜1959年參加國慶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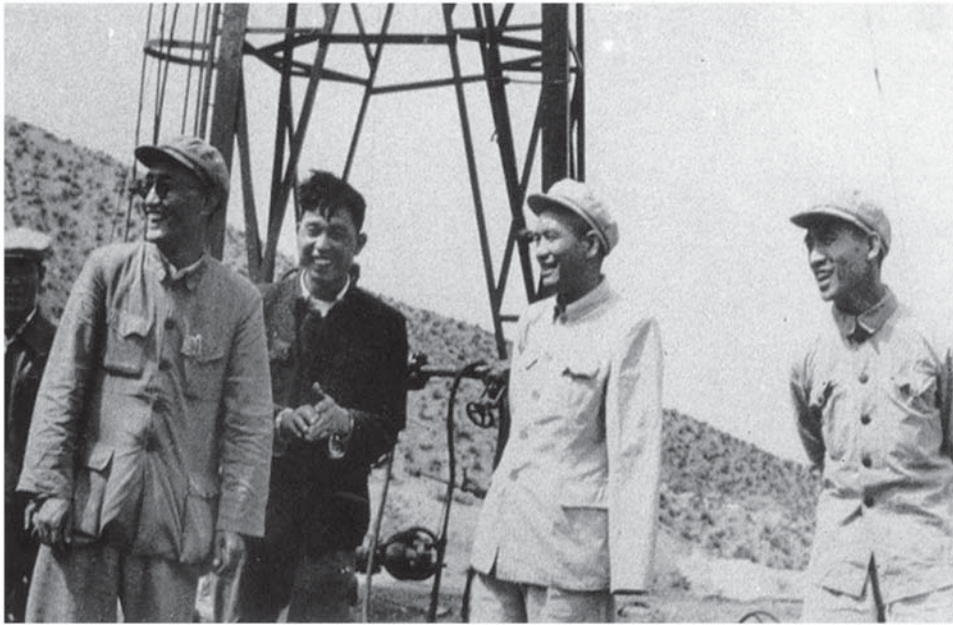
1963年12月, 聂荣臻视察玉门。



1958年修建的玉门赤金峡水库。



1969年4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与王进喜握手。



1961年7月5日，余秋里视察玉门。右二为余秋里，左一为康世恩。



1968年10月5日，玉门油矿首批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图为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



1956年12月4日，玉门油矿专家招待所建成投用。这是一座仿俄式建筑，后来改名为玉门石油管理局第一招待所。



1950年9月3日，王曰才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图为王曰才和他改进的电测仪器。



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6年3月3日，石油部授予玉门局802修井队、鸭儿峡油矿采油二队、炼油厂焦化车间为“五好红旗单位”，郭孟和、何全珍等为五好标兵。图为郭孟和。



1969年2月，老君庙油矿工人魏勤身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玉门油田组织的欢迎队伍。



七十年代欢迎上海知青来玉门工作。



早期的玉门文化宫。



做出突出贡献的玉门炼油厂。



七十年代的大寨田。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玉门历史》（1937—1978）遵循了“党史基本著作”的写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结合玉门各时期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章划块的编写体例。本书所写党史，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止，共5编、29章。概况单列于前。党史有别于政史，本书重点介绍党领导下的若干重大事件的情况，其它方面涉及较少或表述较简。

由于境内玉门油矿、农垦团场、四〇四厂的行政建置多次变化，玉门县、玉门油矿、农垦团场、玉门市又有合分和搬迁，表述上多有不便，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除在概况内对建置变化进行说明外，适当地地方加了注释。

首次出现的人物，以及不很普及的名词或事件一般加了注释。

对玉门油矿的情况表述有详略之分，合并之前和之中详写，分设之后略写。阅读本书时，需先了解玉门县、玉门油矿、玉门市的合分情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合赤金卫与靖逆卫，置玉门县，治所在今玉门镇^①；1955年3月，以玉门油矿为基础

^①最初的玉门县设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治所在今赤金镇，后县名、县治多有变化，直至乾隆二十四年重置，治所由赤金镇移至玉门镇。

单独成立了玉门市；1958年11月，玉门县并入玉门市；1961年12月，玉门市又与玉门油矿（时称玉门石油管理局）分设，玉门市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市至今。

农垦团场、四〇四厂只写了初建期，之后互无关联，未再涉及。

某些事件细节和资料，不属于正文内容，但考虑到有的读者有了解的愿望，故附于注释。注释均采用页脚注，便于查阅。为避免内容繁杂，影响读者对历史脉络的把握，某些内容单列于附录。

魏杰负责了工作统筹，撰写了第一编初稿，最后修改定稿，张主善撰写了第二、三、五编初稿，统筹了一、二稿，郎吉君撰写了第四编初稿。

写作过程中，玉门市委组织部帮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两次组织部分老干部对稿件进行了讨论，玉门市档案局、玉门油田档案馆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查阅档案提供了方便，李永祥、赵光亚、蒋代文、刘文斌、董天文、张怀德、张光俊等审阅了一稿或二稿，刘华庭审阅了第三稿，宋成鹏审阅了第四稿，中共党史出版社进行了三审三校，市委常委会做了最终审定。所有审阅人员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16年6月

目 录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玉门的活动

第一章 进步思想的传播和进步力量的发展	1
一、西路军血战河西	2
二、抗日思想的传播	3
三、两个地下党支部的隐蔽活动	5
四、油矿的工运斗争	10
五、“四五”事件	11
六、英勇护矿	15
第二章 玉门油矿对抗战的历史性贡献	20
一、国民政府决定开发玉门油矿	20
二、中共支持玉门油矿的开发	21
三、老君庙“一号井”出油	23
四、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24
第三章 迎接解放	27
一、毛泽东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	27
二、玉门油矿和平解放及实行军管	29
三、玉门县人民迎接解放	30

第二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第四章 新政权建设	33
一、玉门县委、县政府的成立及基层政权建设	33
二、玉门油矿的新政权建设	35
第五章 巩固新生政权的各项斗争	36
一、建党整党	36
二、减租反霸斗争	39
三、剿匪肃特斗争	40
四、镇压反革命	44
五、取缔反动会道门	48
六、整顿民兵农会，开展“内清”工作	49
第六章 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51
一、土地改革前夕玉门的农村形势	51
二、建立乡村农会组织	52
三、宣传贯彻《土地改革法》及新规定	52
四、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	53
五、土地改革的复查	59
六、抗美援朝运动	62
第七章 开展民主改革	65
一、玉门油矿的反把头 and 民主改革	65
二、禁烟、禁赌及清除卖淫嫖娼	67
三、宣传贯彻《婚姻法》	68
四、扫盲、学文化	69

第八章 “三反” “五反” 运动.....	71
一、玉门县的“三反” 运动.....	71
二、玉门油矿的“三反” 运动.....	73
三、城市工商界的“五反” 运动.....	73
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75
一、玉门县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75
二、石油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76
三、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76
四、作出突出贡献的石油师.....	78
五、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81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一次代表大会.....	81
第十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83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3
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
三、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7
四、粮食统购统销.....	87
五、玉门市的成立.....	89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89
七、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二次代表大会.....	90
玉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成就.....	92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第十一章 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94
一、学习好、宣传好党的八大精神.....	95
二、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玉门建成.....	95

三、兴修水利，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96
四、发展商业，保障供给.....	98
五、积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98
第十二章 国营农场的初步建立及移民、支边青年来玉门.....	103
一、国营农场建场前的基本情况.....	103
二、国营农场初期建制演变.....	104
三、国营农场军垦期建制演变.....	105
四、国营黄花农场.....	106
五、安置河南移民.....	107
六、天津、上海支边青年来玉门.....	109
第十三章 审干、肃反、整风运动及反右派斗争.....	111
一、审干工作.....	111
二、内部肃反运动.....	112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14
第十四章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19
一、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19
二、大跃进运动.....	120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	125
四、玉门县、市合并.....	128
第十五章 在曲折中艰难纠“左”.....	130
一、“左”倾错误的蔓延.....	130
二、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认识和纠正.....	131
三、从纠“左”转向反右.....	132
四、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133
五、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135
第十六章 抢救人命共渡难关，支援大庆油田.....	137
一、抢救人命.....	137

二、支援大庆油田建设	142
第十七章 贯彻“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肩负	
“三大四出”重任	145
一、贯彻“农业六十条”，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145
二、贯彻“工业七十条”	147
三、肩负“三大四出”重任	147
四、国营四〇四厂在玉门建成	148
第十八章 经济调整中的反复和曲折	151
一、贯彻调整方针	151
二、“左”倾思想再次抬头	153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55
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55
二、城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162
三、学雷锋活动	165
四、干部学习焦裕禄	167
五、李志歧培育“玉门一号”	168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169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成就	170

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对玉门的影响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	172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72
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运动	173
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串联	174
四、革命造反派的形成和行径	175

第二十一章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178
一、“三支两军”初步稳定了局势.....	178
二、革命大联合.....	179
三、市、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79
四、抓革命、促生产.....	180
五、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	181
六、广泛深入的“忠”字化运动.....	182
七、北京医疗队在玉门.....	182
第二十二章 备战、整党、斗批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85
一、掀起战备高潮.....	185
二、整党建党.....	186
三、清理阶级队伍.....	186
四、“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	187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87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188
第二十三章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89
一、工业学大庆.....	189
二、农业学大寨.....	190
第二十四章 批林批孔，落实党的政策.....	194
一、批林整风运动.....	194
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195
第二十五章 全面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
一、贯彻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197
二、整顿社会治安.....	198
三、整顿领导班子.....	198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199

第二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	200
一、隆重举行毛泽东悼念活动	200
二、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	201

第五编

拨乱反正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时期

第二十七章 揭批“四人帮”、整党和“一批双打”	203
一、打好第一个战役，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 的人民战争	204
二、打好第二个战役，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	204
三、打好第三个战役，搞好“清查”与整顿	205
四、开展整党整风和路线教育	207
五、开展“一批双打”斗争	212
第二十八章 贯彻十一大精神	214
一、学习十一大精神，庆祝“文化大革命”结束	214
二、热烈拥护邓小平再次复职	215
三、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215
四、积极纠“左”，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218
五、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20
第二十九章 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222
一、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222
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223
三、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贯彻四项基本原则	224
四、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	226

附 录

重要人物简介	228
王进喜与铁人精神	228
孙健初	253
康世恩	255
严爽	256
靳锡庚	260
杨拯民	260
王曰才	263
郭孟和	264
张复振	265
杨志范	266
历任（县）市委书记简介	269
玉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赵子尧	269
玉门县第二任县委书记——杜秉德	269
玉门县第三任县委书记——鲁 愚	271
玉门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刘长亮	272
玉门市第二任市委书记——程 浩	274
玉门市第三任市委书记——白云亭	276
玉门市第四任市委书记——鲁 愚	277
玉门市第五任市委书记——张朝干	277
玉门市第六任市委书记——罗世秀	278
烈士简介	280
国家表彰的先进人物	282

概 况

玉门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铁人”王进喜的故乡。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东临酒泉，西达敦煌，连霍高速、兰新铁路、兰新高铁、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管线横贯全境，自古以来是中原通往新疆和亚欧的重要通道。东西长114公里，南北宽112.5公里，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辖新老两个市区和九镇三乡^①，总人口18.9万人，有汉、回、蒙、藏、东乡等32个民族。地貌分为祁连山地、走廊平原和马鬃山地三部分，绿洲215.6万亩，戈壁855.9万亩，山地689.4万亩，荒地238万亩，绿洲地区海拔高度1200米—2400米，其中妖魔山最高，4587米，花海最低，1200米，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

玉门属大陆性中温带干旱气候，降水少，蒸发大，日照长，光能资源充足。年平均气温6.9℃，1月最冷，极端低温零下28.7℃，7月最热，极端高温36.7℃。年日照时数3166.3小时，平均无霜期135天。年平均降水63.3毫米，蒸发量2952毫米。年平均风速4.2米/秒，俗称“世界风口”，风力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疏勒河、石油河、白杨河和小昌马河，地表年径流量11亿立方米。主栽作物小麦、玉米，盛产人参果、韭菜、枸杞、葡萄、食葵、

^①分别是：玉门镇、花海镇、赤金镇、下西号镇、黄闸湾镇、柳河镇、昌马镇、柳湖镇、六墩镇、清泉乡、小金湾东乡族乡、独山子东乡族乡。

蜜瓜、辣椒、啤酒花、孜然等特色农产品。矿藏资源有石油、煤、石灰石、石膏、云母、石棉、硫磺、芒硝、重晶石、金刚石、食盐以及铁、锰、铜、金等。

玉门文物古迹众多，共有10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著名的玉门甘肃鸟^①（化石），为世界最早的今鸟之一；火烧沟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夏商时期东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晶；蜿蜒70公里的汉长城，让我们领略到汉武帝设关置郡、开拓西域的雄才大略；老一井则见证了中国石油工业起航的悲壮。

玉门自然景观独特，有著名的干海子候鸟自然保护区、南山自然保护区、昌马自然保护区三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有祁连冰川、丹霞地貌、硅化木地质公园、赤金峡水利风景区、铁人纪念馆、黄花胡杨林、清泉玫瑰沟、昌马月亮湾等景区。

抗战时期，为满足抗日战争对石油的需求，国民政府筹备开发玉门油矿^②。1939年，第一口油井出油，到1945年，共钻井26口。1939年至1959年的20年间，玉门石油产量始终占全国的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1938年6月，中华民国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汉口）。1941年3月，撤销筹备处，成立甘肃油矿局（重庆），设老君庙矿场等机构。1946年6月，成立中国石油公司（上海），甘肃油矿局改为甘青分公司，原地质室改为探勘处，驻老君庙。1949年9月25日，玉

^①由于发现于玉门，故称玉门甘肃鸟，有人写作甘肃玉门鸟是错误的。

^②1946年6月至1950年8月5日，官方对玉门油矿称为甘青公司，但人们习惯上称玉门油矿。

门油矿解放，随即实行了军管，由康世恩任军管会总代表，解放后仍维持原甘青分公司建制，并设中国共产党甘青分公司总支委员会，康世恩任总支书记。1949年10月，成立中共玉门油矿党总支委员会，隶属于中共甘青分公司总支委员会。1950年8月5日，甘青分公司撤销，军事管制结束，成立玉门矿务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国家石油总局西北石油管理局。1950年7月，成立中共玉门油矿党委，8月改为中共玉门矿务局党委。

1949年9月27日，玉门县和平解放。上级派27名军干部对旧政权进行了接管。10月8日，成立中共玉门县委、玉门县人民政府，隶属中共酒泉地委、酒泉专署。1955年10月，撤销酒泉专署，玉门县划归张掖专署管辖。

1953年10月，成立玉门矿区政府，为丁等县建制，由甘肃省直辖。1955年3月，玉门市人民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9月，成立玉门市人民委员会，并将玉门油矿生活供应处划归玉门市人民委员会领导；10月，成立玉门市人民委员会党组；12月，在玉门矿区设立玉门市（地级）^①，与玉门油矿实行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隶属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由张掖专署代管。1956年1月16日，经甘肃省人委批复，同意玉门市市区建立四个街道办事处。

1957年10月1日，撤销中共玉门油矿委员会，成立中共玉门市委员会，原玉门油矿党委办事机构改为市委办事机构。10月15日，成立中共玉门矿务局委员会，由中共玉门市委领导，并由玉门市委兼矿务局党委（联合办公）。1958年11月26日，撤销玉门

^①标志着中共玉门市委的正式成立。

县，并入玉门市。县、市合并后，玉门县将原有六个人民公社合并为四个^①，至此玉门市辖一个镇（玉门东镇）、四个人民公社、四个街道办事处。

1959年3月，玉门矿务局改组为玉门石油管理局；6月，成立中共玉门石油管理局委员会，隶属中共玉门市委领导，市委书记刘长亮兼任中共玉门石油管理局委员会第一书记。

1961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分设，玉门市改为县级市，隶属酒泉专署。1968年3月18日，成立玉门市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1978年12月4日，撤销玉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玉门市人民政府。

^①即由1958年9月改设的红旗、红星、跃进、卫星、火箭、东风六个人民公社，改为玉门镇、昌马、赤金、花海四个人民公社。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玉门的活动

(1937年7月—1949年10月)

西路红军血战河西的英勇斗争，西安事变及全国抗日浪潮的兴起，玉门油矿的勘探开发，加快了进步思想在玉门的传播。中共党员在油矿的隐蔽活动，启蒙了工人的觉醒，反压迫、反剥削的工人运动，更加发展壮大进步力量。老君庙一号井出油，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保护了油矿。第一野战军挺进河西，陶峙岳率部起义，促成了玉门的和平解放。

第一章

进步思想的传播和进步力量的发展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西路军血战河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0月，孙健初勘探玉门油矿。随着进步思想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玉门地区进步力量由小到大，为护矿斗争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一、西路军血战河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①，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②，以三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国内局势突变，致使红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下辖三个军，共计红军21800人。

原为实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战役中，虽然歼敌5000余人，而自身伤亡也达到了2000余人。就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就地建立根据地。由于情况不明、人生地疏、供给不足、兵力悬殊等多种原因，在多场次与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战斗中红军锐减至15000余人。在高台战役和倪家营战役中，又牺牲7000余人，打散、流落西北各地的1000余人，其中玉门境内定居的数十人，最后仅剩400余人穿过星星峡到达新疆。

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历时半年多，虽然最终失败，但对进步思想的传播作用是巨大的。首先，西路军血战河西，传播

①即1936年10月发布的作战计划。

②即西安至兰州公路一带。

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红军战士带着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意志和决心，所到之处，张贴宣传标语，歌唱革命歌曲，宣讲党的主张，严明组织纪律，对河西地区人民秋毫无犯，使河西人民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党的伟大和关怀。第二，西路军血战河西，传播了我们党为了革命，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第三，被打散流落在河西地区的红军战士，虽然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但他们的崇高思想和人格力量却长久传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为河西地区人民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唤起了玉门人民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启蒙了进步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

二、抗日思想的传播

抗日思想在玉门地区的传播主要来自于七个方面。一是西安事变的爆发。玉门虽处西北边陲，但西安事变的深远影响，很快通过西路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得到了有效传播。从全国看，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从玉门地区局部看，西安事变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七七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形成，开发玉门石油以解决抗日前线缺油问题的方案被国民党高层所接受，翁文灏继顾维钧之后大力促成了具体工作的开展，来玉门工作的学者、工人和管理人员把内地的抗日思想以及抗日战争的情况陆续带到了玉门地区。三是甘新通道主要是运输苏联对华

援助物资，以及我国向苏联运送相关兑换物资，在这个通道上，抗日信息、抗日思想被间接地传播到了玉门地区。四是中共支援玉门油矿开发时，应国民政府的要求派来了数名工人和管理人员，严爽就是其中之一。严爽，原延长油矿技术厂长，193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玉门油矿试探成功，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经周恩来同意任命严爽为筹备处主任，1938年11月到玉门油矿，随行的还有当时在延长油矿工作过的几名熟练工人。这些人员的到来，把延安情况以及延安精神带到了玉门。五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两个党支部的工作，虽然处于隐蔽状态，但对于抗日思想的宣传和传播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推动玉门油矿扩大生产规模，用石油支援抗日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是石油转运过程中，从抗日前线带来的抗日思想。玉门油矿生产的石油80%被运往抗日前线，在向抗日前线转运石油的过程中，运输工人被前线将士作战的英勇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回到玉门以后亲口传述抗日精神，对提高石油生产，加强两党团结，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感化作用。七是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玉门民间也有进步思想的表现。在全国十万青年军到缅甸抗日的号召下，玉门几所完小的上百名教师、学生也积极响应，报名应征，很多人虽因个头矮、年龄小未被选上，但赤金完小教师李培德及学生马长春、刘松生、刘生汉等四名师生被选定，走向抗日前线。赤金青年景彦武，1945年在重庆大学毕业后，立即到酒泉召集在国立肃师^①和河西中学就读的玉门籍学生张兆树、韩柏

^①今酒泉中学。

忠、何立书、赵义成、李世勇、何承祖、王兴惠、萧志国、萧志强等十多人开座谈会，宣传抗日情况和兴教治国等进步思想，回到玉门后就主持办起了县立中学。

三、两个地下党支部的隐蔽活动

1940年，玉门油矿大举开发，大批招收职工^①，调入技术管理人才，三名中共党员先后来到玉门，隐蔽开展工作。1941年春，

^①《玉门境地大事集成》记载：1940年8月18日，甘肃军管区司令部致函甘肃油矿筹备处，核准安西、敦煌、金塔、鼎新四县各送16岁以上壮丁200名到油矿做工。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协商决定，从1941年至1944年，酒泉、金塔、高台三县每年各拨壮丁400名到油矿做工。

中共老君庙矿区支部成立，成员为刁德顺^①、王道一^②、陈贲^③，刁德顺任党支部书记。支部成员的分工为：刁德顺负责培养发展

^①刁德顺，新疆伊犁人。1938年1月，延安抗大毕业的共产党员刁德顺，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到地方工作，在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孙作宾安排下，他到酒泉搞地下情报工作。刁德顺到酒泉后，利用他和七区专员曹启文是迪化（今乌鲁木齐）时的旧相识，以及与酒泉气象站站长胡振铎是南京气象研究所同学等关系，很快立住了脚，被安排到专员公署当了办事员，先后奉派到金塔、毛目（今鼎新乡）、高台三县调查过民政方面的情况，协助公路段修建过酒泉乡间的道路桥梁，还和留德医学博士石奠卿视察过老君庙油矿，拿回的石油标本，被曹启文报资源委员会。以后又在酒泉县政府和戒烟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刁德顺利用工作之便作掩护，和社会各方面人士广泛结交，为党收集酒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酒泉邮电街有一个进步书店，名为“世芳书店”，经理是孙世方和陈世武，他们经营出售进步书刊，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刁德顺在这里认识了不少进步人士甚至共产党员，如寇从善、孙馨沛、王道一等人。刁德顺通过寇从善对酒泉马家军的驻防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作详细了解；通过孙馨沛、王道一了解玉门油矿的情况。刁德顺还对苏联运送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飞机、汽车在酒泉降落、起飞和经过的情况，驻酒泉马步康198旅在关外敦煌布防的情况，西路红军失败后，红军官兵流落酒泉各县的情况等，都作了系统的了解，按照党的秘密工作要求，用米汤写在信纸上，向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作了汇报。1939年他被派往天水解送马匹，路过又向孙作宾当面汇报了详细情况，孙作宾同志指示他，要在酒泉稳稳当当站住脚，全面了解地方情况。1940年，由于世芳书报社出售进步书刊，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县党部准备查封。刁德顺把消息转告了孙世芳、陈世武，并积极疏通，结果引起专员曹启文对他的怀疑。经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联系，刁德顺到了玉门油矿，先在会计科，后又管理油库。1941年春，刁德顺、王道一、陈贲三人共同发起，正式建立了“中共老君庙矿区支部”。1943年底，刁德顺因回新疆伊犁老家奔父丧，又辗转找到新疆地下党支部，在那里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直到新中国诞生。

^②王道一，上海崇明人，1938年11月16日在四川入党，1939年经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川特区区委批准，来到玉门油矿工作，途经酒泉驻油矿办事处期间，和办事处会计孙馨沛认识，后经孙介绍与刁德顺见了面，互相逐步了解，成了朋友。

^③陈贲，石油地质专家。湖南长沙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后任玉门矿务局工程师。1945年至1947年赴美国进修。回国后，任中国石油公司上海勘探室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石油工业部总地质师、青海石油局研究所地质师、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曾提出建立全国石油储备委员会、石油勘探工作应以储量指标为主等建议。1959年负责编制了青海冷湖油田开发方案。最早提出冷湖地区侏罗系生油的观点，并总结了冷湖油田断块油气藏的富集规律，对中国断块油田研究起了借鉴作用。

对象，掌握敌特活动；王道一主管宣传工作；陈贲主管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科技情报。支部的工作重点是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团结教育职工反对压迫剥削，组织工人运动。矿区支部成立后，刁德顺即写信向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作了密报，因未接到工委指示，又于1942年春派陈贲借出差之机，前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党汇报，对接组织关系。之后，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王实先^①为建立甘肃、新疆至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秘密交通线来到老君庙，与刁德顺接上了关系，并指示矿区支部以后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以团结力量，坚持抗战，努力生产，严防敌特为中心，同时要求矿区支部与地方党切断关系，一切工作与他本人单线联系。1943年7月，刁德顺、王道一介绍职员孙馨沛^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王实先去延安参加整风，甘肃工委和他本人均被审查。中共中央决定暂停与甘肃地下党组织的联系，老君庙矿区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中断。1944年3月，刁德

^①王实先，1916年出生，江苏铜山人，中国大学肄业。1933年在北京参加红色互济会，后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甘肃工委青委书记、绥中县县长、锦州市副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赣州专署副专员，江西省机械工业厅厅长，中共江西省委工业部部长，江西省计委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中共江西省顾委副主任。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②孙馨沛，河北唐山新河庄人，早年在天津上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过学生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赴南京请愿团，因而被学校开除，后经同乡介绍到兰州官钱局（银行）当练习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他被派到酒泉银行任会计，和刁德顺认识后，刁德顺主动给他许多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阅读。他多次向刁德顺提供了不少酒泉工商、金融方面的材料。1939年春，甘肃油矿筹备处在酒泉成立，玉门油矿投入生产，8月，第一口油井喷油，为了掌握这些情况，刁德顺指示他到油矿工作。1940年1月，他正式到甘肃油矿筹备处会计科当会计。

顺因父亲病故离矿，将支部工作交王道一代理。1945年春，陈贲去美国学习。1946年6月，王道一调往设在上海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工作，矿区支部仅剩孙馨沛一人。之后，王道一仍和孙馨沛保持联系，指示他开展工作。1949年7月，孙馨沛介绍申松昌^①、冯承翌、赵志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油矿开发转入正轨后，工作人员增多，需要筹办子弟学校，从重庆聘请教员，这一情况被重庆的党组织得知，遂报告中共南方局。1941年秋，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派该社采编室主任田伯萍（又名田君实）^②及丁毅（女）、宁汉戈（化名林禾民）、丁培楠（丁酉成）、黄永森（黄小穆）、孙铭勋^③、高德藩等七名共产党员，由重庆赴玉门油矿，并秘密建立了中共甘肃油矿局子弟学校党支部，田伯萍任党支部书记。该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在职工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①申松昌，曾在“四五”事件中救助过被国民党逮捕人员的家属。

^②田伯萍（1919—1984），原名景富，又名汝华，开阳城关顶方人。1936年在团溪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并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曾赴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1938年奉命返黔，先在“民先”负责宣传工作，后到沿河开展“民先”活动；又到镇远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任教，兼管《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工作，被省工委指定为西南片区主要负责人。1941年转移重庆，为《新民报》资料室主任。后奉南方局命到甘肃玉门油矿工作。1944年12月回黔。1945年调任《新华日报》记者。1947年回延安任《晋绥日报》记者、干校副校长。解放后历任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市政府人事局长、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裕华纺织厂副厂长。1966年筹办重庆工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1973年出任教育局长、党组书记，后任市人大秘书长、市出版局局长、出版社总编、市政协副主席。1984年病逝于重庆。

^③孙铭勋(1904—1961)，贵州平坝人，我国早期幼儿教育家。早年从事幼儿教育及幼儿心理研究。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贵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研究员、西南师范学校副教授。1961年逝世。

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政治主张，多产石油，支援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944年秋，该支部完成了预定任务，加之矿区白色恐怖严重，成员陆续撤回重庆。

两个支部的地下党员们以合法的身份为掩护，利用各自的职业之便，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日寇法西斯残杀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压迫和剥削；给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教唱抗日歌曲；撰写宣传抗日和痛砭时弊的诗文，传阅进步书刊；搜集科技情报及敌特活动情况。在此后的“四五”事件中，地下党员向工人揭露油矿当局盘剥工人的诡计，秘密串联工人进行反抗。事后，组织募捐，接济被难工人的家属，设法营救被难工友出狱。解放前夜，秘密串联职工中的积极分子，组成护矿小组，确定了护矿工作的重点。当邹明^①开始组织护矿斗争后，他们在护矿斗争中发动团结职工，

^①邹明，石油经济管理专家，字明之，1913年10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后宅镇。1933至1937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学习，获管理学士学位。1937至1938年，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实习员。1938至1941年，任资源委员会重庆动力油料厂实习员、课长。1941至1942年，任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炼油厂课长。1942至1945年，任甘肃油矿局驻美代表，同时在美国美孚、壳牌石油公司考察学习。1945至1946年，任资源委员会上海炼油厂厂长。1946至1948年，任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室主任兼上海营业所经理。1948至1949年，任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甘青分公司（实为玉门油矿）经理。1950至1952年，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1952至1955年，任燃料工业部工程师。1955至1978年，任石油工业部供应制造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其间1960至1961年兼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供应指挥部副指挥；1962至1964年，兼大庆炼油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1978至1982年，任石油工业部外事局顾问。1982至1993年，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其间1982至1987年兼石油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1990至1992年，兼能源部高级咨询委员。1993年3月离休。1993至1998年聘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咨询中心特邀专家。

完成了护矿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油矿的工运斗争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虽然积极推动筹办起了玉门油矿，但油矿管理者和一些中层管理人员剥削阶级思想的性质没有改变，剥削、压榨、打骂油矿工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建矿初期承包基建工程的扬子公司，以私营资本家的管理思想对待矿工，雇用工头，严加看管工人，普遍使用棍棒加皮鞭的打骂办法，逼迫工人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人工资。但在进步思想和进步力量的感召下，油矿工人对管理层的反抗情绪不断增加，反剥削、反压榨、反克扣、反打骂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942年到1947年，共发生了五次工人运动（工运斗争）。第一次是1942年夏，因物价飞涨，油矿工人要求将原一月发一次工资改为十天发一次。油矿当局表面同意工人们的要求，但实际并不照办，并勾结驻矿的国民党军队欲对工人进行镇压。工人们遂罢工36小时，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第二次是1943年春，扬子建筑公司的数百名小工，因不堪忍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举行了罢工斗争，使生活条件稍有改善。第三次是1944年夏，因物价上涨，工人的实际收入减少，故要求增加工资。油矿当局调动驻军，封锁路口，并宣布矿区戒严。工人们封闭油井，停止锅炉运行，与驻军进行搏斗。斗争取得胜利，油矿当局被迫增加了工人的工资。第四次是1946年春，炼油厂工人丁建荣被矿

警刺伤，炼厂^①数百名工人怒砸炼厂矿警分队。第五次是1947年10月，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的工资和口粮，炼油厂200余名工人冲进办公厅，怒打总务组长吴松林，当局被迫补发工资、口粮。

五、“四五”事件

1949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政权行将垮台，发行的“金元券”急剧贬值，物价飞速上涨，即将崩溃的经济给玉门油矿和它的员工带来了严重的灾难。3月下旬，油矿当局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允许直接用银元发放工资，商定自4月份起改用“购物证”代替金元券发工资，员工领到“购物证”后，可以立即按当天酒泉银元折合金元券的牌价在公司兑换成“储蓄券”（银元），以资保值。因当时物价上涨太快，每月工资分两次发放，第一次是每月16日，按上月工资总额发放；第二次是次月5日，按国民党行政院每月底公布的“公教人员生活指数”计算出的差额补发。4月初，甘青分公司经理邹明出差去上海，把代理权交给了公务组组长戈本捷。4月5日，按“公教人员3月份生活指数”补发3月份工资差额时，酒泉银元折合金元券的牌价突然从4月4日的13000元金元券兑换一个银元变成了21000元金元券兑换一个银元，一夜之间上涨了62%。已经很微薄的工资还没拿到手，三分之一就没有了，自然引起职工的极大不满。炼油厂的工人找厂长

^①炼厂，指早期的炼油厂。

熊尚元^①要求按4月4日的牌价兑换储蓄券，但熊尚元做不了主，他连续四次找戈本捷，提出更换牌价，不能按目前的牌价发薪。戈本捷在中午曾允许改为16000元金元券换一个银元的牌价，但到下午，戈本捷一意孤行，坚持以21000元金元券换一个银元的牌价发工资，炼厂的工人提出抗议，拒领工资，要求把银元牌价恢复到4月4日的折算率，遭到戈本捷的拒绝。工人们谁都盼着能早一点领到薪水，携家带口的老师傅等着钱买粮、买生活必需品。戈本捷不理不睬的态度，激怒了炼厂一个性子火爆的青年工人马世昌。4月5日中午，马世昌找到炼厂工人欧阳义，愤愤地说：“磨破嘴皮也不顶事，不如大家一起找戈本捷去。”欧阳义又找到刘志俊，把马世昌的想法一说，三人同意发动工人找戈本捷说理。为了达到目的，不连累到工人，三人商量定了三条纪律：一是队伍要排列整齐，不许掉队溜号；二是听从指挥，不许暴露带队人的姓名；三是要戈本捷当面答复工人提出的要求。下午5点多，工人们在马世昌、刘志俊的带领下，分东西两路，向油矿办公厅进发。东路工人负责提要求、讲理，西路工人负责对付矿警队。

戈本捷听说工人们集合起来找他，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他想起了两年前，总务组长吴松林无端扣发工资，克扣口粮，炼油厂

^①熊尚元，石油化工专家。四川万县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任南京地质调查所技正、玉门油矿炼油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局副局长，北京石油设计院院长，石油工业部第七炼油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十年代初进行合成汽油、从植物油中提炼轻质油的研究，获得成功并投入生产。曾负责玉门炼油厂的扩建和油品技术流程的设计工作，提高了油品收率。负责组织并参加了我国炼油设计标准的制定。参加了石油部第二炼油厂、大庆炼油厂等工程的总体规划制定工作。

和矿场的工人联合起来举行的那次示威。他连忙拉上正在他家的熊尚元和矿警大队长范冠一，坐上小车，准备躲一躲风头。可没想到，当小车沿东马路向北行驶时，就看到了向南行进的工人队伍，急忙又调转车头向西走，恰巧被西路工人挡住。工人们向戈本捷提出，4月份工资要按1号的兑换牌价计发。戈本捷没有正面答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只说：“你们选出代表跟我到大礼堂去谈判。”工人们被戈本捷的态度激怒了，一名工人冲上去揪住戈本捷的衣领，要他马上答复。站在旁边的范冠一，掏出手枪，对那位工人威胁道：“你放手！”其他工人见状立即冲上去，把范冠一握枪的手拧住，并把他按倒在地。这时，另外一些工人也和戈本捷打了起来，刚下过雪的地上到处是泥水，戈本捷浑身糊满了泥水，躺在地上。

工人们没有得到答复，但心中的怒气发泄完了，队伍分成两路回宿舍了。4月5日晚，油矿颁布了全矿戒严令。规定：不准工人三五成群上街；不准聚众滋扰社会治安；不准殴打部门主管。违犯者军警将开枪制止。4月6日，油矿一级主管向远在上海的经理邹明报告了戈本捷被打的情形。当日，油矿当局没等到邹明回电，就向河西警备司令部和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求援。于是，军警一齐出动，包围了炼油厂工人宿舍和家属区。河西警备司令部接到报告后，派政工处长方成德^①和西北长官公署驻矿专员吴松涛

^①方成德，字命安，后改茗庵，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邵阳乡斗壁里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师级、军级职务。1949年春，国民政府任命陶峙岳为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同年6月兼任河西警备司令，方成德为河西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8月中旬，兰州解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甘肃省政府以及在兰州的国民政府中央有关单位，先后退到张掖、酒泉、高台一线，加紧布防。8月底，中国人

连夜带兵到矿。方成德怕扩大事态，主张和平解决。吴松涛则命令抓捕炼油厂的所谓“凶手”，亲自指挥带来的士兵和矿警大队的矿警一齐出动。4月7日，他们根据矿警大队事先准备好的黑名单，逮捕了欧阳义、马世昌、肖化昌^①、姚世杰等32名工人，关押在矿警大队部，连夜进行审讯。最后，吴松涛和方成德确定了肖化昌等19名“主犯”。4月11日，在五辆卡车军警的严密监视下，这19名工人被押送至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他们的家属也同时被逐出矿区。随后，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分别宣判这些被难工友半年至一年的有期徒刑。“四五”事件虽然被反动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了，却唤醒了更多工人群众，为迎接油矿解放继续斗争，并由此使油矿员工进一步看清了反动派的真实嘴脸，看清了封建势力的本来面目，更加激起了拥护共产党，坚决护矿的斗志

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挺进河西走廊。9月4日，许光达、王世泰兵团沿兰新公路西进，攻武威、夺永昌，轻取山丹。王震兵团在解放西宁后与第二兵团会师张掖。22日晚，彭铭鼎在酒泉卫生街21号召开将校军官大会，讲明共产党的政策，请与会者决议，方成德认为：“起义才有出路，顽抗是死路一条。”9月23日，陶峙岳派曾振五、方成德飞抵兰州，同彭德怀商谈河西、新疆和平解放事宜。24日，彭德怀会见曾振五、方成德，曾、方向彭德怀转达了陶峙岳的问候，介绍了河西和新疆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欢迎第一野战军尽快到达迪化。此后，方成德参加了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后勤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成德受到极“左”路线摧残，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1972年2月3日，方成德病逝，终年75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江县有关部门遵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落实党的统战政策，为方成德恢复起义名誉。200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抗日将领方成德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①党史资料记载：肖化昌是解放前夕“四五”事件闹工潮，工人怒打原扬子公司协理戈本捷的三个带头人之一。后被关押在死牢。解放大军进了玉门才把他们解救出来。是油建器材科老科长、农场的老场长。有人曾为肖化昌作诗一首，诗曰：四五事件带头人，解放获救得新生。红卫农场种闯地，稳定油建半个军。

和精神^①。1949年10月，油矿军管会根据工人控诉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放手交给群众去处理”的指示，发动群众重新处理了油矿解放前夕的“四五”事件。从开始发动群众控诉，迎接被难工友返矿，到最后处理共用了24天时间。处理结果，将主谋吴松林、马新吾、王长庚撤职，刘树人记大过。其余次要分子5人各记一大过；并取消了原公司当局因“四五”事件给炼厂四位工程师加上管理无方罪名各记一大过的处分。另给在镇压工人时敢于出头提出抗议的医院大夫岳养信记大功一次。对在逃主犯则报政府通缉。

六、英勇护矿

1949年7月，解放大西北的序幕正式拉开。此时的玉门油矿虽仍在以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的国民党统治之下，但油矿内的进步思想已深入人心，进步力量逐步增强，爱国爱矿意识普遍形

^①《玉门党史大事记》记载：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四·五”事件。引起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拖延不发，至4月5日发放时，又将银元牌价突然增长三分之一，使职工蒙受很大损失。经多次交涉无效，炼厂工人随即发起反压迫、反饥饿、反剥削斗争，怒打了油矿（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甘青分公司）代协理戈本捷。当晚，矿区戒严。6日，河西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方成德和西北长官公署驻矿专员吴松涛来矿，组织镇压工人斗争。先后逮捕工人欧阳义、马世昌、肖化昌、姚世杰、乔玉清等32人。10日，将其中19人押解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监狱，3人被开除，10人被释放。11日，当局将被捕工人家属驱逐出矿，职工申松昌（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等组织捐资救援，并将被逐家属送酒泉安置。不久，上海石油工人来电声援玉门石油工人反饥饿、反剥削的正义斗争，给了玉门石油工人很大的鼓舞。七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形势下，河西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被迫对油矿“四·五”事件被捕职工“从轻处治”，4人被判刑6个月，其他均予释放。

成，共产党必胜的理念逐步强化，反对马家军破坏油矿的呼声逐渐高涨，为新中国保护好油矿的力量被团结起来，以爱国人士邹明为油矿经理的厂矿内部已经形成了护厂护矿的共识。邹明深刻认识到，玉门油矿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如果遭到破坏，将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决不当这个弃矿贪安的千古罪人，他决定亲自出面组织护矿。在此紧张形势下，邹明以他油矿最高主管的地位和身份，首先拒绝了西北长官公署要炸毁油矿的要求，设法送走了一些危险分子，并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护矿斗争。一是采取留职停薪办法，遣散职工1000人左右。二是亲自出马，筹集金银，奔走于广州、香港、兰州之间，共筹集银元达30余万元。三是在武威、敦煌一带筹运粮食1万多担，足够矿区1万职工、家属四至六个月的口粮。这些措施的实行对安定人心起了积极作用，更为组织护矿创造了物质条件。6月1日，召开全矿职工大会，邹明在会上除宣布6月份起职工工资按银元作标准外，还着重说明油矿是国家的财富，是全体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油矿保护好。7月初，油矿正式成立了以老工人、技术骨干、矿当局主管人员为主体的护矿队，公开称为纠察队。护矿队设大队、中队和分队三级建制。甘青分公司为大队，由矿场工程师杨敏^①、炼厂工程师金光斌分别担任正、副大队

^①杨敏，1912年生于河北省沧县，1926年上中学时，因为参加声援北伐的活动，被校方开除。1933年考入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毕业后，进入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锡矿勘探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他被派往越南海防，督运援中物资，一直坚守到日本军队登陆，才撤退回国。随后，杨敏赴大西北，进玉门油矿工作，任矿场钻井部副工程师。1949年玉门油矿解放前夕，他被推举为护矿大队长，为保护玉门油矿免遭内战的炮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他随石油队伍转战甘肃、陕西、青海，后调大庆，任大庆市物资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长，直接受邹明领导，具体指挥护矿事宜。矿场、炼厂、工务组分别设中队，各有中队长、中队长副，既受护矿大队的指挥，又受各单位主管的领导。各基层生产单位设分队，各有分队长、分队副，组织全体人员参加护矿。

饱受国民党宪、特、军、警和反动把头之苦的广大石油产业工人，早已盼望解放。他们群情激奋，热血沸腾，众志成城保油矿、坚壁清野护设施，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油矿。自发组织昼夜巡逻，并掩埋重要机器，筑起铁网保护墙，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破坏活动。邹明亲自主持在紧急情况下所要采取的护矿措施，完成了整体护矿计划。

此后，油矿还指定专人做好驻矿国民党军队和矿警大队的工作，使之不致成为破坏油矿的工具，从而转化成为护矿的外围力量。8月初，邹明又与各单位主管人员一起拟订了玉门矿区、兰州营业所、探勘处^①在紧急情况时的护矿措施。

邹明组织护矿时，考虑到本矿的护矿力量是有限的，深恐兰州解放后到玉门解放这一段时间太长而难以支持。为此，他与孙越崎通过电报联系，于8月中旬由兰州飞到香港，在结算油款的同时，同孙越崎面谈了油矿的护矿情况。孙越崎当即表示赞同，给予支持，并通过中共香港组织，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人士向中国共产党报告了玉门油矿护矿的有关情况。玉门油矿职工护矿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邹明深受鼓舞。他赶回玉门后，将保护油矿的工作进一步展开。不久，兰州解放，西北长官公署加紧了对玉门油矿的破坏活动，油矿的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①时称探勘，现称勘探。

为了防止反动派的阴谋得逞，炼油厂职工首先在厂子周围建筑围墙。为了抢时间，他们就用大铁桶装上砂子、石头，三个铁桶叠在一起，挨着排成墙，然后用铁条将油桶连接焊死，成为整体，把炼厂围得严严实实；他们又把贵重的仪器装入箱内，埋藏起来；矿场职工把重要的器材包装转移；史久光^①带领大家将钻机藏进山沟后，又在油井的周围砌起一道保护墙，还把离矿区较远的油井，用砂土堆个堆，伪装起来；工矿组的职工也将重要机器包装藏好，把新进口的发电机推入土坑里，用草席盖起来；运输课^②也将一些汽车开进山沟，隐蔽起来。

矿区一天一天地逼近解放，护矿工作也日益紧张。为了防止反动派的破坏，邹明决定将矿井大队库存的全部枪支弹药配发给护矿队；工人们也自发地用洋镐把、铁棍等武装自己。得到武装的护矿队，在矿厂周围筑起了堡垒，日夜站岗放哨，组织巡逻队在矿厂周围巡逻，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护矿队的纪律很严，任何人不准擅离职守，每天晚上都传出统一的口令，如答不上口令任何人也不准靠近。护矿队还严禁军警闯进矿场区域。

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进军河西走廊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

^①史久光，石油钻井工程专家，我国石油钻井工程的开创者之一。曾组建我国早期的钻井工程，并负责钻井工艺和钻井设备的技术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多项钻井设备、器具，多次自行设计钻井事故处理工具。1949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油矿，原钻井部改为钻探大队，史久光任大队长。由于连年战乱的影响，刚刚获得新生的玉门油矿钻井器材奇缺，消耗零备件更是匮乏。他提出修旧利废的建议并带头行动，由于这一建议的实施，使钻井工作得以继续。当时玉门矿务局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报告中称：史久光是中国石油工业可贵的人才。大庆石油会战中首创用原油替代柴油、天然气作燃料，解决了会战初期的用电及用水等难题，是大庆会战著名的八大专家之一。

^②当时称“课”，现在称“科”。

也密切关注着油矿事态的发展，除了用无线电喊话严正警告妄图破坏油矿的敌人外，还于9月20日派某团政治处主任黄诚^①为代表，来矿做联络工作，随行人员是一位姓李的同志，还有一位是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骆驼兵团^②的起义军官。黄诚来矿后，与邹明一起同乔营长谈判，几经周旋最终达成了提前撤离的交防协议。为了防止其撤出前有人趁机掳掠及少数反动分子破坏，不加大护矿队的护矿难度，当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于9月23日深夜，由护矿大队长杨敏在子弟小学召开护矿队各级干部会议，部署在矿区设防，给各中队划分了防卫区域，并立即占领。护矿队进入了临战状态，准备随时抗击反动分子对矿区任何目标的破坏。玉门油矿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还为油矿颁发了锦旗，上面题写着“发扬英勇护矿精神，为祖国建设事业百倍努力！”以表彰油矿的护矿功绩。

^①黄诚，河南内乡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毕业班大队、第一二〇师七一七团、教导团、抗大七分校政治指导员，吕梁军区第十六团第二营副政治教导员、团组织股长，第十一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第三五九旅第九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副政委、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和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和田地委书记，伊犁地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伊犁州党委书记。

^②骆驼兵团，1947年7月，始建于武威。归国民党西北行辕统一指挥，为整团编制，但比普通骑兵团编制要大许多。除辖有驼兵四个连外，还有骑兵、炮兵、重机枪、通讯、运输、卫生等六个连，团部另设骆驼研究所、医务室、兽医室、驼兵实验队、放牧队和牧场等机构，共有官兵3586人，首任团长是贺新民。1949年9月24日，驼兵团在玉门起义。1949年10月，骆驼兵团奉命集中在高台县城31里外的阎家槽坊，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骆驼兵团，贺新民继任团长。当时残匪到处流窜，驼兵团为保卫人民安全生产，常年出没在戈壁滩和草原之上，执行着剿匪肃特的任务，在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战争中立过战功。

第二章

玉门油矿对抗战的历史性贡献

抗日战争中，玉门油矿所产石油占全国石油产量的90%以上。有了国产石油，中国再也不一味地依赖进口洋油。有了石油，中日战争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蹶不振的中国士气得到鼓舞，战场运输困难得以缓解，最终于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一、国民政府决定开发玉门油矿

玉门地区有石油的事，历史上早有记载，民国初期，一些有识之士多次提出开发建议，因军阀混战，国力不济，几度放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封锁了国外石油向中国的运输渠道，而抗日前线又急需石油作为动力以确保车辆运转。抗战初期，由于洋油运不进来，本国只有延长油矿和新疆独山子油矿，两个油矿的石油产量又极其有限，延长油矿的年平均产量只有105吨，独山子油矿年平均产量只有40吨，这点油不足全国所需的1%，为了保障中印石油运输通道对中国的石油供应，中国军民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通道的畅通，一度出现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情况，但后来日本侵略者还是炸毁了这个通道。中

方军队没有石油，直接导致了战场失利，战争态势急转直下。为了改变这种无油的局面，我国开始大量试验各种石油替代品，逼迫改用酒精、植物油、木炭和煤炭代替石油，以解决车辆动力问题。但这些替代品无法跟油料相比，汽车跑不起来，机件损坏相当严重，运输能力锐减。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孙健初、韦勒、萨顿三人于1937年在玉门发现石油，并上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翁文灏高度重视，亲自奔走于国民政府各机构之间，讲解开发玉门石油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争取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协调落实开发资金，积极物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人、财、物陆续到达玉门，开始了前期开发。

二、中共支持玉门油矿的开发

开采石油，首要的设备是钻机。当时大陆只有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两个小油矿和四川巴县的一个小气矿有钻机。独山子油矿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所把持，政府有令难行；巴县气矿虽有钻机，但要调往一个尚无绝对把握的地方去钻探，又下不了决心；权衡再三，资源委员会将调迁钻机一事寄托于中共所管辖的延长油矿。1938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翁文灏赴汉口专程拜访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1938年6月18日，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密矿字第313号函致第十八集团军^①驻汉口办事处：“本

^①1937年8月22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

会奉令勘探甘肃油田，需用油钻机，拟从陕北延长、永坪选配两部连同锅炉等件运往甘肃，兹派本会甘肃油矿筹备处长兼代主任张心田前往商洽……”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到此函后，立即请示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周恩来批准，钱之光于6月20日以总字第225号函致资源委员会：

“贵会六月十八日（密矿字第三一三号）……公函敬悉，派甘肃油矿筹备处兼代主任张心田先生赴陕北办理移送油钻机甘西^①间使用，准此。除商准周恩来同志、介绍本军驻陕代表林伯渠同志于张主任到陕时就近照料一切，并转电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外，相应函复。”资源委员会接到回函后，张心田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转赴延安，并受到高自立、萧劲光的接见和款待。边区政府第三局王局长和八路军后勤部军工局李强副局长与张心田就迁移钻机一事进行了具体协商，并在工作上给予了很多方便。对此，张心田于7月20日致电资源委员会：“移用陕北钻机事，因到延安后承八路军留守处及边区政府赞助，已与工业局负责人商洽妥当，留一部钻机在永坪继续钻探，以两部钻机交职处运甘肃用，因拟于近日返西安，俾早派员工办理拆运事宜。”8月下旬，负责拆运钻机的工程师赵润生一行15人到达延长。边区政府为了保证钻机一到玉门即能开钻，除钻机主件外，其余如原动力、钻头、钻具、锅炉等附属设备和配件，均一一配备齐全。由于国民政府的公路局无法派出车辆起运，尽管八路军的运输车辆非常紧张，

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①指玉门。

仍多次派车将两部钻机及配件全部送到咸阳。对此，张心田于10月18日在西安致电翁文灏：“陕北机件经商租八路军汽车十三辆安全运出，至咸阳，公路局无车接运，拟雇大车及自备汽车续运兰州。”次年三月，延长油矿的两部冲击式钻机^①运到玉门后，甘肃油矿筹备处用其一连钻凿了四口井，井井喷油，证实了玉门的石油资源确有工业开采价值，从而揭开了玉门油矿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并以源源不断的石油产品支援了抗日战争。

三、老君庙“一号井”出油

在翁文灏的积极努力下，1938年6月12日，资源委员会在汉口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由四川油矿探勘处机械工程师张心田为代理主任。6月22日，资源委员会发布训令，颁发甘肃油矿筹备处关防和小官章各一枚；9月，共产党员、原延长油矿的厂长严爽^②从美国考察油矿回国，就任筹备处主任；10月15日，被抽调到甘肃油矿筹备处的孙健初、靳锡庚报到，并于22日到达兰州；11月3日，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在兰州会面，详细讨论了玉门油矿开发的有关事宜；12月4日到达酒泉，26日到达老君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和前期准备，工人、民夫、钻机和其它器材设备陆

^①也称顿钻。

^②严爽，石油工程专家。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曾任延长油矿勘探室主任、矿长。1936年初，在毛泽民的关怀下，严爽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进修。回国后，先后任玉门油矿矿长、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副局长、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是我国玉门油矿主要创建者之一。是玉门最早的党员。

续到位；1939年3月11日，在孙健初确定的一号井位^①开始用人工开挖方井导洞。27日下午，一号井挖掘至23米处见油，原油从砂砾中汨汨地涌流出来，一天可出油1.5吨左右，钻探人员的信心大增。5月6日，用从延长油矿运来的顿钻开始向深处钻凿，速度虽慢，但也比较顺利。8月11日，钻至115.51米处，探得一个油层，日产原油10吨左右，这一产量，在当时已属高产，全矿员工大受鼓舞。孙健初通过砂岩样品对比，发现这个油层与干油泉属同一个油层，便以英文Kan（干）的第一个字母取名为K油层。从此，玉门油矿的开发正式拉开了序幕。

四、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1939年8月11日，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正式投产，日产原油达到10吨。消息传出后，全国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玉门，投身到开发石油的行列之中，担负起了石油救国的重任，为玉门油矿的扩大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继续钻凿新井，逐渐增加原油产量的同时，玉门油矿四处搜购器材设备，土法上马建造炼油装置，确保炼油工作快速启动，以确保机车用油尽早运往前线。油矿投产当年，共生产原油359吨，生产出汽油11.6吨、煤油13吨、柴油23.5吨，利用运送厂矿所用物资的抵矿返渝车辆将产出油品运往重庆等地，使抗日前线第一次用上了国产的石油产品。

^①现称老一井，即老君庙一号井。

1941年3月，为了扩大玉门油矿的生产规模，拿出更多的石油支持抗战，资源委员会决定撤销甘肃油矿筹备处，在重庆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这标志着筹备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全面生产的时代已经开启。甘肃油矿局成立后，就立即着手培养技术骨干，增加物资订购，扩充炼油装置，配套矿区设施，使油矿的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42年，玉门油矿的原油年产量达到46000多吨，生产的汽油、煤油、柴油除供行政院液体燃料委员会、航空委员会、驻华美军总部、军政部交通司、辎重兵司令部、第八战区兵站总监部、陕甘战区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等军政部门外，还先后在甘肃、陕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设立了油品分销机构，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玉门的油品。玉门油矿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油品，大大缓解了大后方和作战前线的油荒。1943年，日军企图强渡风陵渡，入侵陕西省，由于玉门油矿提供了充足的汽油，运输部门及时将苏联支援的大炮从新疆赶运到前线，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进攻。1944年，美国空军的飞机使用玉门油矿提供的汽油，从成都起飞去轰炸日本东京和被日军占领的唐山林西发电厂，给予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1938年，资委会开始投资勘探，到1944年共投资9.3亿元，折战前币值1030万元，占同期资委会投资总额6821万元的15%，是战时国家投资最大的厂矿，也是大后方新建的最大企业。从1939年第一口钻井出油，到1945年，共钻井26口，生产原油7866.7万加仑（255546吨）、汽油2303.35万加仑（37092吨）、煤油511.6万加仑、柴油71.7万加仑。原油生产占全国的90%以上。1942年，全国进口汽油不到3万加仑，而当年玉门油矿生产汽油已达189.57万

加仑。抗战时期，大后方共生产汽油、煤油、柴油、酒精及其他代用油等液体燃料共3625万加仑，其中玉门油矿产2000万加仑，占55%以上，这是玉门新建的现代工矿业对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

第三章

迎接解放

根据毛泽东“要保证玉门安全”的指示，兰州解放后，第一野战军立即西进。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神速进军、爱国将领的起义，以及工人的护矿斗争促成了玉门的和平解放。

一、毛泽东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

毛泽东把玉门安全放在西北安全的大局中进行了部署。玉门是战时乃至战后经济建设唯一可依赖的现成的规模化生产的油源，在西北乃至全国问题上，不论战时还是今后，都将扮演重要角色。玉门安可利西北安；西北安则保全国安。毛泽东主张在和平推进中保证玉门安全。194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西北川北部署电》中指示：“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西北川北部署电》中所指的“油源”就是玉门油矿，而“更大油源”则指的是苏联。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认为西北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8月23日又

电：“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9月8日，毛泽东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在北京约见了西北地区威望最高的前任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行政长官张治中^①。10日，中央电示彭德怀、邓力群，加强新疆联络，积极和谈。据玉门油田分公司宣传部考证，8、9月间，邹明在香港以电报形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玉门油矿的情况后（具体过程见前），毛泽东发出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此后，和谈节奏加快，和谈、西进、起义、投诚的具体进程中开始大量出现保证“玉门”“玉门油矿”或“老君庙油矿”安全的文字记载。9月中旬，时任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②，派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五自西向东，途经酒泉、高台，赴兰州与彭德怀商谈和平起义之事，途中面见王震^③。彭德怀向曾振五指出：“玉门油矿的安全，务必确保，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玉门油矿的安全，必须让它完好无损的回到人民手中来。”决定起义后，陶峙岳立即“派第一八七旅副旅长刘抡章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保护油矿安全”，完善了整体护矿计划^④。

^①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②酒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

^③当时王震已率军到达张掖。

^④魏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示要保证玉门安全资料汇编[M]，玉门市委党史办，2011年7月1日。

二、玉门油矿和平解放及实行军管

第一野战军装甲部队于9月24日晚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20—25公里速度从积雪茫茫的祁连山麓穿过戈壁沙漠向玉门急进。

1949年9月25日，第一野战军装甲兵团团长胡鉴率领的坦克和战车为前导，几十辆兵车紧随其后，在军长黄新廷（曾用名黄新亭）的率领下，穿过夹道欢呼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玉门油矿，邹明率领油矿各单位的主管亲迎解放军进城^①。

1949年9月25日，玉门油矿宣告解放，9月28日前后，由三军八师、九师为主，相继抽调65名干部接管了玉门油矿，成立了军管会，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军管会主任），张守瑜任军事副总代表（后改派焦力人、张俊任军事副总代表，军管会副主任），邹明继续担任油矿局协理。营长周世英带领三个建制连队接管矿警大队，伪矿警中队、科室，将财产、武器、装备向军代表作了移交，周世英将分散在各厂的伪矿警全部集中整训一个多月，之后将矿警大队改编成玉门油矿警察大队，共380多人，由周世英代理大队长。新补充300人，对原矿警中留用80人左右，其余根据本人自愿和历史情况，有的当了工人，大部分遣回家。依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接收政策”接收了甘青分公司，并实行军管制，从此掀开了玉门油矿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康世恩到玉门上任之后，按照党的“不打乱原来的企业机

^①1949年10月12日《甘肃日报》。

构”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对原有的200余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予以妥善安排，动员全体职工奋战七天，将生产能力恢复到了原有水平，为进军新疆的解放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油品。

1949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许光达等视察玉门油矿，出席了欢迎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石油工人表示慰问，高度赞扬了玉门油矿职工英勇护矿的爱国主义行为。尔后号召广大石油工人要加强团结、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力争在几年内把玉门油矿建设成为祖国石油工业的摇篮。此后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嘉奖玉门油矿职工解放前夕护矿斗争的功绩，特颁发锦旗一面，上面写着19个大字：“发扬英勇护厂精神，为祖国建设事业百倍努力。”

三、玉门县人民迎接解放

1949年9月26日，得到解放军西进玉门县的通知后，贺新民^①

^①贺新民，1918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沅江县阳罗镇。玉门解放前，贺新民任国民党骆驼兵团团长，驻玉门。1949年，西安、兰州相继解放，当时身在旧营心在延安的贺新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团内成立了起义核心组织“新生会”，9月份他领衔通电起义，拥有3000多官兵、4000多驮马的骆驼兵团走上了新生之路。解放后，贺新民在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独立骆驼兵团任团长。1953年调任三军副参谋长。1960年转业到湖南省人民政府任参事等职。贺新民因曾对荒漠半荒漠地带的地形、气候、土壤、植被等特征也有过论述，后被吸收为中国沙漠学会会员；在畜牧史方面也有研究，亦为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但他在骆驼的研究上最为突出。1979年春，受宁夏农学院、内蒙古农牧学院邀请担任《养驼学》的编审。他在60年代主编的《骆驼学》也终

团长积极安排准备，并和刘登玺^①带领骆驼兵团部分官兵、支前委员会成员、县政府部分职员、参议会人员、地方各界人士、群众等，在城北公路边驿运站迎接解放军。黄昏时分，解放军二军四师先头部队约50人，分乘两辆卡车到达玉门县城。人民喊着“迎接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等口号，递茶送水，欢迎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的首长站在车的踏板上向迎接的人群宣布“玉门县和平解放了。”还讲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共产党保护人民的政策。当天夜里，解放军二军四师一千多人开进玉门县在事先安排好的军运站、学校、仙姑庙等处及部分居民院落宿营，城中秩序井然，鸡犬不惊，和过去所见旧军队完全两样。人民从内心感到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先前的一切谣言和戒备之心扫除一空。

9月27日上午10点钟，由解放军主持，在城北大校场（现玉门镇幼儿院所在地）召开庆祝玉门县和平解放大会，整个县城像唱大戏一样热闹。太阳刚出，居民和附近乡村的群众车水马龙，几千人连续涌入会场。一千多名解放军进入会场时，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嘹亮的歌声响彻会场上空。解放军首长、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县政府秘书刘登玺等人在主席台就座。解放军首长在会上讲话，正式宣布玉门县和平解放，庆贺劳苦人民翻身当家做主，并宣布共产党的

于在1983年出版。他在湖南省任参事之际，多次去农村调查研究本省农牧业生产情况，为省政府提出建议和意见，作为执行和制定政策的参考。2014年7月，市委党史办主任魏杰前往湖南看望了贺新民。

①刘登玺，解放前任玉门县政府秘书。

政策和解放军的纪律。地方代表也在会上讲话，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感谢共产党救穷苦人民出苦海，表示拥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第二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各项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四章

新政权建设

解放后玉门县、玉门油矿即着手新政权的建设，带领玉门人民走向新时代。

一、玉门县委、县政府的成立及基层政权建设

9月29日，中共酒泉地委派玉门县委书记赵子尧^①（原三军九

^①简介见附录。

师二十五团民运股长）、县长李克让（原三军七师后勤部长）带领27名建政人员到玉门县，并在县政府大礼堂门口的广场上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10月8日，宣布中共玉门县委、玉门县人民政府成立，随之组建了县委、县政府工作机构。县委成立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县团委、民主妇女联合会。县人民政府有秘书室、民政科、财务科、教育科、建设科、税务局、公安局、邮政局，人行办事处、水利会也相继成立，开始施行地方政权职能。

紧接着，各区成立了区政府、区委。1949年12月27日，玉门县农民代表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93人，其中农民代表58人，各界代表23人，党政代表12人，列席代表70人，共计163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剿匪反霸；（二）贯彻合理负担公粮的政策；（三）摧毁保甲制度，建立乡政权；（四）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会议历时六天，到1950年1月1日结束。

元旦过后，各区各乡认真贯彻会议精神，首先开展摧毁保甲制度，建设新政权的工作。解放前，玉门实行保甲制度，设晋昌镇、靖边乡、柳河乡、赤金乡、花海乡、昌马乡共一镇五乡，辖40保，360甲。数保设联保主任一人，保有保长，甲有甲长。镇设镇公所，设镇长1人，干事若干人，乡设乡公所，有乡长一人，干事若干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用保甲制度执行和维持乡村社会。1950年初，全县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区、乡、村新政权。全县设置晋昌、靖边、柳河、昌马、赤金、花海六个区行政公署，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全县设40个乡人民政府，乡政府设乡

长、副乡长各一人，由群众选举产生。村上有农会组织、民兵组织等，全县共有93个行政村，240个自然村，6743户，36911人。各区还建立了中共区委员会，领导各乡、村的新政权行使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10月，玉门县公安局成立。1950年由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颁文成立玉门油矿人民公安局。8月，玉门油矿人民公安局改为玉门矿务局保卫处。解放前，社会治安混乱，百姓苦于匪患烟害，不得安宁。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紧紧围绕党的各项工作，有效开展社会治安管理，打击敌人，严惩犯罪，保护人民，净化社会，加上基层新政权的力量，人民安宁，逐渐过上了好日子。

二、玉门油矿的新政权建设

1950年7月，成立中共玉门油矿委员会，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8月5日，甘青分公司撤销，军事管制结束，正式成立玉门矿务局，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国家石油总局西北石油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杨拯民，副局长熊尚元。矿务局下设秘书室、保卫处、人事处、总务处、财务处等机构。下辖工程处、机械厂、炼油厂、采油厂、钻井大队、运输大队、水电厂等单位。石油工人在党委和矿务局的领导下，精神振奋，大干快上，为祖国建设多产油争做贡献。8月6日，玉门油矿职工3000多人集会，庆祝西北石油管理局（驻西安）及玉门矿务局成立。

第五章

巩固新生政权的各项斗争

新政权建立后开展了各项斗争，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土地改革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建党整党

玉门县的建党整党

1952年2月，玉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靖东区下西号乡支部建立，该支部属靖东区委领导，周春生为支部书记。根据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1952年8月，玉门县全县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开始，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提高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至1952年12月，在全县45个乡中建立了40个乡基层党组织，发展新党员102名。1953年1月，玉门县靖东区下西号乡的贾玉兰由该支部的梁保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玉门县解放后发展的第一名女党员。

党员队伍的壮大，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对党员进行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的整顿，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玉门油矿的建党整党

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上级党组织先后从部队和地方选派60余名干部来油矿帮助发展生产，建立党组织。10月，油矿已有党员22名，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甘青分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康世恩任总支书记。总支下设军管会、四台区、矿区和公务组四个党支部。1950年1月，党总支按照“从群众运动中建党”的方针，结合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在第一批会员中选择政治思想好，立场坚定，有群众威信的工人作为发展对象，个别吸收入党。接着又开办短期训练班，从各部门抽调工人入校受训，通过讲阶级、讲党史，在提高工人群众认识的基础上，开始公开建党工作。2月9日，经中共玉门油矿总支委员会批准，40余人被接收为中共党员，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党仪式，总支代表焦力人参加了大会。1950年7月，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委员会成立，为玉门油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会所辖党总支1个（总支所辖支部7个），直属支部15个，共计22个支部，分为65个党小组，党员409人，其中正式党员260人，候补党员149人，党员人数占全矿职工人数7.3%。党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建党工作，明确提出了培养对象的三个条件：1、成分好，历史清楚；2、觉悟较高，思想作风正派；3、工作生产积极负责。经过支部宣传，群众推荐，党委审批，共确定了1000多名培养对象，先后举办了三期培训班，经考试，50%以上的人及格。1950年接收新党员283人，占计划的95%。在建党工作中还取得了三条经验：（一）建立发

展党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吸纳积极分子入党，绝不能定指标、完任务，赶急图快，而是要深入地加强党的宣传教育，扩大党的影响，明确党的纲领、章程，提高对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同各项政治运动紧密联系，进行严格考验。

（二）接收手续、候补期一定要按中央规定办，不得任意简化，任意缩短，要严格按照入党程序办理。（三）对吸纳的新党员，不断进行党纲、党章教育，让他们在政治上一定要清醒，对党的奋斗目标一定要明确，要表现在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任务的完成、对党的决议的执行上，都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1952年8月下旬，根据毛泽东2月签署的命令，石油师大部分指战员来到了玉门油矿，其中共产党员153人，增强和壮大了油矿党的组织。

11月1日，玉门矿务局整党工作开始，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对整党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即机关单位和厂队生产单位。机关11月开始，12月结束。厂区1953年1月开始，2月底结束。进行步骤有：教育检讨、登记、处理、改选支部几个阶段。全矿参加整党的党员682人，团员359人，积极分子280人，群众2173人。

整党教育中，普遍对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整党方针进一步明确，提高了觉悟，纯洁了组织，改进了领导，提高了生产。如钻井处过去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事故较多，上班精力不集中，有的打盹，下班后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看电影、进小食堂，政治空气薄弱，整党教育后，风气大大扭转，上班早到，工作积极，下班后90%以上的人都能主动参加政治课学习。

经过标准衡量后，确定够条件的492人，不完全够条件的80

人，不够条件的29人，因事外出未作结论的75人，需要材料证明的6人。处理结果是：给予警告处分10人，劝告1人，留党察看1人，取消候补4人，退党1人，等待16人，延长候补期14人。经过整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党的组织堡垒更加坚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加明显，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更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为实施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减租反霸斗争

减租反霸斗争是玉门县解放以后，在中共玉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广大农民同封建剥削制度进行斗争的第一个群众运动。根据地委党代会会议精神，1949年11月28日，县委召开首届农民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部署了减租反霸运动。首先集中26名干部在晋昌区进行了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展开。1950年3月，西北局颁发了《减租暂行条例》，指出：“为减轻封建剥削，初步改善农民生活，恢复与发展生产，团结各阶层人民支援前线，建设西北起见^①，必须实行减租。”1950年9月26日至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酒泉分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地委副书记贺建山作了《关于执行省党代会会议土地改革减租决议的报告》《发动群众，普遍减租》和《关于土地改革减租决议的报告》。会议决定：（一）巩固胜利，克服困难，发动群众，进行生产建设。（二）进行生产自救，节约备荒，剿匪反霸，减租减息，为进行土地改革打下

^①起见：表示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出于某种原因。

基础。按照西北局颁发的《减租暂行条例》和酒泉制订的《减租规定》，玉门深入发动群众，严格按照规定的减租范围、减租标准、减租时间和清债办法进行了减租清债工作。全县减租退租183.62万斤，处理债务退回果实粮45.52万斤，抽回契约单1942张，废除旧债70.52万斤，退出债务粮食168.52万斤，退还给1278户农民。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翻身，也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意识。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对地主、恶霸根据民愤大小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斗争，全县共判处大小恶霸88人。

减租反霸运动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至1951年9月结束。通过减租反霸斗争，把地租剥削量限定在了出租者合法租额受益范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废除了旧债，依法严惩了恶霸，斗争了不法地主，大涨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纷纷参加民兵、农会，组织变工队、互助组，积极发展生产，玉门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剿匪肃特斗争^①

^①1950年3月2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对九师及骆驼部队进军玉门、敦煌南北之哈萨族地区[剿匪]（注：[]内的文字为编者所加）的工作部署》。张[宗逊]甘[泗淇]转2兵团并甘肃、青海、宁夏省委、新疆分局并报军委：9师及骆驼部队，拟3月间进军玉门、敦煌南北之哈萨族地区，镇压其抢掠行为，是必要的，望坚决执行。唯该哈族过去受大民族与狭隘民族主义者压迫，致久处沙漠，成为无定居游牧民族，生活极苦，被迫抢掠杀害他族人民，始由报复而成习惯，且因天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遂养成其高度耐苦勇敢和行动迅速。为使平服和争取该民族，要收到实际效果：（一）要准备克服深入沙漠中作战的一切困难，要准备进入该区后分驻水草要地，长期镇守，进行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关系争取，至准备驻6个月可能还要长些。否则我在他逃，我走他回，徒劳兵力，无济于事。并免除担负此项部队之生产任务。（二）哈族信奉伊斯兰教。准备进入该区部队，必须反复深入尊重回人生活习惯和[遵守]民族政策、俘虏政策[以及]群众纪律

玉门南北靠山，沿系较长，地形复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常有土匪出没，他们抢劫财物，行凶杀人，污辱妇女，无恶不作，使地方不得安宁，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翻了身，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但是被打垮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及逃亡的恶霸地主不甘心灭亡的命运，他们与南山的土匪勾结在一起为匪作患，四处抢劫，骚扰破坏，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新生政权，仅1949年9月至1951年12月，在玉门县境内就发生抢劫24次，打死群众18人，抢走羊6780只、骡马74匹、骆驼124峰以及其他财物。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保护玉门油矿的安全生产，社会治安问题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玉门县一经建立，就将原国民党玉门县自卫队接管整编，改为玉门县保安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由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侦察排长翟贵同担任保安队长。不久，酒泉地委、军分区为统一指挥调遣民力，又将各县保安队改编为独立营。玉门县

的教育。并准备哈族文传单标语（维文亦可）。宣传内容须适合其切身利益关系，特别是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愿帮助他们共同商讨解决其居住、牧场与贸易自由、等价交换，组织治疗队医治梅毒、防治兽疫等内容。（三）军事上亦应有充分准备，如沙漠中如何生活，如何取得饮水（据云：有红柳处掘丈余深，即可得水），如何在沙漠中行军作战（多雇熟路向导），后方供应运输等必备事均不可大意。（四）在沙漠中作战，骆驼部队是最适宜的兵种，它有骑兵的一切长处而耐久，负重行速（日行二百数十里），远非骑兵所及。现有之骆驼部队仅200余，须扩大至500以至1000左右，以便适应西北沙漠地区作战。详细计划请与骆驼兵团长贺新民（起义来的，此人还好）商决。但在军事进据哈族区时，该族可能向青、宁、新诸地流窜，故各省须注意防（犯）[范]与招抚，妥善安置。武威、张掖、酒泉地委须切实配合9师行动，并准备在武、张、酒线以北有水草荒地安置，尽可能帮助哈族解决牧场，逐渐转为固定牧民，使之慢慢脱离游牧生活。并[望]2兵团3军9师和酒、张两地委如何具体布置电告。彭德怀、习仲勋。1950年3月2日。

保安队编为独立营二连，全连百余人，设三个排（其中一个骑兵排），并在匪患较多的昌马、赤金、花海三个区各设一个分队，保护群众安全。

玉门油矿解放后，继续清剿流窜于油矿周围山中的残匪，消灭了集结在矿区西北赤金堡的散匪，生擒匪连长以上人员33名，缴获60炮2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88支、汽车2辆，深受其害的赤金当地农民杀羊做饭，热情款待解放军。

黑崖子剿匪战斗：1950年1月，石包城^①一带有土匪骚扰，大约有一个营兵力，四处抢劫，出没不定，并有袭击昌马区公所企图。酒泉军分区命令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各县集中兵力，合力围剿土匪。玉门县二连的任务主要在昌马一带待命，伺机深入，剿灭土匪。二连接到命令后，作了简要的部署，除留守人员外，于1月15日半夜鸡鸣时先行出发。16日凌晨天将破晓时，二连骑兵排21人全部骑马挎枪，驮着剿匪部队的武器弹药等物资从县城出发。骑兵战士除配备步枪、冲锋枪外，还有轻机枪一挺。在翟贵同^②带领下，冒着严寒在戈壁滩上行进。大约10点左右，赶到黑崖子^③附近，见东边戈壁滩上尘土飞扬，黑鸦鸦的一片。翟贵同在马上拿望远镜一看，是土匪抢掠的财物，几十号人正赶着牲口向西走，遂下令进入战斗。双方交接，在激战中，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抢占了黑崖子制高点负隅顽抗，战士们都翻身下马，匍匐前进，连长翟贵同心急如焚，骑在马上指挥战斗，不幸胸部

①玉门县南部山区昌马乡附近。

②简介详见附录。

③位于玉门市区南部、昌马乡北部。

中弹，血染黄沙，壮烈牺牲。战士们个个心如刀割，满腔怒火要为连长报仇，子弹像雨点一样，使敌人无法前进抢回牲畜。匪敌怕我方再来部队增援，腹背受敌，只好向南节节败退，有些被打伤，丢盔弃甲，狼狈逃命。战斗结束后，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驮着连长翟贵同的遗体，将缴获的马鞍、衣物以及一百多头骡子、骆驼赶回县城。

翟贵同当时只有25岁，为保卫玉门人民的新生政权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的英雄事迹，将遗体埋葬在玉门县城北沙岗墩，还立了翟贵同烈士纪念碑。

马鬃山剿匪战斗：1950年3月，解放军三军军长黄新廷，命令骑兵大队和经新式整军后的原驻玉门的骆驼兵团六个连及高东生任团长的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共同担任剿匪任务，进马鬃山清剿国民党骑五军、国民党九十一军马鬃山边防五七二团残部及蒙古军王英、李守信残部。骑兵大队首先进入马鬃山驻扎，骆驼兵团分成两路，一路由政委安俊率领两个连一个排，经酒泉到玉门，在玉门征集骆驼31峰，并找向导两人，由桥湾沿马鬃山国防公路进公婆泉，沿途同国民党九十一军五七二团残部遭遇，小战斗不断。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率其余三个连两个排从东面包围敌人，驻玉门的高东生二十五团从赤金出发，经玉门花海入马鬃山，三支部队各有电台一部。这次剿匪中，人民解放军共消灭敌人87人，俘虏410余人，缴获马匹270余匹，骆驼40余峰，枪支300余支，人民解放军伤亡70余人。

北山梧桐井剿匪战斗：1951年3月，敌骑五军残匪一营从新疆

人马鬃山梧桐井一带。他们抢劫蒙古族牧民牛羊、骆驼等财物，并打死牧民七人，使地方不得安宁。骑兵大队接到三军命令，从安西出发，经桥湾、花海子进入梧桐井，从西、北、东三面包围了正在那里休息的匪徒。与此同时，玉门县花海区区长王金玉带领独立营的两个排协助清剿，从南面阻击匪徒，匪徒无路可逃，拼死顽抗，经过7小时战斗，骑兵大队全歼敌匪。这一仗打死匪徒70余人，俘虏140余人，活捉匪团长铁有才，我方牺牲连长1名，排长2名，民兵1名，安葬于玉门黄花营。

双疙瘩井北山剿匪战斗：1950年3月11日，玉门县花海双泉子发现哈萨克匪徒22人（骑马），带步枪20支、短枪2支、望远镜一幅，牵骆驼16峰，抢劫双疙瘩井牧民骆驼282峰，窜至北山口。花海区长王金玉接报，率该区民兵及县公安局驻花海一个班战士共33人追击60里。到北山口与匪徒接火，缴回骆驼52峰，第二天追至黑沙窝，双方再次交火，匪徒突增至40余人，打伤民兵张志让，我军打死敌方骡马3匹，匪徒逃进马鬃山。

四、镇压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在大陆潜伏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妄图里应外合，卷土重来，推翻人民政权。剿匪斗争虽对外线匪敌给予了彻底打击，但暗藏在玉门的反动势力，勾结地方恶霸、“一贯

道”^①等，在各地造谣生事，煽动群众，挑拨干群关系，破坏活动猖獗。如1950年3月混入玉门公安局担任警卫班长的敌伪军官王乐仁，主谋策动了一个排战士，在生产工地武装暴乱，进山为匪；1950年6月，潜伏在玉门油矿及酒泉的特务王治国、赵清善等人，密谋策划，妄图炸毁油库，烧毁房屋，乘机抢劫油矿总办公厅、人民银行和油库电台设备，杀死警卫人员，打开监狱放出反革命分子，实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坚决镇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地委的安排部署，1950年10月至1953年，玉门县、玉门油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玉门县的镇反运动

玉门县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

^①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属于五教合一的多神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势力最大、活动最为猖獗、危害非常严重的反动会道门组织，1950年在中国大陆被铲除，其在台湾的分支到21世纪初已发展成一个宗教信仰组织。玉门的一贯道有天道、孔孟道、天仙道、龙华会、檀香会、神仙大道等别名，原是旧社会许多封建迷信会道门中的一个派别。

运动初期，分别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座谈会、民族人士座谈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座谈会，运用幻灯、漫画、壁报、喇叭筒广泛深入地宣传镇反政策及镇反的重要意义，还组织宣传小组用具体事例编成戏剧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人民法院印发张贴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并将已逮捕的一贯道头子王本斋等四人、特务头子王立元、组织主谋武装叛乱首要分子王乐仁判处死刑，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扭转了前一阶段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通过这些工作，启发了群众觉悟，使干部群众认识了镇反的重要意义，懂得了镇反的政策，掌握了对敌斗争的法律武器。

在群众发动起来后，镇反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进行了三次打击行动和摸底、清查、判定工作。一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击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散兵、特务、土匪。二是和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1951年9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村中的恶霸地主及隐藏在农村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四处活动，采用各种手段破坏土改和各项工作，他们在群众中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挑拨干群关系，破坏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县公安局根据群众的反映掌握了材料，在工作组的配合下，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破坏土改的恶霸地主，经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逮捕22名，第二批逮捕30名，第三批逮捕41名，没收步枪11支、土枪若干、手枪2支、子弹2000发，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扫除了土改工作中的障碍，消除了部分农民怕打击、报复的疑虑。三是在土改复查中，逮捕了29名土改后有破坏活动的不法地主，对反革命分子

的反攻倒算给予了打击，巩固了土改运动成果。

玉门油矿的镇反运动

玉门油矿党委接到镇反指示后，建立了以党委为核心的审查委员会，并按各生产单位成立了十个以党委委员、支书、保卫人员为核心的审查小组，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宣布了镇反方针和具体镇反办法，大张旗鼓地通过一切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召开各种座谈会、控诉会，广泛深入宣传动员，使党的镇反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先是逮捕了反革命分子18名，又于5月20日召开全矿5000余人投诉大会，经县人民法院审判处决五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中统特务、国民党玉门油矿区党部书记张振邦，军统特务、国民党矿警大队长李阳文，军统特务、国民党矿警中队长周雨三及混入警卫大队的反革命分子袁文吉、马忠元）。5月20日至22日，在各厂队与保卫处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青红帮”“一贯道”等封建迷信团体分子300人，随后分不同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玉门县、玉门油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共捕获散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476人，其中依法处决31人，判刑332人，管制107人，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

五、取缔反动会道门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反动会道门遍及城乡。他们披着教会的外衣，编造神言谶语，诋毁党的政策，造谣惑众、挑拨离间，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特别是“一贯道”活动十分猖獗，玉门的地主、富农多是一贯道徒，道首也是这些人担任，他们依仗封建势力、封建迷信，残酷地压榨群众，霸占土地、财产，奸淫劳动妇女，残害人民，无恶不作。解放后他们继续打着“消灾免难”“保佑平安”的幌子麻醉欺骗群众。1949年11月，一贯道首犯关凤鸣以经商行医为名潜入花海密谋活动。1950年，道首王本斋乘人民基层政权尚未巩固之机，除发展道徒扩大反革命势力外，还收买策动驻花海公安队叛变进山，随叛乱头子包不拉为匪，企图与人民政府分庭抗礼，破坏各项民主改革，气焰十分嚣张。土改开始后，靖边区八乡群众发动不起来，多数群众都吃素，就是“一贯道”的影响，人民法庭逮捕了恶霸地主李世安（系典传师），将该乡的一贯道突破，全乡共有19个佛堂，典传师2人，道徒210人（其中有124人自动坦白退出），所有的典传师、坛主、引进师均系地主富农，他们用“一贯道”蒙骗、威胁道徒，阻止道徒分享斗争成果。

为了使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玉门县委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取缔一贯道活动和打击各类反动会道门斗争。1950年4月，清查出一贯道典传师8人，坛主31人（其中23个坛主解放

后已无活动），经教育，有248人退出一贯道组织。1951年，人民政府又摧毁一贯道佛堂52处，逮捕了典传师23人，处决典传师2人。1953年，人民政府明令一贯道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开展第二次取缔活动，政府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具体事例向群众说明一贯道所谓的“消灾免难”“保佑平安”的欺骗性，让群众认识到“一贯道”不是“神”，它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而是那些反动分子装扮成的“救世主”，是封建迷信残害人民、骗取钱财的工具。据资料记载，1953年登记的典传师有16人，相当于典传师的坛主11人，坛主126人，引进师153人，一般办道人员6人，共计316人，经过教育，大部分道徒登记退道，逮捕判刑12名，处决4名，管制6名，集训13名。1968年8月，玉门市革委会保卫部在花海公社又破获一起“一贯道”反革命复辟集团案件，查获了以自封“皇帝”的王建统为首的案犯70余名、“佛坛”6处，缴获长期隐藏的反革命活动经费有：黄金15两7钱5分，白银1881两，银元745块，鸦片烟22.5公斤，各种绸缎布匹1013尺，“龙袍、凤衣”、道衣等20余件，迷信经卷57本，地富保存的变天契约15份，反动传道证件69张，以及各种迷信道具等140多件，这些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全部取缔，对为首分子视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督改造。

六、整顿民兵农会，开展“内清”工作

经过镇反运动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后，在土地改革复查

工作中，各区、乡对民兵组织、农会组织、妇女组织都分别进行了整顿，对一些不合格的，经不起运动斗争考验的，分别视情节进行了处理，进一步纯洁了各类组织队伍，增强了其战斗力。

开展“内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清除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弄清问题的性质，掌握人员的基本情况，了解干部历史，提高全体人员的思想，迅速安定情绪，以利工作。清理工作大体上分为思想动员、坦白问题、研究处理问题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学习和思想发动，使所有的干部认清清查工作的目的、意义。这样做不仅使骨干分子懂得了政策，使有问题的人也明确了政策，清除了疑虑，自觉地向党和政府坦白问题。第二阶段：坦白、交待、检举问题。在坦白阶段中，坚持了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不追不逼的原则，并向有问题的人讲清楚有问题不坦白、蓄意隐瞒其后果由本人负责。坦白的形式，除个别坦白好的典型，召开大会教育群众外，一般采取个别谈话、小组坦白、书面坦白和向主管人坦白的办法。在这一阶段，知情人大胆检举，揭发所知道的问题。大部分人能主动交待自己的历史和罪情。第三阶段：研究处理问题。根据掌握的情况，在坦白和检举告一段落时，进行登记工作。在城市，对所有干部进行登记审查，对工人建立劳动卡片，进行审查。在农村，结合土改复查，对敌伪骨干分子进行登记。玉门县、玉门油矿共登记审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三青团分队长以上骨干181人，军、政、警、宪人员共109人，对17名首恶分子和抗拒登记、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

第六章

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颁布。玉门县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9月初开始，于1952年5月底基本结束，又于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进行了复查。1950年夏，抗美援朝开始，玉门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高涨，体现了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

一、土地改革前夕玉门的农村形势

土改前夕，玉门县共有6个区，40个乡，农村人口3.42万，占全县人口总数的83%，共有耕地17万亩。其中占人口总数不到5%的地主（4.45%），就占耕地5万亩，为全县总耕地的28.9%，户均占有171亩，包括富农在内的95%的其它农户只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即12万亩，户均只有19.3亩。占农村总户数60.6%的广大贫雇农（3944户）只有极少耕地，他们终年得不到温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摧毁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求得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二、建立乡村农会组织

玉门县和平解放后，县委领导广大农民在各乡村进行了初步的清债、减租和反霸斗争。这一运动的开展，打击了地主恶霸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乡村农会和民兵组织，为后来大规模地开展镇反和土改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一次配合乡村政权建设和征粮任务而进行的斗争。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安排，从1950年9月开始，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减租清债，经济上获得了利益，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气焰，普遍减轻了农民负担，初步改善了农民生活。农民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各区、各乡村都建立起了以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具有战斗力的农民协会组织以及青年团、妇联、民兵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农会的政治优势。农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配合剿匪斗争，打击和镇压恶霸地主，稳定社会治安，为进行土改工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保证了全县土改运动的胜利完成^①。

三、宣传贯彻《土地改革法》及新规定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正式颁布《土地改革

^①《玉门党史大事记》记载：1950年，玉门县健全了各乡农会组织，并在全县6个区建立起3个区农会组织。1951年1月20日，玉门县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72人，县、区干部30人，旁听妇女2人。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玉门县农民协会。

法》，作为在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同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相比，在若干政策上作了新的规定：一是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和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二是没收地主在农村中的一切财产，改为只收“五大财产”。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三是增加了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政务院同时制定和公布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包括《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通则》以及《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等。

四、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

先行试点，总结经验

玉门县土地改革运动于1951年9月开始，先行试点，从点到面，全面铺开。为搞好这次土改工作，遵照省、地精神，县上成立了以县长傅志林为主任委员，县委书记赵子尧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赵世恩为副主任委员，以及农会主任崔鸣瑞、宣传部长冯卓超等14人为委员的玉门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具体领导全县的土改工作。同时，县委根据省党代会的决议和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结合玉门实际，对全县的土改工作做了较为周密的部署。9月，相继召开了区委书记会、三级干部会，农民代表会、青年及妇女代表会等，认真学习中央、省、地关于土地改革

工作的政策及规定，广泛宣传，制造舆论。为了先行一步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县委书记、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子尧带领由20多名各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在晋昌區北門乡进行了土改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既培训了干部，又总结了经验，随后土改工作在全县除县城三个乡以外的其它37个农业乡全面铺开。县、区、乡抽调干部和省、地下来帮助土改工作的干部共216人组成工作队（其中省上下来帮助工作的干部7人，分区下来的干部34人，县机关干部55人，区乡干部48人，积极分子4人）。

深入发动群众，广泛进行宣传

破除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必然引起各种反应和阻力。一方面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的剥削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部分农民思想上形成了“宿命论”“良心论”等落后意识，严重束缚着他们的思想。他们既希望变革，又怕得罪人，思想矛盾，顾虑重重。有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都是命里注定的，说什么“君子命穷不怨天”，有的错误地认为“土改是农民剥削地主，有伤良心”，有的怕土改得罪人，早不见晚见等等；因而，有的农民不敢和工作组接近，怕得罪地主，不积极参加会议；有的怕工作组走后，地主找麻烦；有的地主借宗族关系拉拢欺骗农民，为土改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企图破坏土改运动。

这些思想表现，进一步说明土改是一场深刻而激烈的阶级斗争。首先，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让农民自发起来斗争，从政治

上、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才能取得土改的真正胜利。面对如此情况，摆在工作组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动员，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发动农民主动地积极地参加土改运动。工作组当时采取了以下几种有效形式发动群众：（1）访贫问苦，贴近群众。工作组进村后，认真贯彻党的土改政策，采取贫农雇农一起发动的方法，先从最贫苦的人家登门入户，帮贫民老乡干活，拉家常，嘘寒问暖，贴近群众，取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再进一步多加接触，从中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启发群众觉悟，使他们消除顾虑。（2）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群众。采取的方法有，组织小型座谈会、雇农会、贫农会、中农会、富农会、地主家庭成员会、民兵会、青年会、妇女会等会议宣传；走家串户，深入家庭院落宣传；学识字，编诗歌，说快板，说说唱唱，利用文艺节目宣传；出黑板报，写标语等舆论宣传。这些工作使群众提高了觉悟，破除“宿命论”“良心观”，打消思想顾虑，积极热情地投身土地改革运动。（3）培养积极分子，建立骨干队伍。注意发现和培养农民中为人正派，勤劳诚实，办事热心，苦大仇深，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积极分子，形成了1800多人的贫雇农骨干积极分子群体。（4）农民诉苦启发阶级觉悟。工作组进村以后，通过访贫问苦，细致地掌握本乡村阶级剥削压迫的情况，通过算账、忆苦，让群众真正明白受剥削受穷困的根源，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明确土改的伟大意义和树立搞好土改的决心和信心。方法是有重点地培养典型人物倒苦水，引导受压迫、受剥削的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苦难遭遇，有理有据地控诉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恶霸的罪恶事实。小会、大会结合，妇

女、老人上台，以苦引苦，通过活生生的事实控诉、斗争，消除了贫苦农民的重重疑虑，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感情，工作组和公安、政法机关紧密配合，对那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又破坏土改运动，群众强烈要求惩办的99名恶霸公开逮捕法办，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扫除了工作障碍，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严格政策法规，划分阶级成分

群众发动起来后，开始划分阶级成分。划分阶级成分工作是以土改小组为领导核心进行的，划定成分工作政策性很强，关系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为使这一工作慎重开展，工作组首先向农民讲清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劳动状况和生活来源状况为依据来划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不能以政治态度、吃穿好坏为标准，澄清部分群众认为“划阶级就是划分贫富，越穷越光荣”等模糊认识。在普遍学习土改政策规定，群众普遍了解重要精神的基础上，由工作队组织，再在土改小组及积极分子中反复学习具体规定，使骨干力量熟悉和掌握政策，以便很好地运用。针对当时存在的有些干部政策观念不强，政治和经济不分，有的怀私心、公报私仇、打击报复和任意提高成分等问题，工作队反复强调错划成分的危害，提出了“不漏划一户地主，不错划一个农民”的要求。为了更慎重起见，工作队采取典型分析的方法，先抽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户在领导小组和群众中进行分析讨论，并试划成分进行示范，在群众基本掌

握划分标准的基础上，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由下而上“自报公议，上级批准，三榜定案”的方法进行。对地主自报成分时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说理斗争，揭露其隐瞒谎报等行为，即不漏划地主、又要防止错划。对于富农，严格按照剥削收入超过全家一年所收入的25%的标准界定，防止把富裕中农划分为富农。

“三榜”，即在大小会议上普遍划分，个人自报，群众评议，土改小组讨论评定同意的意见作为第一榜公布；报乡政府审查，农代会复审商讨，报区上审批后出示第二榜；对不同意见，再搞群众评论，对个别难以认定的，报县土改委员会划定，县委和农民协会审查通过，批准作为最后划定的成分，第三榜公布定案。由于工作慎重，发扬民主，群众工作基础扎实，新划定成分，大都比较准确。全县农村共划贫农2249户，占总农户的34.6%；雇农1695户，占26%；中农1836户，占28.2%；富农145户，占2.2%；地主288户，占4.4%；小土地所有者91户，占1.4%。

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

没收地主财产，特别是没收地主阶级赖以生存、进行剥削的基础——土地，是从经济上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关键，也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

为使没收工作慎重地按党的政策办事，防止出现一哄而起，脱离群众和政策的混乱现象，各乡都建立了没收征收组来领导此项工作。根据《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保护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原则，对富农的财产不动，而对地主的土地、耕畜、

农具和多余的粮食及房屋等五大类财产均予没收。在具体执行中，玉门县又将地主分为罪大恶极、一般和中小地主三大类型。对罪大恶极的地主的土地、房屋等五大财产给予较重的没收，只给其分配与其他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强制他们在劳动中进行改造；而对于一般和中小地主，则没收较轻，使其生活不低于一般中农水平；除没收地主的“五大类”财产之外，对于祠堂、学校、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及公地亦给予没收和征收。

分配胜利果实是土改中最复杂的工作，玉门县分配胜利果实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的。在分配前，先召开群众大会，讲解分配原则，宣传政策，提倡互助互让精神。对于没收征收的财产，按照《土地改革法》关于“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的规定，根据首先满足贫雇农、适当照顾中农和军烈属以及“有利生产，缺多多补，缺少少补，缺啥补啥”的分配原则，采取“群众讨论，适当调剂，三榜定案”的方法，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分配。全县36649口贫苦农民分得土地49297.98亩，人均分得1.3亩（原有土地不含在内），其中雇农人均分得土地2.85亩，贫农人均0.8亩，中农人均分得0.31亩；共分得房屋6710间，其中雇农每12人分得1间，贫农每13人分得1间；63%的农户分得胜利粮7198石，平均每户分得6.9斗，其中雇农人均分得粮食3.5斗，贫农人均分得粮食2.23斗，中农人均分得0.6斗；共分得牲畜4343头（其中雇农每户分得1头），分得农具及其它物件25498件。

当时，玉门县新增了一批蒙古族移民和原居住在各区乡村的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都同汉族一样地参加了土改，在分配

胜利果实时，对少数民族给予了适当照顾，解决了他们衣食住等方面的困难，体现了阶级友爱和民族团结精神。

五、土地改革的复查

玉门县的土地改革是解放后党领导农民开展的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由于正确执行了《土地改革法》，加之省地一系列文件作指导，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整个运动是成功的。但由于这场运动是农村中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又是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因此难免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和问题。

土改结束后，仍有少数地主不甘心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败，伺机破坏，企图死灰复燃，有的利用群众一时的困难，煽动落后群众到乡政府请愿，向人民政府施加压力。有的不让分了他们房子的农民从他们占着的大门出入，刁难分了他们财产的农民，企图重新夺回失去的财产。有些中农对分配的果实轮不到自己，有意见，说什么“斗地主用得着中农，分配果实都是贫农的事。”因财产的分配问题，也在一些农民中引起了不团结的现象。总之，随着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在大矛盾解决的前提下，农村又出现一些新问题，而且一时显得比较尖锐，影响着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为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巩固土改运动成果，按照省、地委的统一部署，玉门县于1952年10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认真的普遍的土改复查工作，历时半年

时间，于1953年4月结束。

这次土改复查，全县抽调211人组成土改复查工作组（其中县机关40人，区干部129人，乡干部42人）。工作组在宣传土改复查政策，重新动员群众的基础上，根据县委“将重点放在改定成分和解决回民土地问题”的指示，还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妥善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并颁发了土地证。

改定成分

成分问题是当时反应较强烈的问题，也因此影响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工作组将这一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处理，在深入群众，听取反应，广泛调查，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土改中成分划分不准确的47户重新进行了划定，其中：地主降为富农的5户，降为小土地出租的1户，降为中农的4户，降为贫农的10户；富农降为中农的7户；小土地出租者降为中农的1户，降为贫农的1户；富农提为地主的14户；小土地出租提为地主的1户；中农提为地主的4户，提为富农的1户，提为小土地出租的3户；其它成分提为地主的2户。改定成分后，对地主改为富农的，只摘掉地主帽子，其它财产保持原状，不再退还。对于漏网地主，则按土改时的规定，将“五大财产”均予没收分配。对于地主降为中农和其它成分者，将土改没收财产如数退还。

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玉门自古以来为多民族集聚之地。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境内有7个民族，汉族51641人，占总人口的99.63%；回族160人，藏族8人，蒙古族6人，满族4人，裕固族、东乡族各1人，共占0.35%；有10个民族不详，占0.02%。土改工作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凡有回民的乡，都召开了回民座谈会，听取回民对土改工作的意见，并妥善处理。对这些少数民族都在居住所在地同汉族一样地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政府对他们给予优待，加强民族团结，绝不允许汉族歧视少数民族，并在生产、生活上给予一定照顾，尊重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使少数民族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进一步增进了民族团结。

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对在土改中处理过而群众反映有意见的土地、房屋等“五大类财产”重新审理处理，对地主拖欠的财产催促交还，并对群众中存在的其它问题进行了解决处理。共处理地主反攻倒算问题114件；农民内部问题3551件，其中干部问题43件，群众问题3385件，干群关系问题123件；处理不合理分配的土地3543.68亩，房屋1613间，牲畜123头，粮食1981.62石，农具和家具等3132件。

在处理遗留问题时，还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土改中给地主划定而拖欠的3144.77石粮食催促，交出664.7石，对其余的2479.76石粮食，经群众讨论，代表大会决议，上报县政府予以免除，体现了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同时，对于能积极劳动，遵守

法纪的管制分子，缩短或取消管制时间，其中有10户被取消了管制。但对于有严重反攻行为的地主分子，则予以管制教育或逮捕法办，逮捕法办不法地主3人，实行管制18人，延长管制2人，经过打击，遏制了不法地主的反攻气焰。

颁发土地证

复查中，还合理归并了土地等级，评定了产量，为8602户农户颁发了土地房产证13113份，明确了土地房产所有权，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六、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是1950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朝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1951年5月17日，玉门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县人民积极响应，男女青年积极参军，报名1041人（其中女219）人，后经批准，实际参军的318人，并开展了热烈的慰问志愿军活动和抗美援朝捐献活动。据记载，捐献活

动至9月底，共认捐37437万元（旧币^①，折合人民币37437元），其中商人王兴明捐银子300两，教员任信儒捐银子125两，赤金区五乡工人李有贵捐钱125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25元）。还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城乡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全县23105人（占全县总人口70%以上）签名“要求和平”。

1951年5月1日，玉门油矿6000多人示威游行，反对美帝侵略朝鲜，保卫世界和平。6月8日，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玉门矿务局在全矿发起捐献“石油工人号”飞机倡议，并于10日成立矿务局抗美援朝分会，选举杨拯民、熊尚元等13人为委员。至15日，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的活动顺利完成，捐献金额1570000万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57万元）以上，超过了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价格，此后捐献活动持续进行。7月30日，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河西工作组一行17人，由组长湘流率领抵达玉门油矿，矿区职工家属4800余人热烈欢迎，当晚举行座谈会，由矿务局抗美援朝分会委员熊尚元报告本局推行“三大爱国运动”的情况，慰问团在矿区期间，召开各类会议五次，报告了中朝人民战士英勇杀敌的事迹。1952年3月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西北分团申建堂、杜海振、董克仁、马寄远（女）四人于上午8时抵达玉门油矿，全矿职工、妇女、儿童及驻矿外界单位4000余人列队欢迎，下午1时，举行报告会，由申建堂报告了14个月来朝鲜战争及有关方面的情况。欢迎大会后，矿区职工群众踊跃捐献人民币8800余万元（旧币），慰问袋及其他物品三箱。

^①旧币指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新币指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万元旧币约等于1元新币。

玉门籍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作出了贡献，1950年11月27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四二团九连副班长的叶永安，在朝鲜新兴里战斗中指挥的战斗小组，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手榴弹和炸药包炸毁敌人的坦克三辆（叶永安亲自炸毁两辆）。1951年，二十七军司令政治部命名叶永安为“反坦克英雄”，中央军委英模大会上授予叶永安为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2月，二四二团为叶永安记特等功一次。叶永安转业后分配在玉门县汽车运输队工作，1982年退休。

第七章

开展民主改革

在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同时，其他各项民主改革也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展开。

一、玉门油矿的反把头 and 民主改革

城市和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彻底消灭封建把头等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目的就是充分发动工人群众，肃清封建反动势力，依靠工人阶级清除企业内部一切封建反动分子、反动制度及恶劣作风，彻底扫除生产障碍，同时确立从车间小组直至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作风，树立职工群众新的劳动态度和创新精神，加快企业发展。民主改革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势力；各种封建把头。

民主改革大体上分三个步骤：（一）开展民主斗争。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即以政治打击为主，结合经济上的重点清算，以打击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及一切不事生产、专事压迫威胁工人、进行勒索敲诈、剥削工人劳动成果的封建反动分子，清查隐藏在工厂中、工人中的逃亡地主恶霸及特务破坏分子。即使经

过镇反、审干、劳动保险登记的单位也要坚决经过这一步，予敌人以系统的打击。（二）实行民主团结。前一段所暴露出来的内部问题，如职工关系、领导与群众关系、新老工人关系、技术与非技术关系以及工人中间的地域、帮派等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予以解决，要分清是非，增强人民内部团结。

（三）进行民主建设。即用总结经验的方法，提高工人群众和技师职员的政治觉悟，树立新的劳动态度，整顿与加强工会、青年团及其他组织，确立民主管理制度，发动爱国生产竞赛，改善经营管理，系统地订立爱国生产公约，直接为发展大生产作准备。

民主改革的主要收获。（一）基本上摧毁了反动组织及一些封建帮会、道门、团体，处理了反革命分子，大大提高了职工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二）经过一系列的生产运动、劳动竞赛，使生产由突击逐渐进入正常，由单纯体力劳动逐渐转入改善劳动组织，改良劳动工具，提倡合理化建议，开始建立智力与体力相结合的新方向。（三）彻底改革了对发展生产有严重障碍的不合理的半配给制的二十六级工资制。基本扭转了不合生产程序、轻重颠倒等不合理政策。明确了生产技术工人奋斗的目标，奠定了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基础。（四）通过生产机构的改组，消除了旧有机构中“矿、炼、工”三足鼎立、各自为政和叠床架层的组织，初步建立起统一领导的分层负责制。大量提拔了低级职员和工人干部，仅提拔为股长以上的干部112人。

（五）在发展生产运动中，逐渐摸索到生产管理上的一些经验。建立了安全制度（包括事故报告制、安全检查制），明确了复杂单位的生产职责。建立了生产负责制（包括交接班制）和初步的

成本核算制。（六）建立了全矿职工代表会和一级、二级工厂管理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民主管理职能。（七）在民主改革与劳动竞赛运动中，建立并发展了党、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这些组织形成了生产运动的核心，成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有生力量。（八）民主改革中玉门油矿不仅完成了生产建设任务，而且担负着发展西北石油基地的重任，在各种改革运动中提拔干部468人，向西北石油管理局调出干部、技工121人。

二、禁烟、禁赌及清除卖淫嫖娼

解放前，玉门花海乡、赤金乡、玉门镇附近各乡都曾种过鸦片，种植、贩运、私存小量零售及单独吸食毒品的情况颇为严重。县城内、各乡个别地方还有开赌场、烟场、妓院等毒害社会的丑恶现象。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颁布。《通令》下发后，经营毒品的情况大为减少，但一些惯于投机倒把的社会败类，勾结地主恶霸隐瞒私存，偷偷贩卖毒品的现象仍然存在，还有几人合资去南山种植鸦片，公安机关发现后彻底查禁铲除。1951年，结合“三反”运动，在城乡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采取“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一般零售吸食者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并积极检举揭发立功者从宽的政策，破获了一批贩烟毒案，从重严办了贩卖烟土的犯罪分子，当年在花海、赤金、靖边三区查禁收缴烟土122公斤，有六人交出烟土20公斤，并查出

偷吸者32人，经过教育，缴出并烧毁毒品毒具。在查禁烟毒品的同时，对赌博嫖娼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打击和教育。到1953年，长达百年之久的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等丑恶现象基本消除。

三、宣传贯彻《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也是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婚姻法》公布之后，玉门及时组织机关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各级党组织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利用各种会议和黑板报、读报组等形式，宣传解释《婚姻法》，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县委书记赵子尧还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婚姻法问题作专项报告进行宣传解释，使各级干部首先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县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婚姻登记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具体贯彻执行新婚姻法。根据党中央、政务院，西北局、省委关于贯彻婚姻法宣传月的指示，玉门县将全县45个乡（街道）分成三类，于1953年3月8日至4月18日，用40天时间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宣传月，主要做了以下六项工作：（1）做好宣传《婚

姻法》的准备工作。（2）广泛深入地在全县城乡宣传贯彻《婚姻法》。（3）发动群众揭露旧婚姻制度的罪恶。（4）正确处理各种婚姻问题。处理包办、买卖婚姻66件，早婚14件，虐待妇女61件，重婚4件，干涉婚姻自由7件，虐待致死人命3件，童养媳7件，干部违法乱纪22件，寡妇改嫁29件。（5）支持新人新事，树立学习榜样。评选出团结和睦的模范家庭71户，积极生产互敬互爱的模范夫妻152对，模范婆媳32户，执行贯彻新《婚姻法》的模范村干部39人，模范军属35户。（6）帮助群众订立公约。宣传月中批评教育打骂、虐待妇女等问题25件，教育调解夫妻和好72人，评出模范家庭71户，模范夫妻152对，模范婆媳83户，模范执行干部39人。宣传月之后，贯彻《婚姻法》纳入到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常抓不懈。

四、扫盲、学文化

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随着各项政治运动和民主改革的开展，渴求学文化、学习新思想的要求十分强烈。县委、县政府积极引导，在各乡、村组织了不同形式的识字班、读报组、夜校，学习酒泉银达乡的先进经验，不但学文化，还学政治、学思想、学唱歌、演节目、搞宣传，把冬学变成了农民热闹的场所。1950年10月中旬，玉门县各乡、村冬学先后开学，组织农民扫盲识字，当月农民参加冬学的518名。1950年，玉门县有冬学9所，识字班17个，学员473人；1951年，有4所冬学转为民校，冬学、民

校共办识字班70个，学员猛增到1641人（其中女1558人），并组织了读报组107个，参加读报组的人员达1543人；1952年，民校增加到10所，参加学习的有344人，参加冬学识字班的人数也由1641人增加到1857人，并开办速成识字班8个，参加学习的有339人；1953年，民校在上年10所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发展为20所，参加学习的人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多，达809人，参加冬学学习的达2202人。

1954年8月，全国第一次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扫除2亿文盲是今后农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玉门县委、县政府组织抽调了妇联、青年团、工会等部门的人员，会同县扫盲办公室的专职人员，深入农户，广泛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全家入学，亲邻包教，夫妻挑战，婆媳比赛”的动人场面。参加各种形式学文化的人员达7107人。全县识字班、民校、冬学培养出不少的记工员、读报员、农机员和基层干部，为当时经济恢复和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八章

“三反” “五反” 运动^①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玉门县展开了群众性的“三反”“五反”运动。

一、玉门县的“三反”运动

玉门县的“三反”运动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地委的安排部署，于1952年1月12日正式开始，7月底结束，历时半年多的时间。运动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共分“学习政策、重点斗争、定案追赃、思想建设”四个阶段，重点抓了反贪污，期间穿插了增产节约运动。

根据中央《关于在“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对贪污百万元（旧币，即人民币一百元，下同）以下，且情节较轻的126名人员不以贪污分子对待，缩小斗争范围，集中力量攻重点。对重点对象再三讲清党的政策，消除各种思想疑虑，尤其对年纪大、历史复杂的更是多次谋划、讲退路、以理劝解，使他们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对一些顽固不化，抗拒不交待的贪污分子，

^① “三反”“五反”运动是指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采用攻心战术，先攻弱、后攻强、大会压、小会挤、个别谈话，逐个突破。对证据确凿，顽固抗拒不交待的，交给公安局审查。经过紧张的围攻，接连突破了卫生院、粮食局、县二科、四科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全县抓住千万元（旧币）以下、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老虎”26个，千万元（旧币）以上大“老虎”15个。根据中央《关于处理贪污问题的若干规定》，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应降则降之，应升则升之，做到如实合理的解决问题。各单位领导亲自动手，依靠群众，组织人力，认真调查，全面分析材料，不轻信口供。有全部证据者，全定；有部分证据者，定部分；没有证据者，暂不结案，逐人逐件一一落实，使本人和群众都心服口服。按政策规定，千万元以下、百万元以上情节较轻者免于处分，最后确定千万元以上的为11个，其中区级3个，贪污总额为385608584元（旧币）。在定案工作基本结束时，紧接着进行追赃、退赃工作。追赃时反复学习中央规定的政策，按贪污分子具体情况分别进行追赃，做贪污分子思想工作，交待政策，同时做了贪污分子家属、亲友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协助，力争让贪污分子自觉退赃。对于贪污数目不大，用于正当开支，确实生活困难无力退赃者，把握政策，除给予应得处分外，可不退赃款赃物。对于狡猾狡辩，不退赃款赃物者，采用多种方法，使罪恶大、狡猾的贪污分子无法抵赖。截止1952年7月20日，退赃款11580万元（旧币，折人民币11580元），内有金子8.6两，白洋228块，均按银行规定牌价折现金入库。退赃物小麦197斤，子弹4箱1843发，皮大衣1件，其它衣服4件。

经过思想建设，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各单位在运动结束前还订立或修改了各项规章制度，订立了爱国公约，制订了增产计划，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显示出了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各方面工作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玉门油矿的“三反”运动

玉门油矿的“三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至1952年5月结束。运动中查出大小贪污分子1538人，占职工总数的28%，贪污总额30.2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30.2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下的（旧币）1139人，占贪污总人数的74.09%；千万元以下、百万元以上279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9.3%；千万元以上102人，占贪污总人数的6.6%。运动中追回赃款1663000000元（旧币），占贪污总数的56%。判刑10人，占贪污总人数的0.66%；行政处分312人，占贪污总人数的20.24%；免于处分121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79.1%。1952年5月16日，玉门矿务局人民法庭举行处理刑事案件宣判大会，对韩万麟等九名贪污分子进行了宣判。

三、城市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1952年1月，玉门县委和油矿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的“五反”斗争指示》，在玉门地区配合

“三反”运动展开了“五反”斗争。斗争中，经过群众踊跃检举和坦白交待，发现了不少问题，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用拉拢腐蚀等手段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探听国家经济情报，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有的掺杂使假，牟取暴利；有的投机倒把，空买空卖；有的抬价压价，缺斤少两；有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一运动及时打击了工商界中的违法分子，教育了工商界的广大群众，督促他们端正经营作风，改进经营管理，树立新的职业道德，提倡在经营中实行明码标价，薄利多销，做到“秤平斗满人满意，货真价实态度好”。禁止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协助国营商业的物资交流，方便了群众生活，达到了群众满意。

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解放前，玉门农业发展缓慢，石油工业虽然兴起，但生产力低下。解放后，党领导玉门人民当家作主，群策群力，发展经济，一些长期被束缚和制约的生产力迅速释放，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玉门县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解放后，贫困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得到土地的农户，积极修渠筑坝、淘泉引水、兴修水利，加强备耕生产和田间管理，政府又引导农户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2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258斤，比1949年增加66斤，增长22.6%，粮食总产量达到3246万斤，比1949年增长40.34%。1953年，粮食总产达3881万斤，比1952年增长19%。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成立后，指导农户改革旧的耕作方式，逐步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耕作技术有了提高，林业、畜牧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其它各业的发展。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49年增长113.31%，财政收入20.7

万元，比1949年的2.2万元增加18.5万元，是1949年的9.4倍。

二、石油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解放后，中央将玉门油矿列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组建了石油师，油矿党委加速建党整党，教育职工树立主人翁思想，开展劳动竞赛，强化生产组织和计划，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技术改造，加大开发力度，石油生产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勘探储量比1949年扩大了五倍；钻井方面，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钻井先例，三年共钻井18口，进尺1.68万米，并修复了一批民国时期报废的油田；采油方面，增加生产井30口，原油产量达到14.26万吨，三年共生产原油37.54万吨，是新中国成立前八年原油总产量的73.5%；炼油方面，先后建成民国时期长期未完成的真空蒸馏装置和溶剂油回收装置，建成叠合汽油装置、离心去蜡装置，建成了达布斯烈炼装置，原油加工能力达到13.77万吨，三年共炼油36.64万吨；机电、运输、油建、建工等方面也有较大发展；职工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王曰才、郭孟和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三、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商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重点抓了三项工作：一是活跃农村市场。从建立农村集市入手，活跃市场，增加农民在购买

力，决定县城十天一大集，各区五天一赶集，引导农民到集市上互通有无，进行公平交易。经过县、区政府的周密安排，农民到集市上卖鸡卖蛋、卖菜卖肉，商家推销针线、布丝、鞋袜等日用品，每逢节日，再组织一些戏班唱大戏、演小曲，一时间城乡市场火热起来，还定期开规模较大的物资交流会，有效地激活了城乡市场，使萧条的经济活跃了起来。二是发展国营集体商业。1951年，玉门县设立晋昌、柳河、花海、昌马、赤金、靖边六个供销消费合作社。1952年成立了合作社联合社，共有社员9995人，1951年入社股金28949元，1952年入社股金35733元。建社初只有购进和推销粮食、畜产品、药材等，后来逐渐发展到生产资料、日用百货、五金农具、烟酒糖果、文化用品等，承担了全县农用生产资料和农村社员的日用生活资料的批发、供应。1950年，玉门县设立商业局。1951年，玉门油矿米面菜蔬部和供销社合并，改组为供销社，隶属玉门矿务局服务处。1952年，西北贸易公司酒泉分公司接收玉门矿务局供销社，转为国营商业，成立西北贸易公司甘肃省玉门矿区支公司。1953年，西北贸易公司甘肃省玉门矿区支公司升格为分公司。1950年下半年，酒泉贸易分公司在玉门县、赤金设立了贸易商店。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控制全县和矿区的商业经济命脉，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保障市场物价稳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需要，巩固工农联盟，稳步地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三是发挥国营集体商业的主导作用，平抑物

价，稳定市场。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1）遵照上级指示，加强金融管理。（2）组建国营公司统一专营的商店、分公司以及供销社。（3）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公平交易，严禁投机倒把和非法交易活动。（4）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5）提高部分农产品价格。

四、作出突出贡献的石油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玉门油矿虽是全国最大的油矿，但年产原油只有6万多吨，职工只有4000多人，技术人员仅200人。1950年8月，玉门矿务局正式成立，原油产量成倍增长，但矿区的职工队伍严重不足。为此，1952年3月，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给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和朱德总司令写报告，请求调拨解放军的一个建制师，改编为石油工业建设大军。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五十七师在陕西汉中举行了石油工程第一师命名典礼，全师共有指战员7741人，其中师级5人，团级19人，营级77人，连级339人，排级660人。官兵中有共产党员1998名，共青团员1876名，党团员占总人数的50%左右。部队改编后，开办了任务培训和文化学习班，后又进行了专业学习，一团以钻井为主，二团以基建为主，三团以汽车驾驶为主。

1953年1月，分配到玉门的石油师人开始大量到矿，师长张振复兼任玉门矿务局副局长。一团的1200名指战员与玉门矿务局

原钻井大队合并组成钻井处，秦峰任处长；二团的1130名指战员与玉门矿务局原建筑工程队合并组成基建工程处，陈宾任处长；三团的1237名指战员与兰州石油运输总站合并组成玉门矿务局酒泉运输处，下设原油运输大队和成品油运输大队。三个团分配到玉门的指战员合计4000多人。石油师其余的人则分配到延安、宝鸡、上海等地的石油企业。

玉门矿务局对石油师人的培训和使用十分重视，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和办法。要求各厂处对石油师人的食宿、学习、工作进行细致的安排，采取跟班劳动、现场教学、开办技术轮训班、签订师徒合同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提高官兵们的业务水平和技术。石油师党委要求指战员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打破“三年出徒”的老框框，虚心向师傅学习，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广大指战员虚心拜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为师，在操作中勤学苦练，在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师徒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学习的步伐大大加快，涌现出了40天学会装窑烧砖的苏明生，3个月学会风机操作的郭成会，6个月学成司钻的姚福林，从战士成长为工程师的杜诗俊，优秀司机依党柱等先进模范人物。1953年底，油矿对石油师人按所在岗位的“应知应会”进行了严格考核，确认他们之中85%的人可以独立工作，很多人甚至达到四至五级的技术标准。

在钻井战线，推广了“重压、快转、大排量”的钻井技术，使钻井速度大大加快，多次创造出全国钻井新纪录。在基建战线，先后建厂房、住宅等40多万平方米，扩建了炼裂蒸馏装置，新建了减压、沥青、焦化装置等，建设了注汽厂、注水厂、热电厂，修筑公路1200公里，桥涵24庄，输电线路等大批设施。在运

输战线，从1953年11月1日举行原油东运典礼起，520辆原油罐车和270辆成品油罐车就日夜穿梭在千里输油道路上，至1950年7月1日，除运出原油22万吨外，还运出大批成品油，从而保证了油品外输的畅通。采油和其他战线，随着油矿内部人员的调整，一批石油师的营、连级干部担任了一线领导，直接参与了油矿开发工作。转业到炼油、机械、水电、医院、机关的指战员，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老同志的培养下，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优异成绩。

在参加石油基地建设的同时，石油师人把人民军队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提倡顾全大局，干部以身作则，团结协作，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优良传统带到了油矿，丰富和升华了玉门精神、玉门风格，大大加强了油矿思想政治工作。

1956年9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石油工人第一师的番号正式撤销，转业到玉门的石油师人和油矿职工彻底融为一体。在玉门油矿这个大熔炉里，他们中的很多人迅速成长起来，担任过油矿副局级领导的有陈宾、秦文彩、贾振礼、冯元富、石万富、张一青、李芳兰、刘品璋等，担任过处级、科级的领导干部难以统计，还有后来转到市政的玉门市第一届市长张复振、第九届市长郭学端、第一届政协主席席纪元、第二届政协主席蒋代文、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武等。随着玉门油矿历次对外支援，分配到玉门的石油师人大多数调往全国各个新油矿工作，其中许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的中坚力量，截止1979年统计，留在玉门的石油师人只剩百十来个，现已退休，他们为玉门油矿的发展贡献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五、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4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县城（今玉门新市区）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75人，列席代表2人，共计77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增强党的团结；审议通过中共玉门县委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今后的工作任务；选举县委委员和出席分区党代会代表。大会提出，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把个体经济所有制过渡到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搞好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增强党的团结，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会选出中共玉门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9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选出出席分区党代会代表11人。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4年5月18日至26日在玉门油矿（今玉门老市区）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71人，候补代表40人，代表着全矿2136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1、贯彻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总结解放四年以来玉门油矿党的工作；3、选举油矿党

委委员。大会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并领导和团结全矿职工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大会选出中共玉门油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5人，常务委员6人。选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各1人。同年11月，经省委批准增补常委2人。1955年9月，经省委批准，增补第三书记1人。

第十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玉门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

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变工队

变工队是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评工记分，生产季节结束或年度终了的时候，进行结算，一工抵一工，少出工的农户向多出工的农户补付工钱。变工队对于刚刚从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土地的农户来说是重要的，有益的。走互助合作道路既适应国情，又符合农民群众自身愿望。1950年春，玉门县开始组织变工队，并开展生产救灾，发动农民互助互济，多数乡建立起义仓^①。义仓在解放初期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中起了良好的作用。

农业生产互助组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我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劳力、耕畜、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它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散经营。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但由于换工互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量一般高于个体农户。农业生产互助组分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和长年互助组两种。有的长年互助组还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

^①义仓，旧时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社会互助形式。

产。由于互助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互助组织，它带有半社会主义的萌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互助组进一步发展成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玉门县建立互助组171个，参加劳动力2745个，占全县劳力78%。此后互助组的规模逐步扩大，有的发展成为合作社，互助的形式也进一步发展，到1953年6月15日，互助组为132个，参加799户、4039人、土地19566.19亩；临时互助组1012个、4746户、20700人；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入社9户，63人、土地244.28亩。1953年，王得忠互助组93.4亩水地平均亩产春小麦481.8斤，超过当地平均产量27%，获“大面积增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奖，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爱国增产模范奖状，奖励农具折价20万元（旧币）。

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变工队、互助组发展而来的，是人民公社的较低级形式，是在当时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为恢复生产、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成立的农村生产互助组织的高级形式，其前提仍然是土地私有制，即土地是各家各户的，合作社只是在农忙季节调配劳动力和畜力。1953年3月23日，玉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梧桐树窝农业合作社（后称下东号农业合作社）正式建立，入社农户9户，63人，土地244.28亩，社主任邓彦发，副主任杨兴荣、刘生禧。12月15日，下东号农业生产合作社9户、63人、244.28亩土地扩大到120户、743人、3769.94亩土地，同时新建了柳河乡官庄子和花海乡小泉两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两社共有62户、347人、1234.82亩土地。至1955年5月，全县共建起农业生产合作社27个，入社1335户、5905人。至1955年12月25日，全县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36个，入社农户6112户，占全县7015户农户的87.12%，此后又有大的发展。至1956年7月底，全县将125个初级社合并转为45个高级社，入社7008户，占农户总数的99.9%，全县完成农业合作化。

1958年9月，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玉门县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全县原15个乡、1个镇和玉门市所辖白杨河乡共50个高级农业社合并建立了红旗、红星、卫星、火箭、东风、跃进等6个人民公社，13天时间全县实现了公社化，入社农户100%，并有非农业户1101户加入公社，各人民公社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依原高级社为基础编成50个大队和357个生产队。

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的是国家发动和组织“把小手工业者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三个步骤：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据统计，1949年，玉门有私营手工业者634户，从业人员767人，其中木工264户，磨面40户，缝纫工69户，皮革84户，铁工91户，毛纺工51户，其它35户，年产值18万元，大都是独立经营，自食其力。到1952年5月，玉门仅剩私营手工业者89户，占总农户的1.27%。到1956年3月，全县手工业者634户，767

人，除90户，122人转业外，已组织起来138户，148人；另外，有农业社组织起来208户，248人。到1956年5月，玉门全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手工业者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三、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1952年5月，全县有私营工商业者37户，占总农户的0.53%。到1956年3月，有私营工商业118户，从业135人，除16户转业外，已组织起92户，占77.97%，资金占总金额74.82%。到1956年5月，全县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工商业者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四、粮食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是贯彻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具体步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化，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经济

的发展。

玉门县的粮食统购工作于1953年10月3日正式开始。主要经历了学习宣传、入户发动、工作准备和具体实施四个阶段。至1954年1月15日，共收购粮食773.77万斤，统购面占62%。

粮食统销工作在第一次统购过程中即已开始部署，主要是掌握思想动态，摸清人口和消费量底数，分析余缺关系，建立统销站点。然后通过自报和民主评议，制定了每月需粮计划，并发放了购粮证，12月24日开始了粮食的计划供应。玉门县粮食的供应范围是：机关干部、学校、团体、市民、矿工家属，旱峡煤矿工人、旅客运输业户，蒙古族牧民等。初步的供应标准是：机关、学校、团体干部，每天每人1斤4两；牲畜、骡马豆料每天5至6斤；部队、工人、运输业户，每天每人1斤8两。农村的缺粮户，由乡政府摸清底子后，出具证明，根据缺粮多的多供应，缺粮少的少供应的原则，控制供应数量，不断取缔粮食投机的不法行为。最初共设立两处供应地点，县城设立购销站，赤金仓库附设购销小组，各站、组都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购粮群众一般都能凭购粮证，随时买到粮食。

由于统购统销工作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核心利益，群众关注度大，思想顾虑多，工作艰巨复杂，初期进展缓慢，也存在很多遗留问题，后来经过多次完善，才逐步走向正轨和稳定。粮食统购统销，在农业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保持市场物价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满足工业化发展需求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持续多年未再革新，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1985年，中央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粮食实行合同定购与市场收

购并行的“双轨制”。

五、玉门市的成立

1953年10月26日，经政务院批准，玉门油矿矿区人民政府成立，为丁等县建制，隶属甘肃省直辖。1955年3月20日，玉门市(地级)人民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①。5月7日，经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张复振任玉门市市长。9月23日，玉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55人。代表在两天的会议中，听取了《关于玉门市人民委员会筹备工作的报告》《玉门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与会代表还听取了《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以民主的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玉门市市长、副市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结束时，张复振作了总结报告，宣布玉门市地方政权机关正式成立。玉门市人民委员会由甘肃省直接领导。经国务院批准，玉门市管辖范围以北至玉门县的火烧沟，南至祁连山的毛卜拉，西至玉门县的赤金乡，东到酒泉县的大红泉，全市面积3160平方公里。同月，玉门市人民武装部成立。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玉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5月27日至6月1日

^①以玉门油矿为基础，玉门县并未涉及。

在县城（今玉门新市区）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109人，列席代表10人，代表全县925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总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工作情况，并提出1956年的工作任务；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县人民，努力争取在又多又快的基础上，又好又省地完成1956年增产粮食2045万斤，增产棉花261万斤，开荒10万亩，植树造林1900亩，增殖各种大牲畜16142头（匹）的任务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2、选举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3、选举县委委员；4、补选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大会选出中共玉门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4人，候补委员3人，常务委员7人，书记1人，副书记1人。选出县监察委员会委员3人。

七、中国共产党玉门油矿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玉门油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6月6日至12日在玉门油矿小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00名，代表着全矿8448名党员。大会主要议程是：1、中共玉门油矿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2、玉门油矿1956—1962年的初步规划意见的报告；3、选举玉门油矿第二届委员会及出席甘肃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4、大会通过《中共玉门油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共玉门油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表扬成绩优异党员和党组织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指导思想，比较深入、透彻地讨论了早日建成祖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会选出中共

玉门油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9人，常委11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选举产生了玉门油矿出席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选出中共玉门油矿监察委员会委员4人。

玉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成就^①

建设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建设石油工业基地是中国走工业化道路必经之路，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上提出的，也是苏联向我国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建设过程中，中央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指战员、技术人才、新型设备从四面八方来到玉门，苏联、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匈牙利等国家相继派遣专家和技术工人来玉门传授经验，现场指导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技术。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生产管理大幅提高，油田面积大幅增加，设施设备不断完善，钻井纪录持续刷新，一大批技术难关被攻克，大量新技术、新方法、新纪录诞生，劳动竞赛^②如火如荼，生产形势日新月异，至1957年，原油产量达到75.53万吨，是1949年6.92万吨的11倍，占到全国的50%。1957年10月8日，新华社庄严宣告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玉门建成。

农业合作化基本建立。经过前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

^①从1949年10到1956年9月。

^②《玉门境地大事集成》记载：1953年6月22日，王登学钻井队创日进尺138.43米的全国新记录；1954年2月28日，梁文德钻井队创日进尺194.41米的全国新记录；1954年9月21日，贝乌-1207钻井队创日进尺234.3米的全国新记录；1956年5月30日，3206钻井队创日进尺601.5米的全国新记录。玉门长期保持着全国钻井日进尺最高纪录。

项斗争和后三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经济的发展初步走向了农业合作化道路，到1957年，玉门县（不包括玉门矿务局和农垦单位）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369.35万元（按1957年不变价），是1952年445.39万元的3.07倍，是1949年316.88万元的4.32倍；粮食单产266.1斤，比1953年的258.1斤增长3%，比1949年的192斤增长38.6%；粮食总产量3797万斤，比1952年的3246万斤增长16.7%，比1949年的2313万斤增长64.15%；财政收入337.20万元，是1952年20.7万元的16.3倍，是1949年2.2万元的153.3倍。地方工业、交通邮电、商业、城乡建设、科教卫生、体育文化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十年间，在党的领导下玉门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在建成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的基础上，肩负“三大四出”历史重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帮助农垦团场及国营四〇四厂的建设，经济社会曲折前进。

第十一章

贯彻党的八大精神，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贯彻八大精神，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农业生产取得新进步，地方工业开始起步，石油生产步伐加快。

一、学习好、宣传好党的八大精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

大会精神传达后，中共玉门县委、玉门油矿党委立即组织各种宣传力量，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宣传大会精神，首先是向全体民众宣传大会盛况，让人人知道大会的主题思想，认识到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充满希望的大会。接着召开各种会议，分层次宣传大会的决议、决定和提出的重要任务。在八大精神的鼓舞下，油矿工厂、车间、井队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为祖国建设多出油、多做贡献，成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广大农村也掀起了积极积肥、多打粮食的农业生产高潮。

二、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玉门建成

党的八大精神，激励了玉门油矿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一个个信心百倍。各厂矿开展了以“反浪费、保质量、打基础、求实效”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健全了以厂长负责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奖励制

度，强化了支部建设，加强了一年一度的支部工作总体评比制度和“三会一课”制度。整顿作风，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党员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矿职工实干、苦干，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奋力攻关，促使油矿开发建设进一步加快。油田建设、地面建设、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建设、技术培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57年10月8日，新华社宣布：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已基本建成。这一年，玉门油矿开井432口，是1952年18口的24倍，是1949年21口的20.6倍；职工人数3万人，是1952年5562人的5.4倍，是1949年4480人的6.7倍；原油产量75.53万吨，占当时全国天然原油的88%，是1952年14.26万吨的5.3倍，是1949年6.9万吨的10.9倍；炼化原油36.9万吨，是1952年13.8万吨的2.67倍，是1949年7万吨的5.3倍。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矿建设、石油科研、生产管理、城市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

三、兴修水利，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1957年10月25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布，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农业中长期规划，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玉门县委积极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纲要》，认识纲要对发展农业的重大指导意义，动员各区、乡干部献计献策，为改善全县的干旱面貌，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玉门镇片要修好昌马坝，引水保蓄，赤金、花海

东片要修好赤花大闸、赤金峡水库。同时动员全县人民，全民行动，掀起“执行纲要，兴修水利”新高潮。

1956年，国家投资1303万元（包括干渠投资）的昌马河总干渠引水渠道工程于8月开工。玉门镇各乡村自筹劳力，自带干粮，自带工具，轮换出工，苦战两年，于1958年7月竣工。加上由饮马一场完成的昌马河渠首、总干、北干、西干建设工程（1958年竣工），完全解决了玉门镇片及安西57万亩耕地的保灌问题。赤花大闸，位于下赤金红山寺以上的泉水汇流处。赤金、花海从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立案分水后，长期用柴草、草皮、石头压成临时分水闸，每灌一次水，都要压坝一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纲要》贯彻以后，赤金、花海群众联系这一实际问题，恳请国家帮助建设一个永固性的大闸。后来在国家投资的支持下，省、地、市积极配合，地方投劳，工程如期完工，实现了人们多年的期盼。

赤金峡水库，是玉门东半县蓄水保灌的枢纽工程，1958年3月，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工程破土动工，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人民，以赤金、花海为主，由1800名强壮劳力组成的队伍施工。大坝采取人工拉土上坝和人工石腭夯实，于1959年9月竣工，当年蓄水460万立方米，彻底解决了花海片区农业保灌问题，还为后来建设三个移民乡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全民动员筑坝、挑沟、修渠、淘泉，特别是在干旱地带人工打井，利用地下水解决缺水问题，掀起了群众性的水利建设高潮。

四、发展商业，保障供给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以供销社、贸易公司为主渠道的商业流通发展中，为适应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后职工居民迅速增多的实际情况，保障供给，玉门市于1955年成立了商业科，1956年改为商业局，下属贸易、百货、纺织品、食品等四个公司。1958年，玉门县供销社、商业局并入玉门市商业局，又增设了日杂、饮食、蔬菜、五金、机械、煤炭、糖烟酒等共八大专业公司，并在兰州、武威、张掖、酒泉设立采购站，1956年起，还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设驻站代表，在西安、成都等城市设采购组，同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购销关系，确保了各类物资的购进和供应。1966年，仅猪、牛、羊，本地收购分别为2386、213、14315头只，调进31000、1420、15362头只，并设有饲养场、屠宰厂、冷库、牛奶厂、食品加工厂、酒厂，保证日常生活的各类物资供应。玉门市面上商品丰富，购销两旺，很多外地人赶到玉门购物。

五、积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

1949年10月，玉门县成立文教科，主管全县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活动。全县划分为晋昌、靖边、柳河、花海、赤金、昌

马六个学区。1952年，玉门县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普通教育、扫盲识字教育有了发展。据1949年统计，全县受过学校教育的2670人，占应受教育人口的11.5%，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学校，1949年10月，各学校进行整顿，动员翻身农民积极送子女上学，到1952年，完小^①达到8所，初小38所，老师增至106名，在校学生3136人；1955年，全县完小增至9所，初小42所，教师140名，在校学生4436名；1956年，玉门市北坪小学成立；1958年12月，玉门县市合并后，全市有完全小学21所，初小51所，教师194名，在校学生8862人。

中学教育也有发展。1955年，玉门县中学^②教师增到17名，学生323人；1958年，县市合并更名为玉门市第二中学。1955年，玉门油矿子弟中学从酒泉迁回玉门，后改称为玉门一中；1962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在南坪建立了子弟中学。1964年为了加强农业合作的技术力量，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农村建设培养合格劳动者，全市农业中学迅速发展起来。1964年4月，玉门二中首先开办了农中班，招收学生41名，玉门镇农业中学恢复招生、赤金农业中学成立。1965年，下西号、花海、昌马、清泉、黄闸湾、柳河相继成立了农业中学。这些农业中学的建立，使玉门市中学在校学生数大量增加，为农业生产培养了大批后备力量，成为中学教育普及和发展的基础。

^①即完全小学教育。

^②玉门县中是当时玉门县的唯一一所中学，是1946年以赤金景彦武为首的玉门绅士11人，组成中学筹建委员会，在县城南玉皇阁成立的玉门县初级中学，当年招收新生一个班、36人。此后，每年招收新生一个班，至1948年扩至三个班，有14名教员，108名学生。1949年9月，人民政府接管县中学。

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起步。1953年3月，玉门油矿在玉门市东岗区成立了工人学校，设采油、修井、炼油等专业，招收市初中以上毕业生，学制三年，到1959年共招收学生1478名。1955年8月，中共燃料工业部决定在玉门成立玉门矿务局钻探学校，教职工从兰州抽调，校址在三三区，开设钻井、内燃机、汽车修理等专业，到1957年共招收学生702名；1957年，两所学校合并，成立了玉门石油技工学校，1960年还创办了玉门工业大学，招收四级以上水平的职工入学；1961年撤销，学校更名为石油工人技术学校，还从西安石油学院派来70多名教师，学校越办越好，为后来玉门石油中专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玉门油矿建立了南坪、十七区、井下处三所幼儿园；1958年，玉门市办起了第一所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之后城乡幼儿教育全面铺开。

扫盲班教育有很大进展。1951年组织识字班104个，参加5145人，对在职工人干部进行扫盲补习。据1955年统计，职工文盲比例由1950年的70%下降到24%。1957年，县扫盲班175个，累计扫盲8000余人。

文化事业

县人民政府建立后，成立文教科。1955年，市人民委员会设文教科。县、市合并后，改为文教卫生局。1951年，甘肃省新华书店派员在玉门油矿筹建了新华书店南坪门市部。1956年9月，县新华书店在县城建成开业。1958年县、市合并后，成立市新华书

店，下设南坪、玉门镇两个门市部。1951年，玉门县设立了人民文化馆，有阅览室，当时藏书1800册，报刊30余种。玉门矿务局于1951年成立临时放映队，隶属于文工团。1956年，玉门油矿工会流动放映队正式成立。1956年建起南坪电影院。1956年12月11日，位于解放门的石油工人电影院落成开业，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配座席930个，场场满座，电影事业非常兴盛。1953年，甘肃省教育工作队电影队在玉门县城放映苏联黑白故事片《幸福的生活》，是境内除玉门石油矿区外放映的首场电影。同年，县上成立了电影队。1957年，先后成立工矿农村电影队11个，其中七个队配有自备发电机。农村社队轮流放映，农民群众都能一个月看一场电影。境内的农垦系统，也在1964年成立了三个放映队。地质系统、铁路系统都各有两三个电影队。群众看电影热情很高，哪里一演电影，农民群众步行几里地以外也要去观看。

戏剧演出也有新发展。1953年，县政府组织“秦舞台”散落艺人开展戏剧演出活动。后经整顿于1956年成立“玉光剧团”。1955年，以原矿务局文工团为基础，并去西安招聘编导、教练、学生近60人，组建市秦剧团，建团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140余本，创作现代剧目20余本。还培养出了许多全国、全省的名演员，如王新民、黄秀英等。1950年，成立油矿总工会文工团，下设秦腔、京剧、舞蹈、电影四个队。1951年，京剧队撤销。1955年，秦腔队划出，成立了市秦剧团。农垦系统、铁路系统也先后成立剧团。值得一提的是，农民业余剧团也很受群众欢迎。主要有柳河乡蘑菇滩业余秦剧团、昌马乡业余秦剧团、下西号乡文化业余秦剧团，他们按农时季节随聚随散，逢年过节，农闲时节，

他们就自搭班子演唱起来，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

广播、书法、报刊、绘画、民间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

卫生事业

至1956年，县城及赤金、花海、昌马乡均成立了联合诊所。随后，八个乡均成立了乡卫生所，联合诊所并入乡卫生所。1954年9月，玉门矿务局成立卫生处，主管油矿卫生工作。五十年代，局职工医院设有外科、内科、儿科、中医科、放射科、功能检查科、检验科、药械供应科，医疗条件比县上农村要好得多，玉门地区很多大病都是在局医院治疗。同时各厂矿还设立了八个卫生所。1955年5月，石油工人疗养院在酒泉南门外正式成立，每年都有几百名老工人在这里疗养，院内工作人员50名，医务人员十名。1963年，市卫生防疫站成立，同年成立了市妇幼保健站，配有专职医生，负责开展妇幼保健工作。从1955年起，县、市卫生部门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成立各级防疫组织，疫病防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人民政府拨出专款用于贫困群众的传染病防治，城乡普遍接种各类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天花绝迹，白喉、麻疹等得到了控制，结核病、地方病防治得到了普遍重视，发病率逐年下降。1956年开始，大规模开展以除“四害”^①、讲卫生、移风易俗、改造家园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全市人民积极改厕、改水、清除垃圾、粉刷墙壁、拆洗被褥，并形成了经常性的检查评比制度，保证了全民爱国卫生运动经常开展。

^①四害，指苍蝇、麻雀、老鼠、臭虫。后又增加一害，即麻雀，称为五害。

第十二章

国营农场的初步建立^①及移民、支边青年来玉门

国营农场的建设，扩大了玉门地区的农业规模，也为玉门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增添了活力，几批青年的到来，使这种文化交流更加活跃。

一、国营农场建场前的基本情况

1950年，省委、省政府根据西北局的建议，作出“开垦疏勒河中游地区，建立国营农场群”的决定。省农林厅抽调专业人员，组建国营农场勘查团（队），对建场地址进行调查勘测，编制了《建场计划任务书》。1951年秋、冬季，以开发饮马场——蘑菇滩荒区为主，进行了渠道初步定线及农场初步设计。1952年，进行了昌马堡、双塔堡水库及疏勒河中、下游荒地的勘测，秋季在饮马场及花海营盘进行了土壤勘察，并深入附近村镇进行了农业、社会经济特点的调查，完成了流域农、林、牧初步意见及灌溉工程的初步设计。1953年，进行了玉门灌区地下水探测。1954年8月，完成了《饮马场国营机械农场调查报告》，决定首先

^①由于国营农场主要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建立的，这一时期，国营农场与玉门有一定的关联，此后交由省农垦公司管理，故本书只对国营农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之前和之后不再涉及。

建立饮马国营机械农场。饮马农场可开垦荒地面积18万亩，计划开发荒地面积20.46万亩，初步规划耕地为8.5万亩，场地四周难垦荒地和沼泽地合计约14万亩，可做为天然牧场。

二、国营农场初期建制演变

饮马劳改农场：1955年6月，根据在河西走廊玉门国有荒地筹建饮马劳改农场的指示，筹建甘肃省地方国营饮马第一农场（今饮马农场），县级建制，隶属省公安厅。随后又相继组建了饮马场第二农场（今黄花农场）、饮马场第三农场（今黄花农场青山分场）。劳改农场建场经费，列入劳改经费支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劳改方针，转变犯罪分子立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北湖机耕农场：1957年10月，省农林厅根据省委指示，将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管理体制下放到县，新建国营农场由县主办，省、专（州）协办，核定投资和任务。对兴办国营农场，“大办大支持，小办小支持，不办不支持”。随后，玉门县成立了新建机械化农场筹备委员会，县长刘宪章任主任。筹委会根据县委、县人委“迅速筹建一个5万亩规模的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决定，于11月3日开始工作，1958年计划开荒3万亩，播种面积5000亩。农场是在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一切都靠国营饮马农场的支援。后来省委决定，把肃反、整风、反右运动中精减下放的干部安排到农场去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1958年4

月，农场被确定为下放干部农场。当月，高台县、玉门县各机关团体下放干部544人（其中复转军人16人）。《国营北湖农场建场计划任务书》明确，农场总面积43026亩，可耕地23583亩。1958年11月，根据省委高速建设河西商品粮棉基地的需要，经张掖地委研究决定，北湖农场并入蘑菇滩农场，北湖农场建制相继撤销。

国营蘑菇滩农场：1958年初，根据省委安置下放干部的指示，省农林厅农垦局委托玉门县国营农场筹委会，在蘑菇滩筹建国营蘑菇滩下放干部农场，3月20日举行了建场典礼。4月3日，兰州市五人小组决定，120名两类改造人员迁送蘑菇滩农场劳动改造。下放干部抵场后即投入紧张的建场工作，采用边垦荒、边播种的办法，当年播种3598亩，其中粮食作物2052亩，收获304亩，是播种面积的14.81%，总产7044公斤，单产3.42公斤，垒建房屋面积4880平方米，基本解决了人畜过冬的住房需求。1962年，经过调整，保留了蘑菇滩农场县级建制，1963年移交给农建十一师。

三、国营农场军垦期建制演变

首次军垦筹建：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中央军委决定抽调3.6万名官兵组建农业建设部队，建设河西走廊粮棉基地，蘑菇滩农场被列入军垦农场序列。

二次军垦筹建：1963年4月，农垦部副部长张仲翰再次抵

兰，进行全面磋商，共同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河西开垦建设的报告》；10月30日，农垦部通知，经请示总理，同意甘肃省河西走廊以军垦形式进行开发。生产建设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驻玉门，为师级领导体制，受中央和甘肃双重领导，以省为主，所需物资和部分技术干部由新疆建设兵团支援。

农建十一师组建：1963年11月22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成立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的通知》，12月1日，机关在酒泉正式办公。

农业二团组建：1964年1月，农建十一师临时党委决定，将原蘑菇滩农场改编为农建十一师农业二团，为军垦开发之重点围场。各地转调军人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量充实，截止1964年4月10日，第二团职工由1963年的418人猛增至2210人。团机关以师机关建制，设司令部、政治处，团下设11个连队，农业连2个，基本建设连6个，机耕连、园林队、畜牧队各为1个连。

四、国营黄花农场

国营黄花农场位于市区西北112公里黄花滩而得名，有人口7740人，其中职工3760人。辖青山、花海两个分场，一个场直属队，34个农业队。该场1956年建场，原属甘肃省公安厅饮马劳改农场第二农场。1960年与青山农场合并。1961年黄花、青山农场分别划归西北矿山机械厂、玉门石油管理局领导，为农副业

基地。1963年又划归甘肃省劳改局管辖。1964年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管辖，为农一团。兵团撤销后，移交酒泉农垦分局管辖，复名为国营黄花农场，沿用至今。

五、安置河南移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发出了移民垦荒支援边疆的指示，随后有三批河南移民来到玉门，得到了妥善安置。

积极做好移民安置准备工作

为了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玉门县委、县政府及早着手，积极准备，动员各种力量，做好接待、安置的准备工作。1956年2月28日，成立了玉门县移民安置工作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民政部门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会同粮食、财政、银行、供销、农业合作部门的领导共同协调，负责移民的安置事宜，并相继在各乡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以各乡乡长为主要负责人，吸收共青团、妇联、民兵、农业社主任等为成员，共同负责筹划本乡的移民安置工作。移民到来前，县委做好有关方面的准备，特别在粮食、住房、灶具、生产工具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粮食部门为移民准备了足够的面粉，供销社准备了灶具、家具、炕席等。县、乡还抽调领导干部四人，一般干部30人，对安置准备工作进行认真检查督促，使移民“缸中有水，箱中有面，炉中有火，炕上有席”。

认真做好安置工作

移民到达前，县上动员机关干部80多人，城镇居民120人，并动员了60户人家给移民准备好了洗脸水、稀饭等，共同做好移民接待工作。接收移民的各乡，派来了足够的车辆，并对送往车辆编了号。每辆车固定一名干部，两名市民负责移民的吃饭、接送等事宜。在移民接待站还设立了医疗处，使长途颠簸的患病移民能得到及时治疗。由于各项工作安排扎实，井然有序，移民到达后车马有人负责，事事有人照管。1956年3月4日和6日，由学生、市民组成的秧歌队，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迎接来自河南商丘14个县的第一批移民694户，3022人。1956年8月24日，又接收了来自河南信阳地区两县的第二批移民968户，5023人；这两批河南移民共8045人，其中：有劳动力3429人，党员71人，团员160人，脱产干部37人，学生1062人，从医人员5人。1958年，根据上级安排，玉门县又接收安置了第三批河南移民，共966户，5062人，移民中有党员40人，团员50人，干部40人，技术人员54人（指铁、木、石、泥匠及从医人员）。三批河南移民累计13107人。

在省上的大力支持及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安置工作细致周到，最终使绝大多数移民安居下来，巩固率达95%以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当时物质尚不丰裕，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是艰苦努力的结果。三批河南移民，在玉门安家立业，逐渐摆脱了贫穷，也开发了玉门的土地资源，增加了社会财富，在共同奋斗过程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今，定居下来的

移民，同本地人互通婚姻，在语言及风俗上已全部融合，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玉门人。

六、天津、上海支边青年来玉门

天津支边青年来玉门

玉门县地处偏远，人才相对缺乏，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文化逐步发展，但由于缺少人才，还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步伐。1955年，中共酒泉地委报甘肃省委，并经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批准，在天津市动员招收了一批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分赴各县工作。玉门分来56名，大部分分配到各乡镇基层单位搞文秘或公办小学任教。每月实习工资为100个工资分，即32.08元，半年实习期满，定为行政26级，月工资39.16元。1956年，国家机关工资改革，天津支边青年的工资大部分定为行政25级，月工资45.9元。对表现较为突出的，定为24级，月工资52.92元。

当时，各乡的居住和办公条件都很差，特别是偏远的昌马乡、清泉乡条件更为艰苦。点煤油灯、烧柴火取暖，与天津相比，各方面都悬殊很大，但这一部分青年干部经过锻炼，还是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工作也比较认真。被分配到教育行业的青年，在传播知识和新型教学方面，为当地教师作出了榜样，在各科教学上都很有独到之处，特别在文艺方面更有特长，活跃了学校生活，促进了教学相长，为玉门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被分配

到县、乡行政部门工作的青年，也很快显示出了较高的才能，大部分都做各单位的文秘工作，在说、写、刻钢板、印文件等方面都很有专长，由于勤奋好学，爱岗敬业，政治上进步都比较快，有的入了党，有的入了团，有的当了乡和部门的领导。如金学友、王宝钰、辛锋锐、崔金鑫、孙立明、汪益洋等都先后担任乡领导或县领导，有的还成长为地级领导。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王宝钰在昌马乡担任党委书记时，工作魄力大，能力强，联系群众，被提任为玉门市委副书记，1976年带队外出考察时，不幸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上海支教青年来玉门

解放初期，玉门各学校缺乏师资，大部分教师是从旧学校接管过来的。为了充实师资力量，提高师资水平，玉门按照省、地委的部署，接收了从上海招来的支教青年30名，大都安排到县、乡重点学校任教。

因为这部分青年在上海基础教育好，功底扎实，再加上到酒泉专门进行了半年的教育专业培培训，分配到各学校的都成为教学骨干，如女教师谷滋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关心爱护学生，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班主任；柳玲宝，在玉门县北门小学、柳河乡学校任教几十年，扎根玉门，后调市区，担任中坪幼儿园园长，工作十分出色。他们远离大都市，放弃繁华舒适的生活来大西北，克服无数困难，在艰苦生活中，为玉门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第十三章

审干、肃反、整风运动及反右派斗争

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1954年开展了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1957年起，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

一、审干工作

玉门县的审干工作^①

玉门县的审干工作于1954年7月开始，由于肃反、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交叉影响，审干工作几度停顿。1958年，县市合并后又经过几次复查、抽查，一直拖到1962年1月才告结束。共审查2933人，占审查对象的99.8%，其中属于反革命问题交肃反运动处理的44人，保留问题的86人。经审查，属于长期隐瞒各种政治问题的725人，占审查对象总数的24.7%，受到党内各种处分的235人，占8%，其中受撤职以上处分的96人，占2.38%，受限制使用的439人，占14.9%。通过审干工作，基本上搞清了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了混入党政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同时更全面地了解了干部情

^①1958年12月前，玉门县与玉门市是单列的，审干工作延续到了1958年12月县、市合并以后，但为了便于表述和理解，玉门县的审干工作仍然单列。

况，为有计划地培养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玉门市的审干工作^①

玉门市的审干工作，在审干委员会的领导下，首先从审查处、厂、队长一级领导干部入手，典型试办，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55年5月逐步开始的。先对干部进行了摸底排队，共摸出了各种反革命特嫌分子89名。在此过程中，组织专案人员清除了敌伪档案，根据不完全统计，查出敌伪人员卡片282份，调查表515份，职员名册4本，伪党员名册3本。对查出有问题的人员，一一进行了处理。由于肃反、整风、反右派等别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审干工作几度停顿。

二、内部肃反运动

1956年2月，内部肃反运动开始，历时三年时间，于1959年1月底结束。

玉门县的肃反运动

玉门县根据甘肃省委、张掖地委^②的安排，参加了省列第二、

^①1954年7月，审干工作开始；1955年，玉门油矿改设为玉门市；1958年12月，玉门县上迁，与玉门市合并。为便于表述和理解，玉门油矿、玉门市的审干工作、肃反运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均以玉门市相称。

^②1955年，酒泉专署撤销，成立大区，玉门县归张掖专署管辖。1958年，玉门县上迁，与玉门市合并，由甘肃省直属。

三、四批内部肃反，按照“准备、斗争、专案、甄别定案、复查验收”五个阶段进行。第二批内部肃反是在县直属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进行的，全县参加运动的1196人；第三批内部肃反是在所属中学、完小、初小教职工中进行的，参加运动的114人；第四批内部肃反分为三期进行：四批一期是在中学、完小、初小的23个单位进行的，参加内部肃反的教职工72人；四批二期是在工商界（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小摊贩）、饮马一、二、三场、水工处、民警、剧团、煤窑等单位进行的，参加58个单位，参加肃反的有1253人；四批三期是在新建、扩建厂矿的11个单位（县办厂矿10个、民办厂矿1个）中进行的，参加肃反的有1328人。

在内部肃反之后，还开展了全民性的肃反、反坏（反贪污、盗窃、反坏人坏事）斗争及社会肃反，参加社会肃反的有6个人民公社，4处民办厂矿，1处水库，共25831人。

肃反过程中，确定肃反对象293人，甄别定案148人，其中定性为党团反动骨干分子42人，特务17人，敌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22人，土匪2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人，汉奸1人，现行反革命5人，坏分子30人，其他27人。按照政策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处理，其中判刑18人，依法管制6人，劳教70人，交生产队监督劳动34人，开除回家6人，开除留察1人，责令退职2人，开除安置生产劳动4人，单位留用察看1人，免于处分5人。

玉门市的肃反运动

玉门市的肃反运动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从1955年8月开始，1956年8月结束，参加人员是市机关等14个单位的8964人；第二批从1956年8月开始，至1957年3月结束，参加人员是13个单位的工人和中小学教员等28344人；第三批从1958年10月开始，至1959年9月底结束，参加人员是扩建、新建的地方工业及第二批漏肃和新增人员共19个单位的19811人。按照“准备、斗争、专案、甄别定案、复查验收”五个阶段进行。

运动中经反复摸底排队，共排出调查对象1421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48%，全部查清作了结论，确定肃反对象312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54%，共立专案247案，253人，甄别定案309人，查出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132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23%。对132名反坏分子的处理情况是：判刑37人（其中死缓、无期徒刑各1人）、判处管制的12人，开除公职劳教的10人，开除回家的6人，降职降薪、监督劳动的11人，给予行政处分留用改造的50人。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玉门市为例）

1957年5月，玉门市整风运动开始，整风运动历时一年零七个月，于1958年11月结束，参加整风运动的共31909人，其中：工人、营业员26898人，干部6452人。运动历经了大鸣大放、反右派

斗争、整改和交心四个阶段。

学习文件和鸣放阶段

整风运动开始后，玉门市委先后组织学习了省委规定的有关文件，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经过学习，党员干部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产生“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产生“五气”（官气、骄气、阔气、娇气、暮气）的根源，是产生违纪违法、腐化堕落行为的根源。运动开始后，玉门市先后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下设秘书材料组、工作指挥组，各基层党组织也相应成立了五至七人的整风领导小组。在组织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于6月中旬进入鸣放阶段，参加鸣放的干部群众有35609名，其中群众（包括工人、营业员、人民警察）有28927人，干部有6682名。鸣放的内容有五个方面：（1）对党群工作的批评和建议；（2）党群关系方面的批评和建议；（3）对生产管理的批评和建议；（4）对党员工作作风的批评和建议；（5）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疑问（如工资评定、福利待遇、建议和审干结论等）。

玉门县的鸣放意见，主要针对粮食统购统销、牲畜喂养、移民安置、供销社商品供应等方面展开。

反右派斗争阶段

鸣放是为了广泛征集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然而极少数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却想借力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这一复杂而严峻的局面，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标志着整风运动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击右派敌对斗争。

玉门市委于7月初转入反击右派斗争。各整风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把每个人在鸣放中的言论、家庭成分、个人出身、社会关系、平时工作表现和历次运动中的政治态度及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类排队。对排队中的三类人员采取了团结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方法。使左派力量得到加强，右派受到严厉批判。

整改阶段

1957年12月，为认真贯彻“坚决的改、大胆的改、彻底的改”的方针，各大口成立了改进工作委员会或整改办公室，基层单位、小队一般都设立了整改小组，全力以赴进行整改。在这期间，干部主动引火烧身，鸣放面达98%，共贴大字报6万多张，反映出了生产管理混乱而造成的浪费现象，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机构庞杂，人员臃肿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于是又开

展了以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为重点的整改工作。一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简机构方面：市政系统共撤销合并行政职能机构17个，市委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撤销了部分基层党委部（室）的建制，团市委的宣传部与学生部合并，市工会与石油工会合并等，玉门油矿机关原12个职能处室减为8个，47个科减为27个，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机构和中转环节也进行了精简。在精减人员方面：共处理编余干部1993人，其中长期下放当工人的629人，短期的95人，下放基层工作的76人，上山下乡242人，自愿请长假回家的54人，组织动员回家的20人，退职158人，退休9人，送职工学校309人，停薪留职9人，其他392人。二是结合整改，广泛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组织各种座谈会、小组会，设立鸣放接待站、意见箱、鸣放园地等形式，使95.5%的群众参加了鸣放，贴出大字报50763张，召开座谈会3011次，提出意见137769条。三是借鉴整改经验深入开展“双反”运动。这期间共贴出大字报16400多张，鸣放意见达41000多条，全面揭露了企业及市政系统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尤其对部分干部花钱大手大脚、生产建设以及生活福利贪多求全、喜新厌旧、大材小用、追求高标准的铺张浪费现象进行彻底揭发和尖锐批评。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浪费现象是严重的，仅计划不周、管理不善就造成损失千万元，与此同时，为了杜绝漏洞，开展了群众性献交公物器材运动，如运输处收回器材工具7万多件，收回废旧钢材1000多吨，自动注销了当年购料计划20%。

在“双反”运动中，还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干部1178人，占干部总数7.11%，并对这些干部中的右倾保守及“三风五气”进行

了深挖细究，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发生了深刻变化。

交心阶段

交心阶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展开。市委在8月11日前后，用五天时间召开了近300人的知识分子大会，着重强调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技术与群众结合、教育与劳动结合、个人与集体结合是知识分子交心和制定红专规划的核心内容。通过学文件，写大字报，开座谈会，组织展览，互相献礼等形式开展了交心运动。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3000多人的知识分子兴无灭资群众大会。

在当时的情况下，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错误，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压制了社会的民主意识，使很多正确意见和有益的批评建议不能反映到党内来，选拔干部重点强调工农出身、思想红，甚至没文化也可当干部，知识分子受不到重视，从多方面助长了“左”倾错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思想感情受到了伤害。被处理的人，长期在政治上受到压制，子女受到株连，有的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摘了帽子，进行了平反。

第十四章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玉门贯彻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施了大跃进，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①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6月4日，玉门市委举行广播大会，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市4万人收听了广播动员；6月6日，玉门县委发出《关于大力宣传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决定》。

玉门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6月11日至17日在县城（今玉门新市区）举行。着重提出了苦战三年（1958—1960），改变玉门面貌的工作任务。1957年，全县播种面积18.054万亩，1958年计划扩大到27万亩，粮食作物亩产在1957年295斤的基础上，1958年争取达到450斤。水利方面，正在集中1800多人修建赤金峡水库，决心改善干旱面貌和灌溉条件。会议指出，苦战三年，改变玉门面貌的奋斗目标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咬紧

^①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牙关、鼓足干劲，三年粮食单产增加一倍，全县平均亩产达到600斤，棉花亩产达到80斤；工业、交通要突飞猛进地发展，三年内工业要办到社，县属工业产值要赶上农业。文化、教育、卫生和技术改革等方面也要相应赶上。会议号召全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族各界人民积极团结和行动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灯塔照耀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苦战三年改变玉门面貌、工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而奋斗。

玉门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6月17日至21日在玉门市（今玉门老市区）召开。会议号召，全市干部、工人、群众，要政治挂帅，解放思想，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陋习，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的声势，奋勇前进。要立足石油工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排除万难，苦战三年，为把玉门市建成一个工农并茂、以石油为主体的先进工业城市而奋斗。

二、大跃进运动

1958年1月，全国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2月，中共甘肃省委二届二次会上，根据中央南宁会议提出的“苦战三年，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精神，号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劲，猛烈“跃进”，迅速向社会主义和大自然进军，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甘肃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四十条^①”“十年指标，

^①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

一年完成，三年过河，五年跨江”，发出了《关于春节前后开展宣传运动的通知》《通知》对全省农业、工业等方面提出了被中央视为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实现的高指标，要求各地生产计划要有“三本账”（即原订生产计划指标、跃进生产指标、再跃进生产指标）。根据省委的通知精神，玉门县、玉门市先后召开了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初步安排了跃进的目标和任务^①。

农业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玉门县按照地委安排，批判了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召开了全县大跃进动员大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生产高潮，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积肥造肥、深翻改土、改革工具等运动。1958年4月5日，玉门市2600余名油矿职工家属，到赤金开荒，支援农业大跃进。水利上，动员1800人修建赤峡水库，解决了花海灌区及赤金乡两个村，共5.15万亩耕地的灌溉困难。疏勒河渠道治理工程，于1958年10月竣工，建成了昌马河总干渠引水渠道工程，修建了疏勒河总干渠。发动全县农民挑沟、淘泉、修塘坝，实现水利大跃进，天大旱，人大干，无水也种苗，无雨大增产，并积极开展人工挖井，挖掘地下水，战胜干旱，赤金、清泉一带大跃进中，共组织打井65眼，使“昔日火烧沟，今日清泉流”。由周恩来总理签名奖给跃进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进

^①总路线发布于1958年5月，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1月，前者指导后者，在时序上互有重叠。

单位”奖状，鼓舞了全县农民打井抗旱的信心。大跃进中还掀起了积肥造肥新高潮，羊粪下山，滩粪进地，人人上地提筐，下工交粪，干部带头，一手提筐拿粪叉，一手拿笔搞调查，坚持不懈，形成制度，社员每天交五斤肥料，所有干部（包括学校教师）每月交肥100斤，还组织青年突击队、铁姑娘班、基干民兵排，举上红旗，打上横幅，风餐露宿，搞深翻，拾野粪，拔绿肥。土地深翻，月月比，天天比，争先恐后，比学赶超。争办化肥厂，开挖绿肥坑，大造声势，人人都唱“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

工业大跃进

在农业战线大跃进的同时，工业方面也制定了“跃进”计划，提出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提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1958年4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支援发展地方工业作出规定，要求充分发挥国营工业和现有地方工业的作用，分别指导，系统负责，以大帮小，制造设备，培训人员，在短期内建成一批新厂矿。

玉门首先是石油工业的跃进。很快掀起了以技术革新、多产油、多出产品、增产节约为主题的石油工业建设新高潮。各厂矿、井队、单位根据各自情况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争做生产能手。1957年，油矿工会在全矿职工中开展了“门门技术要革新，多快好省是方针，一人一计一件宝，个个都做智多星”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8年3月3日，老君庙油田钻成第一口

深井，井深达3003米。提出了年产百万吨的指标任务，层层为100万吨石油而战。共青团1200人参加誓师大会，召开2000名青年参加的向党报喜大会。1958年8月，成立了全国第一支“三八”女子钻井队，这支由十几个省的42名女同胞组成的队伍，战严寒、斗风雪、征服戈壁，不仅打出了许多生产井，还打出了不少探井、水井，先后被石油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授予先进集体光荣称号。1959年，女子代表队的代表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系统群英会，刘少奇副主席亲自授予“女钻”锦旗。接着，采油厂成立了第一支女子采油队。1958年8月，提出了“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快马加鞭进军吐鲁番，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号召，开展夺标杆竞赛活动，王进喜为队长的贝乌五队，首创钻机整体搬家，9月份进尺达到5009.74米，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该队被评为全国石油钻井标杆。9月，全线开发鸭儿峡油矿。1959年，石油产量达到140.3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石油工业的跃进带来了玉门地方工业的快速发展。1950年至1956年，玉门除玉门油矿外，只有四家国营企业，即早峡煤矿、被服厂、食品加工厂、小农具加工厂，有职工885人。1958年大跃进中，工厂增加到18户，主要有早峡煤矿、煤球厂、轻工机械厂、制砖厂、木器厂、造纸厂、天然油厂、炼铁厂、被服厂等，职工达5054人。1958年12月，玉门市化工厂建立，最初有职工28名，用土法生产烧碱、硫酸、炭黑、溶剂硫化碱等产品。各社队也兴起了办五小工业的热潮，大办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矿、小农机，“土洋结合，分秒必争，因地制宜，遍地开花”，促进农业机械化。

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玉门财贸、教育、文化、卫生等各行各业全面制订大跃进计划。

财贸部门调整了机构，减少了流通环节，实行工农商三结合，扩大商业网点，精减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

教育系统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了“播红旗”“拔白旗”运动，号召师生走“又红又专”道路，反对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白专”道路，抽调机关、企业、部队转业干部充当中学班主任（称为“红旗班主任”），召开教育工作者积极分子誓师大会，决定1960年普及初中教育，1965年普及高中教育，十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大办农业中学和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农民技术夜校，各学校大搞勤工俭学，开荒种地办农场。

文化方面，向文化堡垒发起总攻。识字班、扫盲班再次兴起。仅玉门县，基本达到脱盲标准的青壮年13718人，加上以前达到脱盲程度的青壮年，青壮年87.67%达到了脱盲标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各地都制定了文化发展规划，县上办好文化馆，乡镇成立文化站，各大队都要建立文化室、各生产队要有图书室、读报组，办好黑板报、宣传大跃进。电影队要在边远农村多放映。倡导社队组织业余剧团、文工团、宣传队，自编自演身边的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

卫生医疗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坚持卫生医疗工作向农村倾斜，好医生下乡，爱国卫生运动普及。1958年3月29日，玉门市

举行除“四害”讲卫生广播动员大会，要求苦战七昼夜，向“五害”大举进攻，实现“五无”城市，除“五害”行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大炼钢铁

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1958年9月14日，中共玉门市委成立钢铁指挥部，第一书记刘长亮亲自挂帅，书记杨志范担任总指挥，决定在全市建立三个炼钢点，要建立一支1400人的钢铁大军。9月16日，刘长亮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全力支援钢铁生产，大战100天，完成当年生产任务。会后全市掀起大规模大炼钢铁运动。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市（包括玉门县吐鲁番勘探处）共炼铁2987吨，加上调往兰州的废钢铁288吨，共完成3215吨铁，炼钢2083吨，超额完成了省上分配的任务。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有1176名钢铁战士被评为红旗手，有114名钢铁工人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据计算，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市共损失342万元，其中原玉门县损失27.2万元，吐鲁番勘探处损失9.5万元。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玉门积极贯彻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乘着大跃进的热潮，在赤金乡试办人民公社。9月11日，在赤金乡办起全市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

全乡近万名群众举红旗，打横幅，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热烈欢庆人民公社的成立。紧接着，县委抽调干部63人，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各乡协助建社。至19日，将全县15个乡、1个镇和玉门市所辖的白杨河乡5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立了红旗、红星、卫星、火箭、东风、跃进等六个人民公社，13天时间全县实现了公社化，入社农户100%，并有非农业户1101户加入公社。各人民公社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依原高级社为基础编成50个大队和357个生产队，玉门市还在市区办起了城市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

人民公社突出了“一大二公”的特点，一般的公社都在2000户左右，成为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单位，实行政、社合一，党的一元化领导，即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工作都全部集中到了公社，公社要管生产，管政权，还要管社员生活。实现公社化以后，各地普遍实行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一，生产组织军事化，就是把所有参加生产劳动的各类人员组成军队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分别建立团、营、连、排、班。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小队为连，小队以下又设若干排，小组为班。第二，劳动战斗化，就是从县社到各大队像革命战争年代打仗一样，把生产任务分成一个个战役，一场场战斗，把劳动力分成兵团、突击队、专业队，进行一场场大会

战，如水利大会战、开荒大会战、积肥造肥大会战等。第三，生活集体化。首先是组织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会战到哪里，集体吃到哪里，住到哪里。农村基本上实现了食堂化，以生产队为单位，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许家中开伙。收掉了各家的锅灶，粮食搞“一平二调”^①，大刮共产风，出现了许多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

农村大办公共食堂

根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及生产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共产主义或半共产主义的管理要求，为适应大跃进热潮的高涨，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于1958年国庆节前全部办起了公共食堂，男女老幼都在食堂里集体就餐，实行以户按人分等级的定量标准。以发粮票、饭票、菜票的方式进行管理，并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集体经济的靠山，谁都不能蔑视，一定要积极办好。生产队除在食堂有专职的管理员外，还必须由一名副队长抓食堂工作，管社员生活。食堂办得好不好是对待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刚开始大家都放开肚皮吃，浪费十分严重，比着吃了不到三个月，便成了坐吃山空，加上浮夸风，虚报产量，征过头粮，公共食堂开始定量，限量，社员吃不饱，还不许说不好，虚夸风渗进公共食堂，坚持一年，到1960年，开始低标准，瓜菜代，生产队抽出劳力挖野菜，采树皮，打野生，搞

^①“一平二调”是指大跃进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内部所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二调)。

代食品，千方百计地巩固公共食堂。随着粮食紧张局面的加剧，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允许重病社员按标准打粮回家做饭，到1961年底、1962年初，公共食堂慢慢散伙，农民吃大锅饭的时期结束。

浮夸、共产等五风盛行

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背客观实际，使大跃进调子越唱越高，发展速度一时竟成了执行总路线的判断标准。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

四、玉门县、市合并

根据1958年9月9日国务院第79次全体会议关于撤销玉门县将玉门县并入玉门市的决定，1958年11月26日，将玉门县并入玉门市（省辖），玉门县人民委员会从28日起正式停止对外办公。县、市合并时，玉门县干部职工共有1037人，其中党群政法313人，农林水牧99人，文教卫生220人，财粮贸306人，工业交通99人。安置情况是：上调市级机关203人，下放公社195人，留基层工作508人，其他处理33人（含精减回家15人，开除7人，下放基层劳动7人，法办4人），原有6个人民公社合并为4个^①。

县市合并是石油工业大跃进的产物，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政

^①即玉门镇、赤金、花海、昌马人民公社。

策的片面性，对玉门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全面完整和长远科学的认识，虽然玉门县上迁后确实对石油生产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上迁后的第二年就使玉门石油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140万吨，但也为玉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市政远离了丝路古道，远离了农村各乡镇，城乡发展顾此失彼，形成畸形，最终走上了一油独大的局面，以致于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石油资源枯竭，面对市场经济，玉门长期陷入了经济低迷的境地，不得不在全国经济转型之前提前实施经济转型，最终还是进行了城市的二次搬迁。

第十五章

在曲折中艰难纠“左”

1958年秋冬之间，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开始进行纠正，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又使纠“左”转为反右。玉门经济社会因此反复波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左”倾错误的蔓延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石油工业方面提出，1959年原油产量翻一番，实现220万吨，要求钻井进尺达到150万公尺，是1958年30万公尺的五倍；炼油处理60万吨，比上年新增10万吨；总产值达到40563万元。农业方面，提出1959年粮食单产达到710斤，总产达到1亿斤，力争实现千斤市。^①这些不顾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的高指标和高口号，虽然取得了一时生产总量的上升，但

^①小资料，“二五”时期（1958年—1962年），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至“二五”期末的1962年，全市基本建设投资额达1596.36万元，是“一五”时期的7倍多，尤其是1958年至1960年3年间投资占5年投资额的97%，而这3年用于基建“五小”补助的投资额达1014.20万元，占3年全部财政支出的58.79%。196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原计划为7550.50万元，实际只完成852.29万元，仅占计划的11.30%，其中工业产值只完成449.95万元，占计划9%；农业产值完成402.34万元，占计划15.68%。同1957年相比，粮食总产下降23.47%，棉花总产下降60.90%，油料总产下降44.40%，大牲畜下降30.50%，原煤下降40.2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24.40%。职工、农民的实际收入和人均占有的粮食均低于“一五”时期。

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也是巨大的，就以玉门油矿来说，正是由于不顾地层压力的变化，高强度地进行抽油、注水，导致了许多油井过早老化，使油矿的自然压力长期得不到修复，造成了后来几十年采油成本的大幅上升，也加快了玉门油田的过早衰老。大炼钢铁中，许多钢铁质量低劣，出现了大量不合格工业产品，损失巨大。农业方面，则由于共产风盛行，前期粮食浪费严重，导致没有粮食储备，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农村普遍出现饥饿甚至饿死人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后来全力以赴抢救人命的时期。

二、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认识和纠正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玉门将大跃进时期的342个生产队划分为413个生产队，将44个生产大队划分为59个生产大队，将四个人民公社划分为八个人民公社，其中玉门镇大公社划分为玉门镇、柳河、黄闸湾、下西号四个人民公社，赤金公社划分为赤金、清泉两个公社，花海、昌马两个公社不动。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使“越共越好”“越大越好”的思想有所限制。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防止了“一平二调”的无限扩大。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各级对“左”倾错误的危害开始有所认识，并注意纠正。1962年7月23

日，中央工作组（3人）到酒泉，并确定以玉门为重点进行调查，另抽调8名干部（省委2人、地委1人、玉门市委5人）共11人组成调查组，除对全市的总情况进行了解外，并对工作基础好，生产力破坏较轻的赤金公社和较差的昌马公社进行了重点调查。工作组在玉门20多天，着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家支援农业、产品交换、商品粮、机动粮，以及精简体制、干部作风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三、从纠“左”转向反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最初目的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但由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引发，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为了贯彻中央和省委精神，玉门市委于1959年8月28日发出了《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意见》。1959年10月5日至22日，玉门市委又召开了第二届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影响，把他们的市场搞得小而又小”。会议还作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十一次全委会议（扩大）决议，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会议对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批评斗争，杨志范、赵宗鼐、崔林桐三人分别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成了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

至1959年12月底，全市共贴出各类大字报36.7万张，提出各类意见34.1万条，村镇和街头巷尾大字报铺天盖地，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内查外调，各种批判会名目繁多，白天劳动上班，晚上学习开会，揭发犯有错误的干部。

1960年5月，全市参加反右倾运动的干部激增到9933人，占干部总数的96.62%。经过四次摸底排队后，一类5862人，占39.02%；二类3520人，占35.44%；三类551人，占5.54%。排队情况是：12名市委委员中，一类9人，二类3人；6名市委党委中，一类4人，二类2人；21名高级干部中（包括管理局），一类19人，二类1人，三类1人；39名市机关干部局长中，一类26人，二类8人，三类5人；164名厂处级干部中，一类116人，二类32人，三类19人；53名公社党委干部中，一类38人，二类8人，三类7人。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入发展，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乱轰乱斗、乱定性、乱戴帽子、乱撤职、无线上纲、无休止地揭发批判，使干部思想高度紧张，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四、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自1957年至1961年，玉门市批判斗争并处理过的人中，有20%属于定性准确，有30%属于处分过重，而50%属于错误处理。从全市情况看，有的党员干部因实事求是地反映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或对领导的某些错误提出批评而被当作反对党的领

导，否定成绩，被打成“右倾”。这些错误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破坏了党内外团结，制造了消极因素，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为了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1961年4月27日，省委作出了《对反右倾运动中的错案进行复查的决定》，并召开了省委组织工作会议。5月20日，玉门市成立了甄别办公室和案件复查委员会，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对有关方针政策进行了学习讨论，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和甄别。甄别平反工作中，凡在历次运动（玉门市在这时期共经历了查产斗争、整风整社、反右派、拔白旗、全民算账、反冒尖人物、反右倾、新三反等八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农民、工人、学生和党外人士都进行甄别。甄别平反工作共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自1961年4月开始至12月结束，主要工作是对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批判处理的382名党员、干部问题进行复查甄别。第二期，1962年1月至8月，主要对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处理的案件和第三期拔白旗、查产斗争及日常处理的错误进行甄别。同时，自1961年11月至1962年1月，结合贯彻农村政策，下放核算单位等工作，市委派专干与公社党委一起，采取逐个登记，通过群众讨论，分清是非后一起甄别的简便方法，对农村八个公社几年来批判处理的406名不脱产干部的问题，也进行了甄别。第三期，1962年6月以后，根据省委指示，对近几年运动中批判处理的工人的问题进行摸底，旱峡煤矿、邮电局对工人中八个案件进行了甄别。

在对玉门市^①及其社队的问题进行甄别平反中，对完全处理错了的给予彻底平反；对536人给予部分平反；重新处理406人。对错误处理开除了党籍、团籍的，恢复组织关系；对开除了公职的，恢复了公职并补发了工资；对下放劳动的干部，都由原单位调回分配了适当工作。有46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复职并分配了领导工作，占应安置的95%，有23人补发了工资，占应补发总数的88%。因和甄别对象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同时得到解脱，平反一个人，解放了一大片。但由于当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对有些问题还不能给予十分正确的结论，留下了不少尾巴。

五、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三次代表大会^②

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12月21日至31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445人，候补代表18人，列席代表97人，共560人，代表全市（包括油矿）各条战线的16580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传达甘肃省第二次六级干部会议精神、中共甘肃省委第五次计划会议精神和石油工业部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中共玉门市第二届委员会向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玉门市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选举中共玉门市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共玉门市委监察委员会；选举玉

^①此时玉门市已与玉门石油管理局分设，为县级市。

^②玉门县市合并前分别召开了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列为第一、二次。

门市出席甘肃省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号召全党和全市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新的胜利阔步前进。大会选出中共玉门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21人，常委八人。选出第一书记一人，书记处书记三人。选出玉门市出席甘肃省第三届党代会代表14人，选出中共玉门市委监察委员会委员八人。

第十六章

抢救人命共渡难关，支援大庆油田

1959年至1961年，全国连遭自然灾害，加大跃进后果，口粮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外流严重，在这种形势下，玉门积极抢救人命。

一、抢救人命

严峻的形势

据统计，1958年市属粮食总产量是3863万斤，1959年降为2709万斤，减产29.9%；1960年是2468万斤，比上年又减8.9%，仅为1957年的65%。1960年棉花总产量14.36万斤，是1957年的62.43%；油料总产量73万斤，是1957年的92%；年末大家畜1.79万头，比1959年下降29.5%；猪1957头，羊53557只，鸡4869只，都比1957年大幅度减少。由于虚报浮夸产量，又引发了高征购（征过头粮），征购粮普遍占实际产量的60%以上。全市1960年粮食实际总产量2468万斤，至11月27日，已征购入库1411.78万斤，占总产量的57.2%，完成征购任务留下种子、饲料等用粮后，社员平均粮食（原粮）非常低。其中：1958年为235.5斤，1959年下降为215斤，1960年只有170斤。与此同时，城市干部、职工和居民的口粮

供应标准也不断降低，蔬菜和副食品严重匮乏，饥荒笼罩了农村和城市，大批社员为求生活外流他乡，甚至出现了因饥饿导致死亡的情况。因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城市、厂矿、机关、学校中普遍发生浮肿病，仅西北矿山机械厂和市商业局、党校、砖厂四个单位就有浮肿病人3122人，许多人处在“命在旦夕”的紧急关头，“抢救人命”迫在眉睫。

节约用粮，加强管理，共渡难关

面对粮食紧缺的现实，为了弥补高征购后口粮的不足，不得不特别强调“颗粒还家”“节约用粮”，加强食堂管理，用所谓“代食品”调剂生活。1959年9月，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农村各公社、农场，抖麦桔、扬麦衣、收回每粒粮食；12月，又要求各公社狠抓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加强公共食堂管理，开发“代食品”等。1960年2月，市委书记刘长亮在市委第二次农村会议上强调，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做到月月有计划，天天有安排，顿顿有打算，量米下锅，按人做饭，实行忙闲有别，干稀调剂，粗细搭配，增加营养；3月，市委发出狠抓蔬菜生产的指示；2月4日、2月21日、9月21日，市委三次召开全市副食品会议，部署大搞副食品生产，发动群众共渡难关；4月10日，市委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要求各级党委也要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党委要有一名专职书记，行政要确定一名领导专管生活福利工作；5月30日，市委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调整了生活福利委员会组成人员，市委

决定主要领导分片到基层安排群众生活和抗旱生产工作，一系列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改进食堂管理和具体操作的措施连续出台；6月24日，刘长亮在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报告中要求，要大搞副食品生产，城市各部门年底以前普遍达到一人一只鸡或一只鸭，一人二分菜地，五人一口猪或一只羊，条件好的力争超过；7月15日，刘长亮在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要求，社员庄前屋后，闲滩空地种的粮食，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不能计算在社员预分的口粮以内，要办好公共食堂，安排好社员生活，要把蔬菜种好管好，从1960年7月到1961年6月，保证每人储备600斤蔬菜，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干部都要亲自抓一个食堂，门口挂牌子，分别负责；8月，市委根据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三次召开扩大会议和公社、农场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低标准，瓜菜代”方针，介绍了赤金公社、花海公社号召群众扬麦桔，扩种秋菜，采集野菜，代食品，挖鼠洞，储存冬菜，大量晒干菜，腌咸菜，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经验和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和办法未能扭转生产大倒退，生活大困难的趋势，农村社队粮荒日益严重。1960年8月，全市粮食产量核实为5109.85万斤，9月份再次核实为4400万斤，11月最后落实为2468万斤，粮食越算越少，安排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10月16日，市委决定，农村每人每年口粮按210斤至230斤（原粮）安排，平均每人每天实际吃粮0.5斤，随着农村口粮标准的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每月每人降低2.8斤。

进一步加大力度安排群众生活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11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2月，汪锋^①任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纠“左”、抢救人命力度加大。市、社两级对群众过冬、吃粮、疾病、人口外流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同时成立医疗队，进行了巡回治疗，市上领导也分头到各公社集中力量大搞“代食品”，到1961年1月15日，农村采集代食品130.2万斤，各公社、生产队和工作组选派较强的干部抓食堂，发动群众评选炊事员和管理员，把群众爱戴的党团员和优秀分子选拔到食堂中来。

12月22日，地委下达玉门市急需绵羊毛2000斤，山羊毛5000斤，皮衣1000件；12月23日、24日，全市各农村公社放假两天，让社员打柴收拾锅灶，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各户打粮回家做饭的临时办法。到1961年1月8日，打粮回家做饭的已达3098户、

^①汪锋，1961年1月至1967年2月兼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1月，在甘肃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中央任命汪锋为省委第一书记。他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全力以赴救灾。他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散农村食堂，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领导全省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全省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加之中央及兄弟省市的支援，农业连续三年丰收，产量翻了一番，扭转了甘肃的困难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被关押。1977年平反。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增选），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0852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29.3%和26.5%，有几个食堂的社员全部打粮回家；设临时病房，集中治疗患者，成立营养灶。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坚持少扣多分原则，减免农业税和水费30万元，保证广大社员增加收入；兑现社员自留地，平均每人占自留地0.18亩；纠正“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实行“三包一奖”^①。到1961年春，情况有所好转。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在抢救人命的工作中，给3288户、11451人（占总人口的26%），发放各种救灾款50.8万元，棉絮50个，皮大衣219件，棉衣服6117件，被褥455床，皮帽200顶，羊毛7000斤，打猎子弹3900发，棉花24633斤，棉布130000尺，红白糖1475斤，白酒4200斤，甜酒1500斤，各种调料1430斤，煤油35吨，煤炭7000吨，农村公社三年回销粮食2225万余斤；仅1960年就派出去新疆拉运粮食汽车121辆，运回粮食1800万斤。另外，城市各单位职工捐棉衣、绒衣、鞋帽5362件，分别发放给困难农户。市上统一抽调卫生人员221人（其中省上18人），至1960年12月底，下放药品7300公斤，医疗部门配置消肿散12044.15斤，全部用于抢救危重病人，仅1960年第四季度给农村提供各种药品价值125837元。参加打猎的26个队、192人，捕猎野生肉食38421斤，有计划地宰杀、淘汰羊3700只，宰肉127675斤，淘汰牛65头，驴42头，猪19口，宰肉25416斤，都全部用于农村病人的营养补充。

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由于全党动员，政策落实，物资兑现，医疗即时，工作到位，社员生活安排扎实，健康状况有明显

^① “三包一奖”制是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的简称。

好转，抢救人命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后旱情逐年减轻，全市农业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发展，1962年社会粮食总产量达3300万斤，比1961年的2829万斤增长16.0%，社员年人均口粮达287斤，比上年增加60斤，加上自留地产粮人均口粮达360斤以上，每人每天可吃到1斤粮。1963年玉门市农业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4744万斤，比1962年增加1444万斤，比1957年3850万斤，增长23.2%，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年人均433斤，加上自留地产粮人均口粮达551斤，保证了社员吃饱的基本要求。

二、支援大庆油田建设

1960年2月12日，石油部召开全国石油系统主要厂矿领导干部电话会议，部署开展大庆油田会战任务。电话会刚一结束，玉门就开始进行人员、设备、物资等方面的调查摸底工作。2月21日，石油部在哈尔滨召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焦力人在会上代表玉门四万多名石油职工，接受了“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的光荣任务。2月28日，玉门石油管理局召开了有2万多名职工参加的动员会，会议指出：“大庆大油田的发现，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对于迅速解决国家需要石油资源和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大庆会战的态度是衡量我们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具体尺度”。“玉门在大会战中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战区开辟工作，所以兵要精兵，将要强将，要做到人员成套，设备成套，

机构成套。”3月12日起，由局长焦力人带领一个分指挥部、一个运输处、一个钻井队共1286人奔赴大庆，其中包括和王进喜一同参加了全国群英会的孙福德、薛国邦、彭佐猷、盛爱邦、李生福等劳动模范，六天以后，先头部队446人抵达萨尔图，3月25日，1286人全部到达。4月8日，石油部发来急电，要求玉门向大庆支援一批建筑安装人员，玉门立即组建了由五个科室、一个建筑队、一个安装队共1000人组成建设大队，由油建公司经理欧阳义带队，从4月23日至5月3日，分七批奔赴大庆。4月20日，按石油部人事司通知，从玉门抽调两个采油大队、一个注水大队，不到半月，由738名干部和工人组成的三个大队组建完毕，从5月5日至8日，分四批奔赴大庆。5月26日晚，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余群立主持召开局务会议，专门落实石油部要玉门再调六个钻井队支援大庆的问题，最后决定抽调即将完钻的1281、1282、1283等6个钻井队，连人带钻机到大庆参加会战。6月15日，由钻井、机修、水厂等方面组成的870人，于6月16日开始，分六批开往大庆。截止1960年6月底统计，玉门支援大庆钻机13套，汽车20辆，大型设备40余台，大小工具配件1929箱，重晶石粉380吨，总吨位为4643.96吨，共发火车整车109次，零担37次，空运11次。8月1日，又调给大庆1900余人，同时决定调去设备117台，约占玉门油建公司总设备的60%左右。9月，按照石油部的指示，玉门再次组建两个采油大队共400人，于当月到达大庆。

1961年1月28日，石油部指示从玉门调干部职工3053人，从2月份开始，以上人员分11批陆续抵达大庆。10月，再从玉门调2004名职工，并带家属1537人，分15批到达。

1962年，再调去大型钻井队三个，地质队八个，共540人。

据不完全统计，大庆会战期间玉门共派去了1.6万人。仅1960年至1962年，就有13283人，其中：局级干部2名，处级干部15名，科级干部90名，工程师18名，技师35名，技术员163名，其他干部918名。工人中四级工以上的1052名，平均技术等级2.9级，随职工迁往大庆的家属4000余人。大庆会战中的五面红旗，有四面红旗被他们夺得，会战期间的八大老总，有六人出自玉门，还有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

第十七章

贯彻“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 肩负“三大四出”重任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经济持续下滑，三年困难向中央经济政策提出了警醒，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明确，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颁布实施，工农业生产在调整中恢复性发展，生产秩序好转，经济开始活跃。

一、贯彻“农业六十条”，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农业六十条”经历了三次修改，农村政策渐次放宽，先是界定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各自的责、权、利，确立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是取消了曾经被认为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最后明确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政策出台后，玉门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一是四固定^①基本不动，个别调整。队与队之间相差过于悬殊的，通过会议，个别调整。队与队之间的协商本着等价交换、调剂余缺的原

^①指土地、牲畜、农具、劳动力相对固定，集体所有，统一调配。

则进行。二是大队企业下放原则是利于生产、利于发展，大队同意放，生产队同意要，就可放下去。三是铁工、木工、油场、水磨、胶轮车、羊只全部下放到生产队。农具：小型的全部下放，大型的所有权归大队，使用权归生产队。林木：生产队土地范围内的树木下放生产队所有，对树木太少的生产队可划给一些用材林。水利：大中型水利原则上谁兴谁管谁受益，小型渠道跟土地走。储备粮：为了便于调剂余缺和救灾，解决五保户、大队干部和企业人员吃粮，在分配征购任务时可增加4%—6%的储备粮，大队管理，由社员代表大会决定使用。债务：大队债务从大队企事业受益中归还，还清后再给小队分配，社员个人债务以实际情况按还、转、减、免的办法处理。提留：生产队的公益金，大队提30%，用于文教事业，生产队留70%用于五保户和特困户；生产队的公积金大队提20%—30%，大队从生产队总收入中提2%的行政管理费。四是分配大包干：公社给大队包指标，大队给生产队包任务，公社不直接给生产队包。按人按畜，按总产确定比例，再确定任务，1962年计划征购的粮食950万斤、油料21万斤、蔬菜1322万斤，全部分到大队，再包到生产队。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必须保持精干，人数不可过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律不脱产，大队设党支部、管委会、监委会、团支部、民兵、妇联等组织，配备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文书各一人，其他组织的干部均为兼职。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一至两人，会计、保管各一人。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工资，实行定额补助，鼓励他们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调整后，全市公社干部为129名，比原来的176名减少47名，减少26.7%，大队干部182

名，比原来的295减少113名，减少38.3%；生产队干部1692名，比原来的1445名增加247名，增加17.1%。干部确定以后，健全了组织生活，研究制定了劳动定额管理、财务管理、牲畜管护、农具保管等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大队、生产队的职责，群众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二、贯彻“工业七十条”

1961年9月16日，中央下发了“工业七十条”，玉门石油管理局于11月20日^①召开全局职工大会进行学习贯彻。“工业七十条”的实施，使大跃进的混乱局势得到扭转，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得到落实，企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真正做到了有人管，有人抓，会管理，能解决，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思想得到了抑制，规章制度得到明确，企业领导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效释放，生产秩序好转，产量稳步增长，效益提高。

三、肩负“三大四出”重任

在建设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的同时，玉门勇敢地承担起了“三大四出”重任。“三大四出”，就是要求玉门成为全国石油工业的大学城、大试验场、大研究场所，为全国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一句话，就是要培育、

^①1961年12月15日，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分设，玉门市改为县级市。

支援、孵化全国各地的新油田。1953年3月，川中喷油，玉门立即制定了支援方案，钻井公司一半机关干部开赴川中，其中有局级1人、处级3人、科级16人、队长68人，1个钻井大队、1个试油大队、5个培训队、1个维修队、1个运输大队陆续抵达；在川中，七年内先后组织了四次战役，直到1960年，才迎来了它的新生，中国人终于从四川的腹腔里掏出了石油。1955年，克拉玛依出油，玉门派出1个钻井队、2个地震队、1个重磁力队、2个试油队、1个射孔队、1个电测队，携带全套设备出战新疆，拉开了培育、支援、孵化克拉玛依油田的序幕。1959年，大庆油田出油，需要全国各油田进行会战，玉门派出了包括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在内的1.6万人，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经验、技术和设备。1963年，石油部决定，在玉门油矿的主持下开发长庆油田，玉门人从领导到工人，义不容辞，慷慨激昂，跑步南下，开始了七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于1970年开发出了这个中国第一的油气田。1958年，玉门组建了吐哈油田勘探大队，1991年，首列满载石油的火车抵达玉门，吐哈油田历时33年的初建期宣告结束，年产300万吨的油田终于进入了中国油田的序列。

四、国营四〇四厂在玉门建成

中国核工业集团四〇四总公司，是我国第一批建设起来的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核工业生产科研基地。1958年3月，经中央批准，邓小平亲自圈定，在玉门境内定点兴建。

1956年11月20日，开始了四〇四厂选址工作；1958年5月31日，邓小平亲自批准了选厂报告；3月至6月，完成了地质勘察；10月开始，在全国各省、市调集大批人员，进行施工建设。1959年，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在工程建设的起步时期，四〇四厂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干中学，学中干。

苏联的技术援助，对中国核工业的建设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后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华的一切技术援助，给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核工业造成了重大困难。1960年春，在四〇四厂工作的苏联专家陆续撤走。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1960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贯彻中央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口号，决定缩短战线，集中精力，争取时间，加快建设。将四〇四厂工程分一线和二线，一线工程争取在1964年底前拿出合格产品，二线工程暂缓建设。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四〇四厂又处于最困难地区，不仅建设物资供应困难，就连人们正常的生活供应都难以保证。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四〇四厂建设大军的信心。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央和省上给四〇四厂特供生活必需品，全国各有关部门、有关省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大力协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终于在1963年使一线工程全面建成。1964年5月，拿出了合格产品，实现了二机部提出的奋斗目标。1969年，玉门动员全市基干民兵支援四〇四厂建设，开挖了战备渠，把昌马水库的水引入了四〇四厂，支援了二

线建设，到1970年代初，二线工程建成，我国大型综合核工业基地初具规模。

1965年，为加强对国营四〇四厂的领导，甘肃省根据中央指示，在基地成立了甘肃矿区办事处，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地区级行政权力，四〇四厂形成了政企合一的体制。矿区总人数近3万，在赤金五华山建设了生活基地，玉门人民为基地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短途运输力，积极支援了矿区基地建设。甘肃矿区办事处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对基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〇四厂从1963年一线工程建设到80年代，数万名职工奋发图强，历经艰辛，先后建成了几十条生产线，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为振国威、军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生产、生活基地都建在玉门，也为玉门人民带来了骄傲。

第十八章

经济调整中的反复和曲折

七千人大会之后的经济调整并不顺利，1963年，“左”倾思想再次抬头，使调整工作出现了反复。

一、贯彻调整方针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通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中央七千人会议之后，市委领导全市上下各行各业开展调查研究，说实话，讲实情，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调查研究后普遍认为：一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犯了“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对粮食增产的幅度估计过高，严重脱离实际；四是很多方面只图数量，不要求质量，没有长远打算；五是只要求高速度，不顾客观规律，欲速则不达。这就认清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尤其是石油生产坚持跃进再跃进，1959年完成140万吨，后来节节下降，实践证明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通过贯彻中央“八字”调整方针，对农村生产关系、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基本建设战线、企业生产管理等方面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和各项生产指标，从实际出发进行了调整和修订，使各方面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初步扭转了恶化的经济形势。这期间，农村社员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瞎指挥得到制约，共产风逐渐消退，基本核算单位放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被取消，“一平二调”错误得到纠正，农业生产稳中有增；石油工业方面，对油矿的生产状况进行了科学评估，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大炼钢铁不再提倡，大量人员归队，各项规章制度重新恢复，新的制度不断制定，厂长负责制逐步落实，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节约意识得到加强，生产计划进一步科学，整个产业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不再一味地追求高指标，生产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产业的稳步前进。

总结起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年—1965年），尽管中间出现过“左”倾思想的干扰，但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1965年，玉门市工农业生产已恢复和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各行各业都有新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97.5万元，比1964年增加279.14万元，增长27.4%，比1962年增加445.2万元，增长52%。其中：工业总产值674.78万元，比1964年增加201.87万元，增长42.7%；农业总产值622.72万元，比1964年增加77.27万元，增长14.2%，比1962

年增加220.38万元，增长54%；粮食单产305.7斤，比1964年增加21.2斤，比1962年增加112.3斤；粮食总产4437.15万斤，比1964年增加388.91万斤，增长9.6%，比1962年增加1531.35万斤，增长52.7%。

二、“左”倾思想再次抬头

1962年底以前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具有恢复和整顿的性质，但未能触及到我国经济体制中一些固有的弊端。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在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同时，改善经济建设的内外部结构，为以后的发展创造条件。但1962年9月24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发出了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左”倾思想的再次抬头，对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形成了很大的干扰，使得调整只能在困难中曲折地前进，注定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善的，最终未能将国民经济引导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以至于发生了后来的批判刘少奇、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玉门工业、农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缓慢前进的。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这个宏伟设想随着此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逐渐淡出了对经济建设的指导。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纯洁了干部群众的思想，但由于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使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央八届十次会议召开，会议把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风”，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随后批判了“单干风”和“右倾翻案风”，并对一些地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①进行了批判。

1964年1月19日，市委在全市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先行在赤金公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试点。4月下旬，根据西北局《关于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加强工作团的决定》，按照每个公社配备三至五名，生产大队配备两至三名，生产队至少有一名脱产干部的要求，在全市共抽调干部158人，充实

^①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

到工作团，其中脱产干部98人（内有高干1人，县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21人，参加过酒泉试点的45人），积极分子60人；党员117人，团员22人。除七人组成机关工作队外，其余共组成十个大队工作队，平均每个生产队2.1人。运动于5月25日结束，历时四个月。

8月末，玉门市委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从8月27日到9月24日，参加会议的有17级以上党员干部44人和党员部、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七人，共51人；后一阶段从9月25日开始，扩大到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市委直属企事业单位党总支、支部书记和国家机关科级党员干部14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历时56天，10月21日结束。会议在省、地委工作组的直接帮助下进行，贯彻了中央五月工作会议和省党代会会议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以解决市委领导核心问题和玉门市党内突出问题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揭露市委领导和玉门市党内的矛盾和问题。同时，根据西北局《批转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座谈会的报告》及西北局《严厉打击“四不清”和其他坏分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等现行反革命》的电报指示，经市委讨论，认为完全符合玉门市的实际情况，立即动手，组织力量认真解决玉门市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问题。会后，在全市开展了“打尖子”运动。在具体做法上，强调“打尖子”运动是“四不清”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由贫下中农揭“四不清”干部的盖子，从中选出“坏中之坏”作为尖子，进行夺权斗争。全市有一个大队和11个生产队夺回了被“阶级敌人”“篡夺”的

领导权，逮捕法办了民愤极大的“坏中之坏”七人；对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43名干部，进行了批判；对17名尖子进行了斗争。经过批判斗争，有8人被夺权，7人被撤职，7人被停职，8人被改选，待查13人，并查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现金3.3万元，粮食8.83万斤，工分25500分，棉布和布票2035尺，油、肉等2600多斤。

1965年1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四清”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原来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修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2月到1966年2月，玉门市按照《二十三条》开展了以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2月12日至28日，玉门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分两期分片进行，第一期12日至18日，第二期22日至28日。参加会议的共1948人，其中市级机关干部56人，公社干部94人，大队干部179人，生产队干部1191人，贫下中农代表428人。会议的主题是以《二十三条》为武器，依靠贫下中农代表，揭露干部中的问题。通过大会动员，典型示范，分组发动，个别帮助相结合的办法，启发干部自觉“洗手洗澡”，层层放下“包袱”。在放“包袱”的过程中，召开了政策兑现大会，仅2月14日一天就有115名干部放“包袱”1617件。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会前交待出现金38991元，会上交待出42598元（不包括面上社教数字）；会前交待出粮食70784斤，会上交待出粮食90419斤；会前交待出棉布、布票3040尺，会上交代出1148斤。其中“千字号”以上五人，500至1000元的有八人。

4月下旬，各公社均召开了三干会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会期7至11天，于5月上旬结束。参加会议的共2891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二十三条》，干部放包袱和思想建设；第二阶段，讨论比、学、赶、帮，安排生产，推动生产新高潮。会上有1443名干部放下“包袱”，占与会干部总数的69.7%，共交待出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现金40312元，粮食73778斤，粮票1969斤，工分32187分，布匹和布票1800尺，油、肉、胡麻等食物4798斤，猪等大牲畜94头，还有木料、家具等。初步摸清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状况，在1913名三级干部中，好干部696人，比较好的895人，问题多的干部283人，性质严重的39人，其中已斗争夺权4人，撤职9人，改造、停职9人，待查处17人。在全市438个生产队中，明显烂掉的有80个，占18.3%；还有44个有怀疑，占10.9%，两项合计29.2%。在59个大队中，明显烂掉的3个，占5.1%；还有7个怀疑，占11.8%，两项合计16.9%。问题多的公社党委和管委会3个。会后，市委逐个解决了公社领导干部班子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整顿公社领导核心，调整了问题多的公社党委和管委会及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

1965年9月15日，中共酒泉地委玉门市“四清”工作团和工作团党委成立，从省级机关、国营器材公司、8120部队、敦煌石油运输公司、3984部队、省军区、酒泉专区机关和本市抽调干部、积极分子1437人。全团共组建工作队（组）8个，于9月21日进驻7个公社、1个林场（已进行过社教试点的赤金公社除外）、49个生产大队、348个生产队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至1966年2月底结束，历时五个多月。这次运动仍以《二十三条》为指针，以清政

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为目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直接领导运动和生产，原有班子的干部一律“靠边站”。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系统“四清”阶段。这段工作大体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清经济。清查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方面的问题；第二步，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把清出来的大量经济问题梳成辫子，开展“三忆、三算、四查”^①。具体做法是：（一）开展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斗争，内查外调，只要是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就是对的。发动广大群众算清“政治上的压迫账，经济上的剥削账，生产上的损失账”，上挂下联把“当权派”当活靶子来批。（二）以公社或几个大队连片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只要是对干部有意见的都可以参加。许多积极分子在初期整干部是运动的动力，到民主革命补课和对敌斗争阶段又成了运动的对象。（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揭阶级斗争盖子，为民主革命补课做准备。（四）以整党为核心，开展对党、团、妇女、民兵组织的整顿。党团员经过整顿后重新进行登记。开展运动的7个公社和1个林场共有党员997人，通过整党，取消党籍152人，其中开除党籍27人，不予登记的77人，劝退45人，取消预备资格3人，给予

^①即忆旧社会的苦，算地富的剥削账，弄清谁养活谁的问题；忆解放以后四类分子是如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算四类分子的破坏账，弄清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如何勾结地富，打击贫下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算他们的“四不清”账，弄清和平演变的危险性；查忘本、查上当、查危害、查根源。

其他党籍处分的55人，缓登的121人，党员受冲击面达33%。

二是民主革命补课和对敌斗争阶段。按照西北局十六县座谈会《关于民主革命补课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精神，“四清”工作团对这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重点是：（一）补划漏划的地、富成分，全面评审四类分子，挖掉反动会道门；（二）斗争和制服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顽固不化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用讲阶级、议阶级、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谁养活谁的阶级启蒙教育方法，计算剥削量，清查专政对象，摸清各种专政对象的底子和现实表现。重点查漏，解决漏划、漏管问题。具体工作中，第一步进行敌情教育，战备动员，进一步落实对敌进攻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材料准备。（1）进行战备和对敌斗争动员，既要讲清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又要讲清敌情的严重性。（2）对漏划的地主、富农漏网的“四类”分子，需要戴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放手发动群众再揭发，再查对，再核实。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对现有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评审，并结合评审开展揭发，批判和小型斗争，然后大会斗争时再宣布戴上帽子。（3）漏划的地主、富农，经群众讨论同意和上级批准之后补划出来，发动群众清算其政治压迫账和经济剥削账。（4）以大队为单位指定专人和成立专门小组认真清理敌伪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全面摸清反革命的社会基础。（5）发动群众充分揭发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打击牛鬼蛇神，清算其危害群众、危害集体、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第二步是开展对敌斗争，重点是斗争和制服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顽固不化的坚持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1）选择重点，先行一步。每个公社选择一个斗争对象，准备充分，召开大型斗争会。（2）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普遍展开对敌斗争。（3）总结对敌斗争战果。加深对群众的阶级教育。运动中，对已认定土改中没收不彻底的地主、富农的财产，没收了其多出的房屋9间，羊7只，股金477元，其他实物折价5270.38元；清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粮食873800斤，现金（包括实物折价）399200元；有73名干部，由于犯有严重的“四不清”错误，受到纪律处分，占干部总数的2.1%，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8人，斗争后被定为贪污盗窃分子的12人，占干部总数的0.34%；斗争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47人，补漏划地、富14户，共揪出各类分子26人。

三是全面建设阶段。全面建设主要是指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组织建设方面，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党组织、管委会、贫协、共青团、民兵、妇女、治保等组织正式成立和健全起来；建立了党支部三大制度，农村政治工作制度，健全生产队、生产大队的管理制度；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普遍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搞好党员、团员的审查、鉴定、登记处理和发展工作，以及贫协、民兵、妇女等组织的审查、调整、发展工作；搞好干部的调整、选举和训练工作。在思想建设方面，主要是继续深入开展毛泽东思想教育，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高潮，做到思想政治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领导落实，辅导员落实）和坚持经常性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制度。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文化室，把学习文化和开展革命的文娱体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对干部和群众继续进行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为人民、为革命

的教育。

在这次运动中，有78%的干部因“四不清”错误受到了批判，有62%的公社党委和36.7%的基层党支部被“夺权”，有298名党员因各种原因被处理。运动中共揭发出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28人，被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干部19人，混入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人。在运动中，还没收地主大烟537克。

玉门市“四清”运动，从总体上看，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善集体经济管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变干部工作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执行了左的错误指导，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将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尤其是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不同性质的问题当作了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对有些人的问题定性不准，处理不当，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在运动中又采取了许多极“左”的错误做法，不少社、队大搞逼、供、信，使个别人死于非命，含冤九泉，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二、城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城市主要是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1963年4月24日，玉门召开了动员大会，对运动作了全面部

署，并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安排意见》。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抽调十名干部负责运动的具体工作。市委七名常委中，有四名常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方面，并确立工交、文教、卫生等大口单位要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其他直属党委、总支也都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或抽调专干，负责运动日常工作。运动分为两批进行。第一批：市直党群机关、市人委机关、政法系统和第一、第二中学及市区各小学。第二批：各工商企业及各事业单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批从5月初开始到6月底，为一、二阶段，7月初进行第三阶段，8月底基本结束。第二批5月初开始，到6月中旬为第一阶段，6月下旬以后进行第二阶段，8月初进行第三阶段，9月底基本结束。同时由地、市委11人组成工作组，于5月3日开始，在食品公司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试点工作。

第一阶段：通过召开各种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职工，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指示精神，使职工群众正确认识厉行节约的必要性和“五反”运动的政策界线。在此基础上，各机关各事业单位以抓增产节约为重点开展反浪费算细账活动，检查本单位存在的各种浪费现象，找出本单位工作、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组织职工进行专项讨论，边整边改，提出切实可行的增产节约措施，层层落实。同时，各单位还迅速掀起劳动竞赛热潮，形成一个比赛有对手，学习有榜样，赶超有目标，帮助有措施和人人讲节约，班班比增产的好势头，一些亏损企业逐步走出了困境。

第二阶段：市委在抓好增产节约的前提下，号召各级领导积极“下楼检查”。经过“下楼检查”，切实解决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等问题。一是结合农村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吸收城市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市委主要领导分别在农村、城市科级以上党员会议上作“下楼检查”；二是所有下乡、下厂干部回机关，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部部长在机关全体科级以上干部和本部门全体职工会上作“下楼检查”；三是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在所在党支部或干部范围内进行自我教育。由于领导带头检查，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再同群众见面，使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胆地向各级领导提出诚恳的批评意见。

第三阶段：进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单位，放手发动群众，凡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问题必须一一揭发出来。在此基础上采取个别谈话、政策攻心和小组说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斗争。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开小型批斗会，摆事实，讲道理，分别批判。在斗争中不轻易戴帽子，不轻易作结论，坚决禁止打人、骂人、扣人等逼供信的做法。同时组织专案力量，进行细致的调查落实，切实做到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1963年12月4日，市委发出了《关于全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进展情况和进一步的安排意见》，在市属35个单位中，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职工4097人，其中干部1248人，工人2849人。运动分三批进行。由于在指导思想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将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

题作为阶级斗争，“左”的偏差愈来愈严重，最后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合并入“四清”运动，发动群众在城市机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三、学雷锋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学雷锋活动在全市城乡各系统、各厂矿、各学校、各条战线迅速广泛开展起来。一是行动快，声势大，范围广，影响深，效果显著。首先是广泛宣传、大造声势。活动一开始，全社会、各单位、各层次都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的事迹，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雷锋的评价和题词。一时间，全市城乡，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人都在谈雷锋、说雷锋、讲雷锋，广播中听到的是雷锋，节目中看到的是雷锋，歌声中唱到的是雷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活雷锋。好人好事到处可见，层出不穷。二是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宣传部门，学校、妇联、共青团、工会积极协调，紧密配合，把学习运动不断引向深入，深刻认识雷锋是共产主义思想光辉典范，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具体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雷锋事迹给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活的教材，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正是推动生产、工作、学习和各项事业前进的动力。引导各单位学习雷锋抓关键，把学习

雷锋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三是认真总结抓典型，突出抓好青少年。在学雷锋活动中，全市城乡出现了许多先进典型。玉门石油管理局职工医院护理师何全珍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雷锋成长的道路，就是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学习抓住了根本，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鼓舞了她。1963年9月，当病人需要输血时，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150ml血献给病人，11月份，用自己的嘴巴吸取了病人有毒的痰汁，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还经常帮助病人洗衣服、理发、洗头、准备针线包，病人有情绪时，她耐心做思想工作，帮助病人坚定信心，战胜病痛，恢复健康。她认为，只要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病员们都称她是人民的好天使。

全市少年儿童学雷锋活动更为出色，城乡中小学呈现出了明显特点：一是和雷锋叔叔比童年，召开雷锋童年故事会，使少年儿童体会今天的幸福生活。二是开展校园有趣的各项活动，各学校少先队举办了雷锋事迹的报告会、展览会、故事会、演讲会、朗诵会、诗歌会，学校到处都有学雷锋的黑板报、学习园地。三是学雷锋见行动，在学校课间、上学路上、体育场上到处可听到孩子们讲雷锋的故事，到处见到“红领巾”做好事的场面，有的帮做值日，抢着搞卫生，有的主动给五保户、困难户抬水、打扫屋子、洗衣服等。四是学习雷锋钉子精神，刻苦学习成风，原先有些厌学不求上进的孩子，听了雷锋事迹，记住了雷锋在学习上发扬钉子精神，学习有了很大的动力，有些班学雷锋活动开展得好，学习成绩也提高得快。五是发扬雷锋艰苦奋斗精神，各学校，普遍开展了学雷锋节约“一分钱，一滴墨水，一张纸、一

粒米，一截铅笔头”的“五个一”活动，从小培养艰苦节约的精神。各学校团、队开展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活动，对从小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品质起了明显的作用。

为了使青年中的学雷锋活动更加深入，团市委对1963年度的“四好支部”“五好青年”“优秀团员”和“优秀团干部”进行了命名和奖励，授予张俊生、董桃园、魏然花^①为“学雷锋积极分子”。1964年4月17日，共青团甘肃省委在玉门市召开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号召全省农村团组织学玉门、赶玉门，大搞青年丰产田、文化田、试验田，在新的农业生产高潮中充分发挥青年突击作用，使全体青年，以雷锋为榜样，成为活跃在农业战线上的一支勇敢的突击队。

四、干部学习焦裕禄

^①魏然花，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生于1941年。高小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58年参加工作，为玉门市南坪钢铁女子门市部营业员，后调往青岛石油化工厂工作。魏然花参加工作后，担任生产最前线的服务供应工作，她工作不计时间，工人三班倒，随时都可以买上东西。她经常把副食品背到工地，送到井旁，还送货到职工宿舍。还挤时间主动为生病工人打开水，送药，做病号饭，帮助工人拆洗被褥，缝补衣服。在夺油大会战中，主动为前线送饭，并随时掌握各班组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把生产进展情况贴到商品货架上促使班与班的竞赛，鼓舞石油工人超额完成会战任务。她说：“只要工人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1961年4月，玉门市商业系经开展了“学南坪，赶南坪，学魏然花，赶魏然花”的劳动竞赛。10月26日至28日，《甘肃日报》连续报道魏然花的事迹，并发了题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社论，号召服务行业学习魏然花，搞好服务。魏然花于1962年出席了甘肃省第四次先进生产者代表会，1963年出席了甘肃省五好职工代表会议，1965年出席了商业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受到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66年出席了全省工交、财贸“五好”“六好”代表会议。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随后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玉门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领导干部都要以焦裕禄为榜样，对照自己的工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找差距。要把焦裕禄精神变成自己的精神，结合各公社、各单位、各部门的实际，找准学用结合点，把握工作的着力点，像焦裕禄那样献身人民，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改造山河，治沙、治风、治水、改造旧面貌，创造新生活。

五、李志歧培育“玉门一号”

李志歧，“玉门一号”^①的培育者。玉门市清泉公社白杨河大队，地处海拔2100米的祁连山山脚下，高寒干旱，无霜期四个月，春小麦亩产只有100多公斤。60年代初，李志歧是玉门市清泉公社白杨河四队的队长，他一生热爱农业，热衷农业科技，一直是大队的科技试验员。1964年，李志歧开始以“一穗传”搞育种试验，焦裕禄事迹宣传后，他暗自下定决心向焦裕禄学习。当时，条件很差，为了度过低温，他把自己家的煤块搬到实验室，踏着一尺深的雪去砍柴加火，整日整夜守在育种玻璃瓶跟前，大年初一都顾不得回家，家人给他送去水饺，他还顾不得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培育成功了“玉门一号”小麦高产品种。1971年，32.4亩试验田，亩产达到1025斤，这在当时条件

^①指小麦品种。

下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年，《甘肃日报》报道了“玉门一号”育种的全过程；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引我们夺高产》，赞扬了李志歧科学试验夺取粮食高产的先进事迹。1974年，“玉门一号”小麦品种被作为当时河西地区的高产优良品种在中国农业展览馆展出，受到了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64年1月15日至22日在玉门市（今老市区）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224人，候补代表5人，列席代表27人，共计252人，代表全市城乡2704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听取和审查中共玉门市第三届委员会向第四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2、审议和通过玉门市1964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建议的报告；3、选举中共玉门市第四届委员会。大会提出1964年要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继续深入地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抓住阶级斗争之纲，运动同生产紧密结合，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大会选举出中共玉门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21人，常务委员7人；选出书记1人，副书记2人；并选出中共玉门市委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成就

玉门油田肩负石油工业“三大四出”重任，在成功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之后，承担了“三大四出”重任，孵化、支援了新发现的各大油田的建设，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江汉油田、长庆油田等。“三大四出”主要集中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期间玉门为孵化、支援各大油田的建设，派出了十多万产业工人，向各大油田支援了大量的经验、技术、人才、物资和设备，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大力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诗人李季写道：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探索和实践了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式。这种探索是艰难的，也是曲折的，期间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的农村政策调整，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农田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为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粮食亩产由1956年的256.2斤，发展到1966年的375.4斤，基本达到了自给。

培育了铁人精神。王进喜入党以后，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迅速成长，在争上白杨河、大战三角湾、开展进尺比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党、爱国和奋勇拼搏的精神。1959年，王进喜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见到了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缺油的实际情况后，他的思想得到了洗礼。得知大庆油田要开展会

战，王进喜积极报名参加，到了大庆，只有十多天时间就被称为铁人，这个过程就是铁人精神的形成期。铁人精神分为形成期、成长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其中王进喜在玉门生活、工作的37年里，正是铁人精神的形成期^①。

^①详见附录。

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对玉门的影响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在玉门同样经历了发起、扩展、造反、夺权、文攻武卫等阶段，干部群众对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玉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工农业生产及社会各项事业克服政治运动的冲击，曲折地向前发展。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印发了“五一六通知^①”。5月29日至6月4日，酒泉地委召开党委会议，学习贯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形成贯彻意见。7月6日，玉门市委根据地委安排，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并做了专题研究。7月8日，玉门一中30多名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十一中全会；8月8日，全会通过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次日，玉门市万名群众在南坪广场隆重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9月26日，经酒泉地委常委会议批准，玉门市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至此玉门市“文化大革命”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运动

从1966年8月25日起，“破四旧”开始蔓延。在城市，玉门石油管理局子弟学校100多名学生砸毁了老君庙里的老君爷神像，并将老君庙油矿改为东风油矿，凡以老君庙命名的校、场、站、所都被冠名为“东风”，检查站改为解放门；随后，孙健初纪念碑和老君庙被相继捣毁，赤金红山寺和五华山老道庙惨遭洗劫。在农村，沿用多年、具有文化符号和地域特征的地名、单位名称，被具有政治色彩的名字代替，黄闸湾公社改名为“东方红”公

^①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印发的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社、下西号公社改名为“七一”公社、花海公社改名为“八一”公社，红旗、东风、曙光、向阳、朝阳、光明等名称随处可见；随着运动的深入，大量文化产品被封杀，民间文物被焚烧，赤金中学的红卫兵在新光村抄家中，将某户珍贵医书烧毁，给这户医学世家造成终生遗憾。

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串联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8月下旬，玉门一中和二中率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尔后不到一个月内，城市各中小学、农村中小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组成各种战斗队，随意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并冲出学校，走向街头，横冲直闯，粗暴蛮横地打击所谓的“牛鬼蛇神”。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为号召，狂热追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论调，祸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社队农户，经常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图书、剪长发等严重内乱行为。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1月，玉门市市属城乡中学1500多名师生分赴北京、南昌、延安、井冈山、韶山、上海等地串联，玉门石油管理局子弟学校1340名师生赴外地串联，来玉门串联的红卫兵一拨未走，一拨又来。红卫兵们内外

结合，在街头、学校、单位广泛开展活动，举行辩论会，张贴大字报，散发宣传单，加速了玉门市内各类造反派组织的形成。

四、革命造反派的形成和行径

革命造反派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通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接见红卫兵等形式，发出了“造反”的强烈信号，玉门的红卫兵们也先后成立了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联合总部等组织，有组织地革命造反行动全面开始。

打砸抢抄行动蔓延

造反派组织组成庞大的队伍活跃在全市城乡各个角落，尤其是以市政府、石油管理局驻地城区的行动较为剧烈。起初，不同单位持不同观点的造反派上街“大辩论”，打口仗，激化时打些群架。进入10月，抢劫现象逐步扩大。10月31日，玉门“油城红总司”“酒泉三一二”等造反派组织抢劫玉门市公安局枪支未遂，局长赵兴才被绑架。11月15日，两派造反派组织抢走了玉门石油管理局武装部枪支弹药若干。11月23日，“玉门红三司”造反组织抢劫玉门旱峡煤矿炸药245公斤，雷管2792枚，导火索800公斤。11月24日，“油城红总司”与“工总司”“玉联”等组织联合抢劫玉门市人民武装部武器库枪支257支，子弹2.7万发，制造

了玉门地区一起重大的抢枪事件。

全面夺权和对“走资派”的革命大批判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玉门兴起了大批特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7月上旬，玉门一中的红卫兵30多人冲向市委聚众闹事，迫使市委书记鲁愚“靠边站”。1967年1月，市长武德惠被撤职。玉门市属的党政机关、团体，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被污蔑为刘少奇的黑爪牙、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有的被革了职，有的被夺了权，等待接受批斗。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都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把执行了市委政策措施的社队基层干部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黑线的“应声虫”“黑爪牙”，进行了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

武斗升级造成流血事件

1967年12月9日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无视军管，进行武斗，多数派炸了油田井下处少数派的据点，炸伤十余人；10日，少数派打死多数派人员一人；13日，多数派包围市委大楼，抢走了少数派抢得的大拖拉机、汽车；14日，多数派砸了少数派的“斗批改”据点。此后两派私下组织武斗队伍，酝酿着更加剧烈的争斗。12月26日凌晨3时，多数派的“攻楼战”（市委大楼）开始，真枪实弹相持对战50多小时，双方伤亡惨重，是玉门市伤亡

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攻楼武斗相持到12月28日，几声炮响，市委大楼基本变为一堆废墟，办公用品全部炸毁，档案资料遗失，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十一章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遍及全国的“全面内战”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于正常工作。玉门驻军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三支两军”^①的命令，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展开“斗批改”运动，北京医疗队也来玉门，为农村送医送药，帮助完成了合作医疗。

一、“三支两军”初步稳定了局势

1967年12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从3984、8100、8096部队、“二五”医院、边防连抽调大批指战员进驻玉门，组织若干小分队，深入玉门厂矿企业、农村、学校、机关开展相关工作。军队介入地方以后，打砸抢事件减少，无政府状态改善，玉门油矿的

^①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对控制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革命大联合

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系。接到《通知》后，玉门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省派驻玉门的工作团，组织干部群众认真进行学习，并在各单位、各造反派内部开展了斗私批修，进行了开门整风，做了大量消除派性的基础工作。1968年2月，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3万人聚会，响应毛泽东大联合号召，痛批资产阶级派性斗争。次日，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军管会和兰州军区的帮助下，各派代表到兰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宗明义，讲明形势，整肃分歧，统一思想，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2月24日，玉门市在人民剧院召开庆祝大会，玉门各界群众组织在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走在了一起，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奠定了基础。

三、市、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按照“三结合”^①体制的要求，1968年3月，兰州军区玉门

^①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机构人员构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

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提出了“玉门市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上报甘肃省革委会。省革委会3月9日批准：“玉门市革命委员会由33名委员组成”，以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中：军队代表10%，革命干部占30%，群众代表占60%。3月18日，在玉门市人民广场举行了由两万多群众参加的革委会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省革委会的批示，玉门市革委会主任张朝干、玉门石油管理局革委会主任宋志斌发表讲话，玉门市驻军代表、群众代表讲话祝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向毛泽东发了致敬电。后来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将这次集会作为玉门市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玉门市参会人数最多、程序最特别的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玉门市革委会成立不久，全市所有单列单位、8个人民公社、59个生产大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从1968年3月成立，至1980年12月撤销，历时12年零8个月。革委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动乱局面，承担起了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责，使多项工作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开展，但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未能引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6月30日，面对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

化，最初是指“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1973年1月，又变为“老中青”三结合。

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7月2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1966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玉门市和玉门石油管理局分别于1967年4月16日、1967年6月14日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专事工农业生产，被造反派扰乱了的生产秩序部分得到恢复，但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某些生产违背经济规律，瞎指挥现象严重。

五、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新高潮

1967年春，酒泉地委印发了《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安排意见》，玉门市制定下发了文件，在全市迅速贯彻执行。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玉门驻军，组成多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玉门厂矿企业、农村社队、机关学校，宣传毛泽东思想，玉门市委党校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公社、大队、学校，普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队，深入城乡宣传演出，要求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最大最首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干部群众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1968年4月18至24日，玉门市革委会召开了全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经验交流会，来自各条战线的数十人交流了经验。10月20

日至29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411人，会议总结了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绩，树立了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1968年5月4日，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向贫下中农赠送《毛泽东选集》13000套，《毛泽东语录》1000余本，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切实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

六、广泛深入的“忠”字化运动

1968年4月底，玉门市革委会号召全市大搞“忠”字化运动，开展“三忠于四无限”^①，要求“忠不忠看行动”。随后，市革委会在油城公园矗立起了毛泽东巨幅雕塑像，街道、广场、大型建筑物上喷绘毛泽东画像，市、社、队三级多次举办“忠”字览。田间劳动的社员每天都要举上红旗，扛上大幅标语牌、毛泽东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忠”字牌等插在田间地头，“早请示”“晚汇报”形成了制度，千家万户普遍张贴毛泽东半身标准像，组织“忠”字舞表演队，学唱“革命样板戏”。

七、北京医疗队在玉门

1971年10月到1976年9月，北京医疗队192人，分四批来到玉

^①三忠于四无限，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门。医疗队带着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人民的关怀和特殊使命来到玉门，一干就是五年。抽调的人员有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著名专家和教授，如：教授级留学海归专家艾纲阳、柏椿年、施曼珠、沙金贵、李扭坤，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石庆德、王琦璋、杨继生等。他们和当地医务工作者一道，在乡镇卫生院安营扎寨，与基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同吃、同住、同防治，身影和足迹遍布玉门乡村的每个角落，他们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缺医少药的地方，越是要去，一个不落。他们认真贯彻周恩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防病治病，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群防群治；调查研究，总结防治地方病的经验；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帮助当地培养赤脚医生和不脱产的卫生人员；巩固合作医疗，没有建起合作医疗的要帮助建立”的指示，用严谨的工作作风，精湛的医疗技术，视病人为亲人的职业道德，给玉门医务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他们采用部队编号，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给病人看病不要钱，但吃饭却付费；在卫生院所坐诊不收挂号费，药费由当地卫生院收；遇上危重病人，马上在医疗点搭建应急手术室，手把手地教地方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他们从普及医疗科普知识，改变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入手，禁捕、禁食旱獭，手把手地帮助专业卫生人员提高防治技术，有针对性的开展疝气、阑尾炎、甲状腺瘤摘除术，提高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功能。他们在全市普及以“两管五改”^①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沙眼、结核

^①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改畜圈、改炉灶、改善环境卫生。

病、布病、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小儿疾病在全市进行了普查防治，基本上摸清了地方病的流行规律，发病原因，提出了具体防治措施，编印了《农村常见病中药材治疗手册》，有效控制了各种地方病、传染病的流行。1976年底，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由1965年的3%下降到不足1%。他们把社队赤脚医生集中到卫生院培训，现场操作，白天接诊，晚上进行理论辅导；把民间接生婆召集起来培训，普及新式接生法；他们先后轮换四批，但培养社队医生、赤脚医生、生产队卫生员的工作从未间断，五年间共举办各类医务培训班15期，培训社队医生105人，赤脚医生145名，较快地提高了玉门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给玉门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伍。他们积极倡导合作医疗，到1976年9月，玉门市8个公社、59个生产大队均实现了合作医疗。他们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奥博知识，从祖国传统医学宝藏中，精选最适宜的医疗技术，对缺医少药，无钱看病的农村社员，积极开展针灸、针麻、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等中医疗法，治愈了许多病人。

北京医疗队在玉门虽然只有五年，但在“文革”期间，他们顶着随时有可能被扣上“白专”帽子的风险，为玉门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玉门人民永远铭记。

第二十二章

备战、整党、斗批改^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至1970年，玉门先后开展了备战、整党、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

一、掀起战备高潮

1969年10月，玉门成立了战备领导小组，大量开挖地道，四〇四厂厂部供水工程、生活基地建设工程相继完成；1970年，制定了《玉门地区防空袭战斗预案》，对地道进行了加固，构筑了地下房间、物资仓库、食堂、厕所、指挥部等，有重点地安装了地下自来水、电话、广播、发电机组，市政系统的地道构建了简易地下医院、地下商店；1972年，坚持“以主干道为主，提高质量为主，专业施工为主”的原则，对地道的应战能力进行了大幅提升，开始了战斗城、战斗厂、战斗校的战备工程建设；1975年，玉门制定了《玉门城市保卫方案》《玉门市防空工程总体规划》《玉门市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改造提升了地道孔口防护工程和“三配套”（防原子、化学、细菌武器）工程。

^①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

二、整党建党

1968年12月，玉门市整党建党工作开始。1969年春，在泽湖、先进、南湖三个大队进行试点。3月21日，在“八一公社”（今花海乡）先进大队召开农村整党工作现场会，会议交流了试点大队的经验，讨论解决了整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部署安排了农村整党工作。与此同时，市机关、厂矿企业的整党工作陆续开展起来，党员要重新登记，一批党员被当作“废料”清除出党，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被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截止1970年6月，全市建立了11个党委、6个总支委员会、97个党支部，全市原有党员2727名，有2422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开除党籍、劝退、暂缓登记305人，吸收新党员71人。在整党建党的后期，普遍开展了群团组织整顿建设，1973年1月16日至20日，召开了共青团玉门市第五次代表大会；4月20日至24日，召开了玉门市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7月14日至17日，召开了玉门市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9月23日，召开了玉门市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三、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到1968年6月底，城乡共揪出“阶级敌人”1907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1232人，属敌我矛盾的520人，原来已戴五类分子帽子的354人，新戴帽子44人，提帽

子的18人，法办29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75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阶级斗争扩大化倾向，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感情，使一部分干部群众又受到了不白之冤。

四、“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

1970年2月1日至4日，玉门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了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一系列指示，提出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破坏，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会后，市、社、队各级成立了专案组，继续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将某些问题上纲上线；对从事财务、物资管理的部门和个人进行“小四清”；对在城市从事农副产品买卖、小工小匠、自己加工制作小型农具出售交易的进行揭发批判，并被界定为“一打三反”的对象。1971年5月1日，全市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至1972年8月，全市揭发出有问题的人116名。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3日，玉门市第一中学66级、67级的25名毕业生主动报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0月5日，玉门市首批、556名城市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自1968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11年间，玉门市在农村共安置知识青年10803人，其中本市知青9689

人，上海、兰州、甘肃矿区等外地知青1114人，动员安置城市居民424户、1731人，职工家属1285人。

六、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0年元月21日至31日在玉门镇（今玉门新市区）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59人，代表全市已经恢复组织生活和新接受的共2493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学习中共九大有关文件；2、讨论玉门市革命委员会和整党领导小组（代市委职能）的工作报告；3、选举中共玉门市第五届委员会。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以战备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大会选出中共玉门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5人，常务委员7人。选出书记1人，副书记2人。

第二十三章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玉门工业学大庆重点以石油建设为主，农业学大寨是从北农会议^①之后才真正掀起了高潮。

一、工业学大庆

工业学大庆期间，玉门充分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工业全面发展。石油方面，克服人才短缺、设备更新滞后、石油储量减少的困难，继续坚持“三大四出”，发扬玉门风格，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实现了十年稳产60万吨的目标；军工方面，积极支持国营四〇四厂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水平，大搞技术革新；小工业方面，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建成了化工厂、水泥厂、农机修造厂、水利机械队，八个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农机修配厂、拖拉机站、加工厂。玉门石油管理局、旱峡煤矿、农机修造厂、轻工机械厂、邮电局，先后被甘肃省委命名为大庆式企业，玉门工务段桥梁养路工区、923号机车组、向阳湖砖厂、轻工机械

^①即：北方农业工作会议。

厂、机具厂、汽车运输队，先后被评为甘肃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

二、农业学大寨

1965年2月，近两千人的四级干部会议提出，每年平田整地不得少于耕地面积的25%，三五年内使全市近20万亩计划内耕地基本实现条田网络化。1970年9至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玉门市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代表黄闸湾公社党委书记罗福智、清泉公社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治存参加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又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传达了会议精神，表达要向大寨学习的决心。以张朝干为市委书记的新的市委一班人，认真落实北农会议精神，在五届一次全委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树雄心、立壮志，以更大的气魄，苦战三五年，建成大寨市”“‘四五期间’全市工农业双翻番，粮食产量争取过长江”^①，以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迅速推开。

大整条田掀起以五好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按照平田整地、建设五好^②农田的要求，全市人民齐动员，

^①即粮食亩产上800斤。

^②即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居民点。

市、社、大队、生产队层层落实，成立民兵班、青年突击队、铁姑娘班，广泛开展劳动竞赛。至1976年底，建成高标准条田19.4万亩，修建中型水库一座，小型水库三座，总库容达到3939.2万立方米；修建引水渠首六座，总干及干渠七条，127.18公里，衬砌125.68公里；修建支渠142条，736.07公里，衬砌201.81公里；修建斗渠132条，209.33公里，衬砌165.53公里；打成各种机井455眼，共增加保灌面积20至30万亩；随着条田面积的逐年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机耕面积逐年扩大，深翻后土地的活土层，水肥的涵养量明显增强。1976年底，全市粮食亩产达到458斤，总产达到了8247.51万斤，与1966年相比，总产增加了2588.41万斤，增长了47.74%，创历史新高。

执行“八字宪法”^①，实施科学种田

市委、市革委会及农业管理部门认真学习“八字宪法”，先后推广实施了压沙排碱、阳土还原、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化肥、养猪造肥、沤制绿肥、城粪下乡、滩粪进地；大兴水利、开源节流、小畦灌溉、节约用水；繁引结合、对比试验、提纯复壮、精选良种、推广畜粮优良品种；以千粒重确定下种量，合理密植；人药共锄杂草，防病灭虫，预防霜冻，防治鼠害；推广机耕、机种、机施化肥等各种农业措施。为了保证上述措施的落实，充实加强了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增加技术力量，于1970年恢复成立了玉门农业技术推广站，公社普遍成立了农技站，生产大

^①即毛泽东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

队成立了农科队，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层层配备了农科员，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选配专业技术人员常年蹲守在社、队，举办农科员培训班，培训了数以百计的土专家、田秀才。各社队积极向白杨河四队学习，不依赖，不迷信，大胆实践创建自己的试验田，涌现出了赤金新光四队、西湖三队、营田二队、朝阳大队，下西号农科队，玉门镇小泉良种场，黄闸湾泽湖二队，柳河二道沟四队等科学种田先进典型。

植树造林，防风治沙

玉门是世界风口，树木稀少，植被不足，耕地贫瘠，沙化严重，以柳河东风滩、红旗、南戈壁、玉门镇代家滩、赤金东沙门、长沙岭为主的风沙口，对农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春季大风肆虐时，刚种的麦种会被刮出土面，秋天麦黄季节，灌浆了的麦子会被成片刮倒。植树造林、治理风沙是玉门干部群众多年坚持不懈的重要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特别是柳河红旗林场顾天祥^①，1962年调入林场以后，白手起家，带头植树，防风固沙，硬

^①顾天祥，1938年10月16日生于柳河乡红旗村，196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年8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3岁。玉门市柳河乡红旗林场党支部原书记。1962年5月，24岁的顾天祥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辞掉玉门市昌马乡供销社主任的公职回到家乡红旗村，挑起了红旗林场场长、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创业伊始，没有资金，他从朋友处借来38元起步；没有苗木，他发动群众到临近农场借；没有技术，他赶着牛车从市林业局、农技中心请来技术员讲课示范。当年春天，他硬是带着20个劳力在沙窝里奋战3个多月，开荒定植防风林50多亩，迈出了改造荒漠戈壁、建设防风固沙及经济林基地的第一步。为了保证林木的成活，他领着群众从2公里外的河里挑水、背冰块浇苗，并在沙石地上挖出了一条2.5公里的引水渠。在顾天祥的带领下，党员帮农户，富户帮穷户，老少学技术，争奔小康路已成为红旗林场生活中的主旋律。先后八次获得省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3次获得市级以上的表彰奖励，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同年当选

是把一块风沙口上的不毛之地建成了享誉盛名的绿色家园，他们育的杨树苗除内供外，多年外供新疆、青海等地，他们建造的百亩果园曾红极全市，农户也由此致富，连续四年被甘肃省评为林业建设先进单位。

为党的十六大代表，2005年被省老龄委评为“陇原十大杰出老人”，红旗林场也先后多次被省、地、市评为绿化先进单位。

第二十四章

批林批孔，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在对极左思潮进行了一些纠正的同时，支持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教育、科技、文化等工作得到重视。

一、批林整风运动

逐级传达林彪的反革命行径

知道林彪事件真相后，玉门市委迅速传达了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准确判断及其定位。随着事件调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先后发出了七个文件，玉门市委积极传达中央精神，干部群众逐渐认识到了林彪及其反革命政治集团的真面目，了解到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当面说好话，背后实施的是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2月6日至13日，市委、市革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批林批孔运动随之展开。9月14日至22日，市委、市革委会再次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实现农业大干快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对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玉门城乡成立理论辅导小组129个，推选理论辅导员1650人，成立各种业余理论小组744个，参加培训人员18426人；举办读书班、理论辅导员学习班125期，培训理论骨干1792人。到后期，“四人帮”借题发挥，把批林批孔运动引申到评法批儒，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周恩来，使运动走上了歧途，出现了突击入党、突击提拔干部的问题，扰乱了领导机关和工厂的工作秩序。

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落实干部政策

林彪事件后，玉门市委根据上级指示，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进行了重新考量，原市委书记鲁愚，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振汉、马肖，市文教卫生局长樊武，赤金公社党委书记徐存悌等被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社队被革了职的部分干部，也逐步恢复了工作。但总体看，这次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力度有限，

进度缓慢。

落实科教卫生和知识分子政策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领域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林彪事件后，玉门根据有关精神解放了一些受管制、受改造的校长、医院院长、教育医疗卫生骨干，内行逐步重新进入管理层，有的“臭老九”走上讲台。恢复了小学五年制和初、高中二二制教育，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动员农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检查落实“四率指标”，城乡学校逐步复课。

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

1972年11月8日至10日，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紧接着于12月5日至13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提出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核算制度，抓紧了“四自留”遗留问题的处理。已没收了自留地还没有退还的和集体代耕的，春节前要全部退给社员；对插队落户的城镇居民，按下乡时的人口划给与社员同等的自留地；下乡知识青年的自留地可由生产队代耕或自己种；每户可养羊一至三只，原来归公的，在限额之内应如数退给社员，超过限额规定的，可以卖给国家、可以作价归集体、也可以自食或卖给其他社员；收回的架子车等农具如数退还，不得以坏换好，原物不在的，折价处理；社员栽植的自留树，林权不清的，由公社协助，与群众商量，具体划定；社员搬迁后的旧庄基，地权归集体，树权归社员；落实合理的奖励政策，特别是在牲畜饲养繁育方面，各社队要发动群众制定具体奖励办法。

第二十五章

全面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先后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玉门对全面整顿的精神坚决贯彻，效果明显，但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骤起，持续数月的整顿工作中断。

一、贯彻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1975年1月8日至10日、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1975年1月27日，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2万多名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活动，热烈庆祝这两个会议的胜利召开。庆祝大会上，认真部署了对两会精神的宣传工作，要求市直机关、工矿企业、公社、大队充分利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把两会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党员干部、职工、贫下中农群众中去，广大干部、城乡群众听了会议精神后深受鼓舞，尤其是对邓小平担任中央领导和重申四个现代化，表示了极大地欢迎。

二、整顿社会治安

为进一步贯彻1975年中央9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玉门市成立了整顿社会治安工作领导小组，城市、街道、厂矿、人民公社普遍成立了治保委员会，配备了专职治保主任，四个公社、30个大队、138个生产队重点批斗了47人，依法捕办了三人，对四类分子进行了再评审，大队、生产队建立健全监改小组，落实了监改措施。

三、整顿领导班子

1975年7月17日，中央下发〔1975〕16号文件，批转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中央批语中加了一句极为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中央16号文件的发出，揭开了全国整党的序幕。根据省地委部署，对市社领导班子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整顿。第一批组织了2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问题较多的21个大队、125个生产队进行重点整顿，在花海公社黄水桥大队、下西号公社塔尔湾大队进行试点，摸索经验。市委在安排部署全市领导班子整顿工作的同时，率先带头对班子的自身建设进行整顿。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3月3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谈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全面整顿中断。1976年2月2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2月28日，成立了玉门市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领导小组，下设运动办公室。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对邓小平的批判愈演愈烈，极左思想大肆反扑，刚刚恢复的工农业生产秩序再度混乱。

第二十六章

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玉门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得悉“四人帮”被粉碎的讯息，全市上下热烈欢呼。

一、隆重举行毛泽东悼念活动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玉门市各级党组织、人民武装部、驻玉部队、全体民兵、指战员和各界干部群众，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极其沉痛地哀悼毛泽东逝世。9月18日，玉门市委、玉门石油管理局在市区北坪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会，3万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追悼会，农村八个公社所在地、玉门镇区机关街道、60个生产大队、独立建制的厂矿、企业、单位普遍设立了追悼会场。追悼会上，全市人民向党中央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忠诚继承毛主席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二、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传开，玉门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1976年10月22日，玉门市政机关、玉门石油管理局职工群众3万多人，一队接一队，从四面八方赶来，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喊着“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的口号，锣鼓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响彻玉门油城。

10月23日，玉门市委召开第182次常委会议，专题学习传达中央1976年16号文件精神，传达了叶剑英的讲话，声讨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动罪行。会议强调：首先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项重大决定，听从华国锋指挥，狠批“四人帮”，服从党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坚持“三要三不要”^①的原则，加强党内团结，把党交给我们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努力奋斗，全面实现今年工农业、财贸各项经济指标，以实际行动，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各人民公社所在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从12月初开始，市社队积极转入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

^①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并多次使用这三句话告诫“四人帮”。

阴谋活动中。为此，市委结合地区的电话会议精神，对全市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做了周密安排。

第五编

拨乱反正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时期

（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迈向改革开放新征程。

第二十七章

揭批“四人帮”、整党和“一批双打”

粉碎“四人帮”后，玉门积极按照省、地委的安排部署，在全市各级和各行各业，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打好了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一、打好第一个战役，掀起深揭狠批 “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1976年12月3日，省委《关于在全省进一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群众运动的意见》下发后，市委成立了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主要领导挂帅，常委分工包片，下厂下社亲自宣讲，培训骨干。各厂矿、各公社集中三天时间，统一培训辅导宣讲员。每个生产队至少有一名宣讲员，每个大队有两至三名辅导员，每五天在公社集中交流培训一次。要求充分发挥学校教师 and 知识青年的作用，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及各机关单位利用好所有宣传舆论工具，大造揭、批、查声势，把中央精神和“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宣传到千家万户，人人明白。在第一战役里，主要抓住“四人帮”“三搞一篡”^①的要害，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为主，向群众讲清“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讲清“四人帮”丧心病狂的阴谋，掀起了深揭狠批“四人帮”滔天罪行的人民战争。

二、打好第二个战役，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

玉门市委按照省地委的安排，从1977年4月1日开始，部署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二个战役，认真传达中央1977年10号文件，

^①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市委于4月14日下发了《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央10号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一要采取多种形式，迅速传达学习好中央文件，讲清“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二要紧密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层层召开批判大会，在总结第一个战役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农村的生产队，城镇的街道，工厂的车间班组，要通过回忆对比，不仅开展群众性的口头发言批判，还要结合实际组织撰写一些理论文章，分专题一个一个地批，肃清“四人帮”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社队的流毒和影响，要批罪行，批谬论，肃流毒，划界线，树正气；三要进一步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四要开展“三大讲”活动，一讲“四人帮”的罪行，让广大群众人人上阵口诛笔伐，把“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罪行，把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讲出来，一次讲不完、两次三次讲，一人讲起来，大家补充，形成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二讲怎样跟“四人帮”作斗争的体会；三讲自己吃到的苦头，以铁的事实，控诉“四人帮”的罪行。《通知》强调：要做到大学大批，大说大干，把揭批“四人帮”激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引导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三大革命斗争^①中来，夺取天下大治的新胜利。

三、打好第三个战役，搞好“清查”与整顿

从1977年9月至1978年1月，中央部署了揭批“四人帮”的第

^①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三个战役，开展了清查与整顿工作。为了搞好“清查”工作，设立了“清查”工作专门机构，认真研究、领导清查工作。各单位领导亲自挂帅，广泛发动群众，召开说清楚会、知情人会、批判检举会，认真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进行大量的查证落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此基础上，市委对进一步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打好第三个战役，作了认真安排。要求：一要抓住要害，联系实际，深入揭批。要在前两个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贯彻华国锋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一鼓作气地打好第三个战役。第三个战役的主要任务是：以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邓小平的闭幕词为指导，抓住“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反革命政治纲领这个要害，深揭狠批“四人帮”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批判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疯狂反对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罪行。二要切实宣传贯彻好中央1977年（37）号文件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办好宣传贯彻学习班，培养好宣讲辅导员，拿上文件，深入社队，广泛宣传，以37号文件为动力，在全市广泛开展“三大讲”和路线教育对比活动，要认真学习石化部开展“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教育的经验，严格按照《宋平^①同志在全省县以上干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去办，保证

^①宋平，1972年7月—1977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2月—1981年1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后，甘肃率先试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安徽的万里、山东的王

“三大讲”活动切实讲出实效。

要把“清查”工作搞彻底，必须要认识到清查与“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划清阶级阵线、向“四人帮”斗争的重要内容，各单位要加强领导，务必做到全面彻底。整个清查运动中，全市清查有打砸抢行为的258人，其中属于一般性打砸抢的220人，严重的38人。

四、开展整党整风和路线教育

1977年初，中央决定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党整风运动，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把党建设的更好。玉门市委根据地委的安排，积极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围绕华国锋提出的内容和要求，来教育考察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切实改进各级领导干部作风。一是制定了《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按照地委要求，实行“三三制”，即：市级机关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参加基本路线教育，三分之一的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蹲点劳动，留三分之一的人承担全部任务，搞好机关工作。下到社队的干部要做到“三包”（包社、包队、包任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四不”（不住招待所、不坐小汽车、不搞特殊化、不擅自离队私自回家）。二是严格执行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二、三制度。除

恩茂、甘肃的宋平是试验、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主力。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89年6月—1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老弱病残者外，市、社及各企事业单位的机关干部必须实实在在地劳动一百天，大队、车间干部每年劳动二百天，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脱产干部由组织部门发放给劳动手册，由接受劳动的单位记工签注意见，年底要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市级领导干部、公社党委书记、主任每年要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蹲点调查，了解民情，结合中心工作，至少写出一至两份较有价值的调查报告，指导面上工作。四是为了确保深入基层，市、社都要克服五多（会议多、文件多、接待多、检查多、汇报多），跳出事务圈子，腾出时间，真正深入基层了解掌握实情，把党委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做到政治上帮助基层，组织上充实基层，工作上扎根基层。五是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反对铺张浪费、请客送礼，反对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白吃白拿，反对化公为私、行贿受贿。六是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坚决反对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反对弄虚作假、谎报隐瞒。

整党整风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一个月时间学习文件，搞好批判，发动群众，开门整风。一是组织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建党论述，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四人帮”的论述，学习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消除顾虑，统一认识，武装思想，明确整党整风的重要意义，端正整党整风态度，

把党员和群众充分调动起来，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二是动员组织党内外群众，紧密联系本单位，本社队的实际，在继续揭批“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①的罪行以及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的同时，集中精力批判他们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妄图篡改党的指导思想的罪行，批判他们妄图改变党的性质的罪行，批判他们颠倒社会主义时期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罪行，批判他们搞帮派体系，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和民主集中制的罪行，批判他们蓄谋迫害污蔑老干部的罪行。要求要一条一条地批深批透，一条一条地肃清流毒和影响，从而分清路线是非，划清思想界线，提高执行毛泽东建党路线的自觉性，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三是搞好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摸清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掌握市、社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情况；搞清思想、组织、作风方面不纯的主要问题；查清与“四人帮”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心中有数，为搞好整顿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用40天时间，总结工作，揭露矛盾，整顿班子，评论党员。遵照毛泽东“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和“五十字”建党方针^②，以“七个懂得”为基本内容，从总结“文化大革

^①即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砍农业学大寨红旗。

^②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入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充分揭露矛盾，切实解决好领导班子在思想、路线、作风以及干劲、团结上存在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标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评论党员、整顿党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到运动的最前列，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主动引火烧身接受教育，提高自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党员要敢字当头，大胆揭露矛盾，主动亮思想、查危害、找根源、肃流毒、自觉革命。

第三阶段，用20天左右的时间，搞好组织建设，制定思想革命化规划。按照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要配好一、二把手。学习昔阳、大庆的经验，讨论制定加强领导革命化的具体措施，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坚决执行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带领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坚强战斗指挥部。按照党章规定从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积极慎重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混进党内的帮派头子，坚决清除出党；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以教育为主，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于性质严重的，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按照党章规定，分别不同情况，按一定程序，严肃处理。

在城乡开展好路线教育。路线教育先以柳河公社为试点。

柳河公社在基本路线教育中，注意抓好工作队员的思想革命化建设，充分认识到，每个队员提高思想，肃清流毒，改进作风，联系群众的职责和必要性，只有用自己的言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使教育深入下去，其做法为全市各个工作队起了表率和指导作用。概括起来：一是抓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路线教育在全社铺开，工作队领导发现队员们热情都很高，但收效不是很理想，主要差在本身学习不够，思想水平差，无法向群众讲深讲透“四人帮”的罪恶历史和本质根源。工作队便采取工作队员集中学习的办法，反复学习，培训指导，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促使每个队员都充分认识到“四人帮”的罪恶面目和历史根源，再指导群众开展“三大讲”活动，从而使教育步步深入。二是抓纪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工作队坚持一周一次民主生活会，比思想、比路线、比纪律、比干劲、比团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统一了行动，推动了基本路线教育的开展。三是抓“三同”，改进工作作风。工作队员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工作队员带头拾野粪，大搞积肥，进点不到一个月每个队员实际参加劳动时间都在16天以上，一部分达到20天，和群众一起同学习、同批判，充分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掀起了冬季生产新高潮，显示出了“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的大好局面。在取得点上经验的基础上，对面上的第二期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进行了全面安排。对运动的具体任务，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政策导向，队员要求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和统一要求。使各个阶段的任务全面落实，干部群众的精神振奋，干劲倍

增，推动农业学大寨进一步掀起了高潮。

五、开展“一批双打”斗争

1977年冬，根据省、地委的安排，玉门市委下发通知，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彻底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简称“一批两打”）的运动。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做到：（一）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华国锋十一大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根据中央1977年（37）号文件要求，认真传达宣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联系实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揭狠批“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实质和各方面的流毒影响，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统一认识、明确任务、增强信心，自觉地、积极地、旗帜鲜明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把“一批两打”运动进行到底。（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各单位各社队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反复宣传，大造舆论，扫除障碍，排除干扰和阻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高潮。检举揭发恶毒攻击毛泽东、华国锋和党中央，破坏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反攻倒算，阶级报复，搞打、砸、抢者，检举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蚕食国家和集体利益以及煽动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做到城乡配合、上下结合、内外联合，把运动搞深搞透，不留尾巴，对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打击。（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重证据、重事实，不搞逼、供、信，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五）加强党的领导。截止1978年12月20日，全市揭发出问题1474件，涉及227人，其中属于政治方面的线索3条，刑事方面的线索71条，经济方面的线索1385条，总金额91695元，粮食（粮票）35732斤。在“双打”运动中，除对少数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依法拘留和逮捕法办外，大多数重在教育，全市退赔赃款38456元，退赔粮食（粮票）5719斤。

第二十八章

贯彻十一大精神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召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玉门市委动员全市上下认真学习大会精神和各项决定，热烈拥护邓小平再次复职，继续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随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纠正农村和各方面“左”的错误，开展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一、学习十一大精神，庆祝“文化大革命”结束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7年8月22日，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3万名职工、贫下中农和家属隆重集会，欢呼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庆祝“文化大革命”结束，玉门城乡掀起了学公报、学

报告、学决议的热潮。市委要求，机关干部要集中一段时间坚持半天学习，班组车间、居民、社队都要按照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玉门人民对这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欣喜若狂，纷纷表示：“我们党又有了希望，我们的国家又有了希望”，决心按照十一大路线，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挽回“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损失，建立正常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秩序，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新高潮，为实现四化目标努力奋斗。

二、热烈拥护邓小平再次复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玉门城乡人民热烈拥护中央决定，市委发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全市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热潮，广大职工、家属、农民、学生热情传颂邓小平复出的喜讯，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历史性会议》社论，畅谈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中央决议的英明正确。

三、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及“四人帮”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通过在甘肃的代理人洗恒汉等人，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给一些同志强加了不少污蔑不实之词，把反对林彪、“四人帮”，维护邓小平，悼念周总理的人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干部达23%，受审查的干部473人，提出申诉的62人，受审查的工人403人，提出申诉的24人，受审查的社员居民1253人，提出申诉的3人，对“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处理的问题，提出申诉的69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一些领导和同志认识不足，心有余悸，对“四人帮”的流毒，中毒不知毒，中毒不消毒，不敢坚持真理，不敢用事实作说话，加之“两个凡是”的束缚，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后来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推动下，落实干部政策的力度有所加大。

1978年2月14日至17日，酒泉地委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学习中央、省委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文件，分析了全区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现状，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玉门市委在3月31日召开了落实政策座谈会，对照地委要求，检查了工作缓慢不前的原因。会议认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全党动手，迅速组织力量，把这项工作做好。9月4日，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在中坪灯光球场召开大会，为所谓“伪玉门油矿应变潜伏特务组织”的“特密小组”“俞国安小组”“伪油矿国民党地下第五区分部”“伪乌苏油矿特务组织”和“山丹培黎学校敌特组织”等五起案件平反。11月2日，市委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会议提出了五点要点：一要坚持以批判“四人帮”为纲，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制造冤假错案，攻击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划清是非

界线，提高落实政策的自觉性；二要坚持党性，排除派性及其它思想的干扰；三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四要领导负责，亲自动手，出于公心，排除疑虑，大胆开展工作，加快进度；五是要做到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会后各级领导认识有所提高，落实政策力量加强，结案率迅速上升，11月16日，玉门市、玉门石油管理局在中坪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为李瑛等七名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2月15日，玉门市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成立；12月18日，中共玉门市党校恢复，同时撤销玉门市革委会学习班。截止1978年12月9日，全市共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1260人，占应复查人数的74.3%，案件复查结案率56%，工人营业员中的案件复查结案率68.3%，农村社员、城市居民的案件复查结案率83.9%。到年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案件全部复查完毕，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91名干部、群众，除一人没有结案外，其余均已结案，有的作出结论，有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分别根据不同情况，对原来没有分配工作或使用不当的干部工人，重新安排了适当工作或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其中科级以上干部25名。落实政策工作，历时三年零四个月，于1981年2月基本结束。具体工作中，全市共抽出专干244人，其中市委常委三人，科级干部28人，全市列入复查的各类案件（包括公安、法院的案件）3251件，属于“文革”中的案件2316件，属于“文革”前的案件935件，复查结案的3227件，占

99.26%。其中全部平反1780件，占55.18%；部分平反288件，占8.9%。维持原案1159件，占35.92%。尚未结案24件。另对原玉门县的国民党、三青团合并问题也进行了复查，作了否定的结论，并对全市2047名在职干部的人事档案，200名干部的专案材料，凡装有“文革”中形成的不适当材料的，均进行清理，共销毁材料4431份，退给本人材料245份。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1978]48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清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全市清理出有打、砸、抢行为的258人，其中属于一般性打、砸、抢的220人，严重的38人。清理重点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四种人，对于有一般性打、砸、抢行为的人，都在本单位、本部门的群众会上说清楚，总结经验教训，轻装上阵，对于有严重打、砸、抢行为的人，大部分人已说清了问题，取得了群众谅解，及时解脱，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和搞好生产和工作中去。

四、积极纠“左”，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之后，对中央十二条、省委二十条进行了宣传贯彻，结合年终决算执行了“两基本保一基本”^①，兑现了分配政策，落实了按劳分配，进一步落实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管理制度，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提高，政策的动力逐渐发挥。但仍有一些干部“怕搞错不敢

^①即基本出勤天数、基本肥料，保基本口粮。

大胆抓，怕得罪人不狠抓，怕麻烦不细抓，不懂政策不会抓”。有的群众也怕“说了不算，过上一段又变”。为此市委再次明确：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消除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是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夺取农业丰收的需要，也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建立河西商品粮基地的需要。不解决那种对政策的重要性、严肃性缺乏认识的糊涂观念，不解决那种不学政策、不懂政策、不执行政策的状况，要高速度发展农业是不可能的。市委要求，必须切实抓好六项工作：一要合理组织劳力，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要根据生产需要，建立固定的、临时的、或专业的作业组，推行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的“五定”责任制。要开展评比竞赛，奖励劳动模范，鼓励劳动积极性，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二要实行定额管理，搞好按劳计酬。实行定额，一般做到劳力强的超一点有奔头，劳力弱的力争完成有赶头，中等劳力力所能及有劲头。要坚持男女老少、干部社员一律同工同酬，要坚决纠正做活不分多少，质量不分好坏，技术不分高低，计酬一样的平均主义，计酬办法要简单易行，要让群众欢迎；三要推行“两基本保一基本”制度，调动社员投工投劳投肥的积极性。基本口粮占分配粮食的比例由社员讨论，但人、劳比例要恰当，既要做到能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又要保证“五保户”和人多劳少的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四要实行民主理财，加强财务管理。要健全财务、会计、实物保管、开支审批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坚持日清月结，定期公布账目，按月公布工分，按季公布财务账，推广民主理财；五要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大力压缩非生产用工。大队、生产

队干部的误工补贴，要严格按照规定处理，严格控制在限额以内；六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市、社、大队既要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又不能搞瞎指挥，增产措施要因地制宜，推广新技术，坚持先试验，再大面积推广。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负担。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全市共退赔金额39.9万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6.1元，其中公社、大队23.4万元，市属各单位16.4万元，土地4.5亩，粮食2520斤，退回到生产队第一线的劳力163人，纠正杜绝了“一平二调”。

五、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10月2日至4日，市委主要领导参加了酒泉地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结合传达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随后，地委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要求通过座谈会、讨论会、研讨班等各种形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三点：一是弄清楚当前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现实意义；二是弄清楚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是弄清楚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根据地委的《通知》精神，玉门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地委会议精神作了全面传达，并研究了如何贯彻《通知》精神，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发出通知，结合玉门实际，引导群众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议强调：充分认识只有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搞清楚，才能解

放被长期束缚了的人们的思想，才能实现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才能真正做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随后市委举办了公社党委书记和各大口一把手“真理标准专题研讨班”，迅速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延伸到了基层，普及到工人、农民、全体职工之中，使各级领导、基层干部、人民群众都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对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根本性拨乱反正，是解决人们思想路线的大课题。

第二十九章

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了36天；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消息发布后，玉门城乡一片欢呼，迅速进入学习、贯彻和落实之中，迈向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一、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1978年底，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

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传开，玉门城市乡村一片欢腾，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这一伟大盛会的胜利召开。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准确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玉门市委和玉门石油管理局认真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省、地委领导下，逐一落实了中央各项要求，带领全市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玉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玉门市第

六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328名代表，代表全市3386名党员。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市委书记罗世秀作了《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党工作的转变，加速四个现代化进程》的报告。与会同志豪情满怀，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成功，热烈拥护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会议对市委九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作出了三项决议：一是一定要深入学习，积极宣传，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到集中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二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鼓足干劲，争取主动，精心组织，不失时机地把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搞好，把生产措施一件一件落到实处；三是一定要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要组织广大干部和农村社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各大队、生产队在落实1979年生产计划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早知道，要切实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认真搞好经营管理，深入扎实地贯彻按劳分配政策，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把各项政策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三、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贯彻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央又于1979年1月18日召

开了理论务虚会，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委结合玉门实际，对邓小平的两个重要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积极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四项基本原则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对照实际认识极左错误路线的危害和造成的损失，肃清极左路线在干部和群众思想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开动脑筋、发展生产，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立足现实、深入思考，大胆探索、用活政策，摒弃“两个凡是”、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力以赴组织好各项生产。具体工作中，一是讲清农村政策放宽后，只要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一些积极的探索都应当鼓励，不应加以限制，使农民对中央政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也不需要担心扣帽子，打棍子，割尾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都是正确的。二是引导干部群众用活的思想想问题，干事情，放开手脚，摆脱束缚，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要随便上纲上线，不再讲阶级斗争，不再搞大批判，大揭发。三是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进行部分平反，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使人们的思想不再被阶级意识所绷紧，曾经被批被斗的人不再害怕被批被斗。四是鼓励私营经济成分的存在，尽管当时没有明确提出，但对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试验、探索不加制止。五是鼓励人们探索新方法，发现新情况，提出新思路，开辟新路子，解决

新问题。六是针对某些人对刚刚开始的对乱反正的误解、偏见和错误认识，认真组织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和辅导，及时纠正了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混乱或模糊，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兢兢业业抓生产，实实在在谋发展，踏踏实实干工作。

四、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委根据中央和省上一系列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突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防止“左”的或右的干扰，对各项工作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带领全市人民统一思想，团结进步，群策群力，开拓创新，开始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此后不久，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重新启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改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始实施，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公社相继撤销，开展“五讲”“四美”^①活动，表彰劳动致富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开展了第二次土壤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从包产到组到联产承包，直到1985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1985年，生产力大幅提高，经济活力明显增强，改

^①“五讲”就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革开放成果显著，全市工农业总产值8041.46万元，比1980年增长65.8%，年均递增10.64%，其中工业总产值3897.01万元，比1980年的1602.58万元增长143%，农业总产值4144.45万元，比1980年的2171.99万元增长90%，粮食单产642斤，比1980年的541斤增长18.6%。

附录

重要人物简介

王进喜与铁人精神

王进喜是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王进喜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建国40周年之际，王进喜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王进喜同孙中山、鲁迅、雷锋、焦裕禄、李四光、毛泽东、邓稼先、邓小平、袁隆平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铁人精神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等。

一、走出苦难——思想的启蒙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庄，就是现在的玉门市赤金镇铁人村。那时的赤金堡，先地震，后大旱，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更有马家军的猖獗，兵变匪劫，贼打火烧，王家慢慢地从一个大户人家衰败成了贫困户，到王进喜出生时，全家只有十几亩沙土地、三间破草房、一个小毛驴。

王进喜五岁那年，地主黄汉青要强占王进喜家的五亩耕地，父亲王金堂据理力争，却被黄汉青勾结保长把王金堂送进了监狱，又气又恨的王金堂怒火攻心，双眼失明。六岁的王进喜只好用一根棍子引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四处讨饭。三年中，王进喜和父亲结伴讨饭又结伴在家里务农活，有时王金堂还得给地主出劳役，五更起床给地主家磨面，天黑了，王进喜才能把父亲接回家，看到父亲劳累受苦的样子，王进喜很是难过，只好天天盼着自己更快地长大，为父亲分一点忧愁。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伪保长强令王金堂出劳役往酒泉送羊毛。王金堂看不见，九岁的王进喜就拿起鞭子，赶着车和王金堂一起去送羊毛。十岁的王进喜，就开始和另外三个小伙伴赶着牛来到了妖魔山下。他们在一个山洞前，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在山洞里铺上地铺，就开始了一年的放牛生活。下雨避雨，刮风避风，遇山爬山，见河过河，遇到狼群就和牛并肩作

战，一天下来，很是劳累。王进喜成为铁人后，常常说“我最懂牛的脾气”“要像黄牛那样做人。”

13岁，王进喜给地主“杨扒皮”背煤。14岁，王进喜顶替父亲王金堂出劳役，到饮马场去修甘新公路。由于不服管教，和伪保长李国功结下了矛盾，伪保长勾结马家军把王进喜抓为壮丁，王进喜急中生智逃回家，爬上房梁躲了起来，等人走后，跟着王永禄一口气跑到了二十几里开外的毛布垵山林里。后来又和几个青海人来到了老君庙。

老君庙前有一条很深的河，那里有沙金，人们就在那里淘金，河里时常会渗出石油，有人就在河里挖油，人称石油河。这样14岁的王进喜也就循着赤金先人的足迹走上了先淘金后挖油的少年之路。挖油是几个赤金人参股合办的土生意。1939年，玉门油矿第一口油井出油，王进喜也与土法采油的人一道跟着进了油矿，干起了勤杂工。

谁想，那一次王进喜逃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油矿请来搞土建工程的正是臭名昭著的扬子公司。扬子公司对工人的管理采用的是工头监工、打骂催逼的把头制度，比地主的剥削更恶毒、更残忍。

在那里，王进喜住的是石窑洞、席棚子，穿的是一张光板老羊皮，白天穿，晚上盖，雨天毛朝外，吃的是小米稀粥、黑面馍、盐水辣子菜，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无论拉煤、搬石块，还是铲沙子、打土坯，都得和大人一样，干慢了要挨骂，干错了要挨打，生病不出工要扣钱，稍有反抗就会招致更残酷地惩罚，对工头点头哈腰赔笑脸，稍不留神就皮鞭相加。王进喜是个犟脾气，

讲理可以，欺凌不行，也就时常会和工头发生冲突，轻者被骂，重者被打，时不时地受到工友们的劝解和关怀。有一次，王进喜背着百来斤重的石头，腿脚力不能支，差点摔倒，工头丁友年举起皮鞭就打，王进喜气红了眼，放下石头去夺鞭子，鞭子未夺到，工头又叫来两个矿警一同制住王进喜，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压在站立着的王进喜的肩上，压得王进喜腔子发热肋骨疼，两眼金花，满脸汗珠，但他咬紧牙关使出浑身力气顽强地站立着，赌着那口要争的气，直等到工头走了，工友们才抬下了石头。

家里交不上门牌税，母亲挨了一顿打，实在没办法，只身跑了二十多里地来找王进喜，可是到了检查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深壕进不去，整整等了两天，才被工友发现告诉了王进喜。王进喜来到铁丝网前，和母亲隔网而哭，然后撕开补丁从缝着的衣服内层取出攒积下来的工资交给母亲说：“妈呀，你要保重身体啊！”母亲则哽咽着说：“娃呀，你千万小心，可别伤了身子。”临别了，母亲满含泪水，儿子泪眼汪汪。

1947年，24岁的王进喜娶了妻子，娶妻子的彩礼是用妹妹出嫁时的彩礼换来的。王进喜一直在指责自己没本事，一心想作个顶呱呱的汉子，迷上了钻井，一有机会就往井和油上靠，向往着当个让人看得起的钻井工人，实现亲手打出石油的梦想。

1949年，油矿解放，受尽了地主和工头的欺压和剥削的王进喜终于盼来了当家做主的惊天巨变，被压迫了二十六年的满腔热血一下地喷发了出来，浑身上下充满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尊敬和热爱，里里外外表现出对工友和师傅们的感激，忆苦思甜，听党教诲，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带头进步，全身心地投入

到新油矿的建设中。

二、入党誓言——境界的深化

玉门解放后，对油矿实行了军事管制，由西北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油矿下属各单位也都派了军代表，钻井方面的军代表是范元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之子），完全把工人当自己的亲兄弟，下班有人教唱歌，还演出了《白毛女》，食堂吃上了白米白面，干部职工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新思想，新风尚，新气象，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欢歌笑语。王进喜对这样的巨大变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要当钻工的思想更加强烈。1950年春，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管制，油矿各方面趋于稳定，油矿开始招工。招工分钻井、采油、炼油、土建、机修、运输、锅炉工等等，王进喜报名当钻工。此时一心想当钻工的王进喜虽然已27岁，但个子不高，身体单薄。钻井整天和大井架、大机器、大铁件打交道，既累又苦又危险，要身强力壮才行，朋友们劝他报机修，但王进喜总是受“钻井的老虎，炼油的狼，总务后勤是个小绵羊”的说法的影响，坚决要报钻井。他说“我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个好司钻，不达目的死都不甘心。”

第一次考试，王进喜很卖劲，抬钻杆、提卡瓦，力气活干得很出色，虽然吃力，却有股拼命劲，但由于他识字少，文化太

低，在念报纸、知识笔答上卡了壳。那次虽然没考上，而他那种一心想当钻工的拼命劲儿却受到了人们的注意，钻井队来选人的几位老师傅郭孟和、梁文德、杨崇义都觉得王进喜上了钻台有一股敢拼的精神，有一种意志力，人也很机灵。就共同给王进喜说情。人事科答应王进喜再考一次，重点想看看老师傅们所说的王进喜身上的那种意志力。

第二次考试，来监考的四八个人站了一排，看热闹的围了一大圈，王进喜站在被考人员的队伍里，紧抿着嘴唇，纤弱中透着一股刚毅和灵动，两只脚不停地倒动，像一只将要猛扑的豹子。考试的第一项是提卡瓦，王进喜把大卡瓦一下提起来，腰一塌，健步如飞地跑起来，不一会就把别人甩了老远。第二项是上天车，哨子一响，王进喜腾地一下窜上钻台，手抓脚蹬，顺着立梯攀援而上，到二层平台转一圈，又顺梯攀上天车，在上边转了一圈，嗖嗖下钻台，回到地面，提前完成了动作。第三项是开阀门，过去虽然偷偷地摸过，但真要考试了，就得认真，这一项也顺利通过，那种特有的意志力得到了在场人员的充分认可，因为缺考了文化课一项，监考们为王进喜的场评给了乙级，算是考上了。给王进喜帮过忙、说过情的郭孟和、梁文德、杨崇义、杨海都很高兴，觉得是块好材料。王进喜百倍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钻工身份，进了钻井队就不停地干活，为自己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一心想着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在各个方面都要走在前面。

当了钻工，王进喜心里乐开了花，但是没文化的难堪又接二连三的发生，工具的型号、钻杆的长短、思想认识的提高，哪一

样都离不开文化，认字少成了王进喜前进的拦路虎。矿上组织了“扫盲班”，教大家识字学文化，讲解人生的道理，剖析无产阶级为什么受苦受难的原因，讲授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分田地，带领穷苦百姓翻身得解放的思想，使王进喜眼前一亮，思想认识上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一些多年苦思梦想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军代表耐心细致地讲解下——得到了解决。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阶级感情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军代表范元绥还亲自领着王进喜与郭孟和签订了包教包会师徒合同，正式让郭孟和收王进喜为徒弟。康世恩说：“‘四五’事件的处理和紧接着开展的各项教育是铁人的人之初。”

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郭孟和、梁文德等队上当钻工。这三年多，无论在哪个队，在什么型号的钻机上，他都是一个勤勤快快的好钻工。在场地上，干杂活、捞沙子、领料、抬配件、排钻杆，干完了这样干那样，从不停手；上了钻台，打大钳、提卡瓦、拉猫头，有时还替司钻扶刹把，样样在行；进了机泵房，开机器、修设备、调泥浆，从不偷懒。师傅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都认为王进喜是个好钻工，有长进。

1953年，王进喜在石油沟一个钻井队当副司钻，贝乌五队成立后，王进喜奉调来当二班司钻。当了司钻的王进喜，很快就表现出了特有的秉性：一是对旧有钻井技术大加改造，加压加速，敢试敢改又敢闯，钻井进尺一月一月地往上蹿，一向落后的贝乌五队，在王进喜身上看到了希望。二是严要求，严管理，对不好的现象严肃批评，从不留情。三是班里班外，爱管闲事，常常弄

得队长和副队长很被动，下不了台。四是性子急，爱骂人。但是渐渐地，大家都习惯了，理解了，而且很看好这样的严司钻，还盼望着哪一天使不声不响的贝乌五队也火上一把。

到1955年，油矿钻井队已从解放初的4个发展到37个，需要从基层优秀工人中选拔一些政治素质强，作风过硬的人员来加强队伍的管理，王进喜的表现引起了钻井大队和钻井处的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讨论分析，决定由副队长王家训、机械工长田振风作为介绍人培养王进喜入党。

王家训对王进喜说：“入党不是小事，得有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你优点很多，毛病缺点也不少。文化低，可以学，大老粗身上的毛病也得好好改。以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们要严格要求你，认真帮助你，你得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王进喜说：“行，队长，我一定听你的！”王家训说：“不是听我的，是要听党的！”

后来大队党总支书记满应科又找王进喜谈话，满应科说：“入党就是要下决心跟党走，干好钻井工作，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包括生命也在所不辞。简单点说，就要像革命战争时期老前辈那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人民利益豁出命来干！”王进喜说：“这我有决心，能做到。”满应科又问了王进喜对当前工作有什么意见，王进喜很直接地说：“我就是对‘长工活’有意见，那是对付地主工头的办法，我们是国家主人了，是给自己干活了，我就想把机器开大，转盘开快，狠狠地打，快快地钻。一看见有些人轻压慢钻一点点磨着我就着急，就生气。”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王进喜政治学习较弱、简单粗暴的

毛病得到了认真地克服，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查实和澄清，1956年4月19日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王进喜入党，29日批准王进喜为预备党员。12月17日，大队总支批准王进喜为正式党员。

王进喜在入党自愿书中写道：“我没学习过马列书籍，但在报纸上看过党章、党纲，在大队听过党课，我了解了党章、党纲。经过队长和党员同志们给我从思想上教育，对我思想上影响（教育）很大。感到只有党才能解放受苦的人类，只有共产党才能使农民、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因而，我为给人民给祖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所以要求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希望组织上经常对我帮助教育，多给我指出缺点，使（我）能当一个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

高炉出好钢，烈火炼真金。党的教育和培养，使王进喜单纯的好好干的报恩思想升华为彻底革命的思想，成为一名自觉的先锋战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钻井闯将——精神的孕育

1956年，王进喜调离二班，到队里当大班司钻。队上分配来一批转业军人，队长让王进喜对他们进行入队教育，王进喜先把新入队的战士带到西河坝窑洞前讲解解放前油矿工人生活得多么苦，多么累，多么挨打受骂的往事，又带到井上讲解打井技术、生产纪律、安全防护的基本要领和要求，入队教育过后，20多名转业军人正式加入了贝乌五队。

5月，贝乌五队到三角湾打井，套管被卡，队长让王进喜把套管提起，放下，再提起，再放下，不知提起放下了多少回，套管才开始松动。三天三夜，王进喜没有离开井场一步。困了，就在值班房眯一会儿；饿了，啃一只馒头。直到第三天下午，王进喜把套管才提起一米多。这时，王进喜提起套管，再凶猛地突然放下，反复了二十多次，活动的距离越来越大，解了卡。井场上，人们欢腾起来，而王进喜却呼呼地睡着了。

不久，队长姚武生调走了，副队长王家训被任命为队长，王进喜被提拔为副队长，但是不到一个月，王家训也被调到大队，王进喜被任命为队长。王进喜不到一个月连升两级当上了贝乌五队队长，心里没底，着急中来找师傅郭孟和。王进喜说：“师傅，前些日子我还正在琢磨着怎么协助队长打翻身仗哩，没想到今天就下令让我当队长，我真怕当不好。”郭孟和说：“有党领导你怕啥，只要听党的话，就没问题，干吧！”郭孟和的一席话让王进喜豪气上升，信心满满，下定了当好这个队长的决心。

古人云，新官上任三把火。王进喜上任一把火也没点，而是老老实实的做基础工作，根据队上钻工的品性、技术力量的强弱，逐渐调整了各班的司钻、副司钻和司机，使人力和技术资源得到了优化组合，然后就把大家召集起来，查找分析贝乌五队为什么总是排名倒数第一的原因，再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由于大家都对倒数第一不服气，心里憋着一股气，队长一提议，话匣被打开，有的说：“司机手里没准儿，该快时不敢快，措施不当，事故多，就成了倒数第一”。有的说：“司钻送压不均匀，地层软硬交错，常常卡钻，耽误时间。”有的说：“交接班不细，干

活稀里马哈，当然事故多。”有的说：“队里许多人有扛长工的思想，干起活来腰来腿不来，看不过眼。”有的说：“队长外行，抓得不紧也是关键。”有的说：“队长不敢抓，也不行。”

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王进喜看出了问题的结症，也看到了大家想打翻身仗的热切期盼，最后就订出了六不接班制，即：设备卫生搞不好不接班，下一班准备不好不接班，场上材料、工具摆放不好不接班，泥浆槽的沙子捞不净不接班，报表填写不细不接班，交接班不清楚不接班。

后来，新的支部书记孙永臣到任，又调来了技术员田肇雄。这样一来，敢说敢做，猛打猛冲，敢于严格要求，能带领队伍往前闯的队长，和基层管理经验丰富，沉着稳健，善于做思想工作，把人心能拧在一起的支部书记，还有有知识，懂钻井，机敏精细，善于团结人，能把技术关，司钻们都信任的技术员，三个人就像一只大鼎的三只脚，牢牢地把全队干部工人团结成了一个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人心齐，泰山移，六十多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王化兰钻井队事故少，进度快，王进喜就到王化兰队去学习。王进喜问了好多问题，但王化兰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突如其来地问道：“你爱骂人的毛病改了没有？”王进喜脸一红，说是改了一些，王化兰严肃地说：“那不行，得彻底地改！我跟你讲，你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全队的人支持，你也干不好。”接着又说：“你当了队长，不能离开钻台，不能离开刹把，要和大家一起干。工人身上有多少泥，你身上就得有多少泥，这样大家才不把你当外人，上了井，眼里要有事，要了解钻台上的

情况，知道机房的情况，清楚地下的情况。特别是，你要学会给钻机看病，应该分析清楚井里是什么钻头，是新钻头还是旧钻头，井下钻具出没出问题。技术过硬有经验，大家就会服你，信任你，这工作就好做了。”

这次学习，对王进喜帮助很大，从此王进喜一头扎到打井上，除了打井，什么都不顾。油矿的许多单位都有一种感受，都认为王进喜为了多打井，打好井，甚至变得十分难缠。打好一口井，需要多个单位的合作配合，王进喜就把他们缠得没办法。余群立说：“王进喜的难缠作风体现了他扎实科学的工作作风和他的快节奏，形成了一种冲击力，冲击了慢慢磨的习惯思想，冲击了我们领导机关四平八稳的老作风。他的不服输，他的不安分，搅得大家不安生，但是给整个工作带来了活力。”

1956年5月19日，几天没合眼的王进喜正和大家在三角湾打715井，忽听“咚”地一声巨响，井喷发生了。见此情景，王进喜大吼一声：“别慌！坚守自己岗位！”在王进喜的指挥下，各项压井措施紧张有序，有条不紊，科学得力，待到一切恢复正常时，井场上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泥猴子，但从白花花转动的眼里却能看出制服井喷后全体队员难得的自信和自豪。完井总结会上，支部书记孙永臣说：“715井打完了，说明我们贝乌五队不是什么豆腐队，我们也能打硬仗，打恶仗。”司钻王岁厚说：“只要咱们思想上重视起来，准备工作做细，做扎实了，再加上出了事不慌，什么样的地层我看都能对付！”

715井使贝乌五队打出了信心，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必胜的决心。此后，614、704、699、733、501、765、714井，越战越猛也

越战越顺，这一年全队破天荒地打了十口井。765井完钻后，下一井位离765井只有13米，要是全部拆卸、搬运、再组装，要花好几天时间，王进喜发动大家，硬是创造了一个整体搬家法，一举获得成功，开辟了钻机搬家的先河，在场的领导、专家、职工无不为之叫好。王进喜披红戴花捧得油矿领导颁发的奖状，从此贝乌五队跨进了先进队行列。

1957年3月，油矿决定在319井旁边再打一口井。提起319井，玉门人有谁敢忘有谁不知。那是残酷的写照，是油矿工人的噩梦，是井毁人亡的悲剧啊！但是，钻井就是钻井，不敢直面井喷者必然会被井喷吞食，王进喜不信邪，决心战胜这个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319井。经过36个日日夜夜的奋战，319井完钻了，贝乌五队硬是从死神堆里刨出了一口高产油井，攀上了一座人们不敢向往的高峰。

1958年，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石油产量，石油工业部决定让玉门油田和新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开展钻井进尺比赛。最初，玉门确定参赛的是景春海队，王进喜知道后认为是油矿领导在小看贝乌五队，不服气，憋着一口气就去找大队长王嘉善，没能得到同意，又去找局长焦力人，焦力人被他缠不过，就去向市委书记刘长亮汇报，刘长亮说：“好哇，群众的积极性要保护，嗷嗷叫的队长，要坚决支持。”如愿以偿的王进喜这才参加了进尺比赛，可谁知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却一马当先，在“月上五千米，钻透祁连山，快马加鞭进军吐鲁番，定把标杆立天山”的口号鼓舞下，王进喜钻井队不仅超过了玉门的景春海，还超过了克拉玛依代表队，创造了5009.74米的全国纪录，一举夺得了“钻井卫星”

的称号，王进喜也被人们称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在兰州出席甘肃省劳动模范大会，大会发言的前几天，王进喜就想：活是大家干的，荣誉我一个人拿，这个言怎么发呢？他找到彭佐猷，让彭佐猷给他写发言稿。王进喜说：“我一个旧社会的放牛娃，1949年后当了钻工、司钻，入了党，当了钻井队队长，今天又当了省劳模，都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啊！”彭佐猷就照这个意思给他写了四句话，31个字，王进喜发言时用31个字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从放牛的苦、当长工的恨、得解放的喜、当钻工的高兴、入党的情景，讲到319、白杨河、五千米、三角湾，每一个战绩的取得都没有离开过集体的创造、师傅的帮助和党的关怀，大会结束后，彭佐猷每逢玉门人就说：“王进喜，人才，人才啊！难得的人才！”

会议推举王进喜为出席全国工交群英会的代表来到北京。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接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检阅，王进喜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一起站在观礼台上，他看着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心潮澎湃。

然而，当他看到北京大街上行驶的公交车因为缺油不得不在上面背着个煤气包的时候，王进喜哭了。这一哭，使王进喜如梦方醒，自己成天和石油打交道，以为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油，哪知全国石油却紧缺到这样的程度，连毛主席居住的首都北京都出现了油荒。余秋里得知王进喜在沙滩上哭的消息后说：“这是一种英雄的境界”。王进喜说：“国家没石油作这么大的难，我们石油工人有愧呀！”群英会结束前，传来了大庆发现大油田的特大

喜讯，王进喜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场就向石油部领导请缨去参战，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说：“老王，你先别急，仗有的打，你先回玉门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也有个思想准备，到时候要你去，你不去还不行呢！”

回到玉门，王进喜向玉门市局领导汇报了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情景，讲述了北京的所见所闻，紧接着就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冬季打井之中。1960年2月16日，玉门《石油工人报》刊登了专题报道，正标题是：钻井闯将大闹革新，英雄井队高速跃进。副标题是：王进喜钻井队半月钻成两口井。就在贝乌五队又创一项新纪录的第二天，2月12日，康世恩传达了部党委开展大庆会战的决定。3月初，余秋里点将，调玉门王进喜钻井队、景春海钻井队、孙德富钻井队立即赴大庆参加石油勘探大会战。要求是：不提困难，不讲价钱，带齐设备，迅速参战。按照规定，王进喜钻井队要带34人，精明的王进喜对此做了充分地准备，要求各班正副司钻、司机、大班司钻把几年来贝乌五队偷偷积攒下来的家底全带上。要弄清楚，队里有的，有什么；队里缺的，缺什么。该要的要，该领的领，能拿的就拿，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反正新油田什么都缺，到时候肯定都有用。王进喜又发挥他难缠队长的优势，领着人马找领导批，跑料库找，到处筹集，只要能用，都想拉回队。在火车站，他们把大件直接装上车，把容易碰坏的物件打包装箱，零碎物件统统装进泥浆罐，罐口用焊焊死。所有物件都用红漆写上‘玉门—萨尔图1262钻井队’。大队长王嘉善回忆说：“王进喜在玉门出发前拿了几件美国东西藏在床底下，当作珍宝准备到大庆用，怕说是崇洋媚外，不敢声张，实际上我们都

知道，就是不说而已。”

1960年3月，大庆会战在苏联撤走对华援助、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打响了。大庆地方，沼泽，盐碱，荒无人烟，参战人员必须具备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想为国家拿油的思想觉悟，会战指挥部决定把思想工作的重心放在建设一支关键时刻冲得上、拿得下、打得响、过得硬、拖不跨、打不烂的会战队伍，决心培养和树立一批“会战先锋”。

到达萨尔图，全队下车在玉门市委赠送的“更高标杆立祁连”的锦旗下集合。接待的同志迎了上来，王进喜二话不说，开腔就问：“我先问你，我们队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记录是多少？”接待的同志回答不上，王进喜正在生闷气，从玉门调来到大庆担任萨中指挥部指挥的宋振明赶到了，王进喜见是熟人，扯着嗓门就说：“你们这是啥调度员，问啥啥不知道！”宋振明先安慰王进喜，王进喜却说：“我是憋着一口气来的，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咋能不急嘛！”王进喜从宋振明嘴里得知了井位，转身就走了，宋振明看着他迎着寒风走去的身影，心想：“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抢先只有三句话，王进喜全然一副战士的做派，是一块打硬仗的料。”

来到马家窑，找到了萨55井的井位，刚刚住进赵大娘家里，就研究安排了收集地质资料、到附近队学习、搞好后勤工作、及时去火车站接钻机、帮助赵大娘做好备耕生产的事，当晚睡了一个好觉，谁知，这竟是王进喜在赵大娘家睡的唯一一次完整的觉。天一亮，王进喜带人来火车站找钻机，铁路两旁从各地发来的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巨大的井架、长短不一的钻杆、油管 and 成

堆的水泥、煤炭放在一起，柴油机、水泵、帐篷、行李、蜡烛互相叠压，雪地上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载货的车皮排了一长溜，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的材料，王进喜心里一阵急躁，就叫人回去带来20名工人拿上家伙来卸车。贝乌五队义务卸车干得好，带动了不少队也来帮忙卸车，清理站场，车站杂乱无章的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车站把情况向萨中指挥部作了汇报，宋振明和几位领导来慰问，表扬他们干得好，王进喜却说：“可别表扬了，都是为了大会战，你看看石油部长一只胳膊还来到荒原上和我们一起干，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那么大年纪了还到井场搞科研，和我们一起吃苦挨累。他们的压力我们要分担些。”

3月30日，萨中指挥部召开成立大会，按照会战指挥部的部署准备打响第一炮，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已是萨中指挥部党委委员的王进喜表决心说：“我们队要和景春海、孙德福、张云清队比一比，看谁打得快、打得好。一定要三天半上千，五天打完一口井，创造一个全国新纪录。”但是实际工作中，王进喜看到许多方面条件不具备，各方面存在困难，就提出“有也上，无也上，脱了裤子也要上”。

4月2日清晨，贝乌五队的钻机终于到了，可是萨中指挥部只能调出五辆小汽车，拖拉机和吊车一时还排不上号，40米高、60吨重的井架，怎么才能搬到井位上呢？王进喜说：“大会战就像打仗一样，只能上，不能退，只能干，不能等。没有吊车，我们37个人就是37部吊车，汽车不够，我们有手有脚有胖子，蚂蚁搬山也要搬。我们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卸车、搬运、安装，早就位，早开钻。”工人们在队长的鼓舞和带动下一个个跃上了

火车皮，一场人与钢的较量、力量与困难的搏斗就这样开始了。大家聚在一起，把能抬动的物件喊着口号抬起来装上汽车，到了井位再抬着卸到地面；抬不动的，就垫上枕木，人拉肩扛，撬杠撬，一点一点地移动；能拆开的就拆开，化大为小；怕砸坏汽车，就找来小塔吊帮忙。贝乌五队在没有拖拉机和吊车的情况下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设备搬到了井场。

4月3日，搭钻台。4月4日，上钻台。4月5日，立架子。4月6日凌晨，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巨大的井架徐徐升起，矗立荒原，直指蓝天。赵大娘几天不见王进喜，就让孙子领着，端碗面条来找他，赵大娘看到工人们站在比房子还高的钻台上，把一个比几个碾盘还沉的铁家伙往上拉，王进喜脱了棉衣，在台子上手攥大绳拼命往上拉，手被勒出了血，绳上留下一道道映红的血印，边拉边喊号子。赵大娘顺着带血的绳往上看，只见王进喜比来时瘦了一大圈，颧骨隆起，眼窝深陷，胡子老长，嘴唇干裂，可听他喊出的号子声，却仍是那样的坚定有力，赵大娘老眼昏花，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赵大娘越看越心疼，走上前去大声喊道：“王队长，歇口气吧！跟我回家吃顿面条！”可她哪里知道，震天的号子声和工人們的吼喊声早就把大娘的话淹没到了大干的气势中，人们根本就听不见。后半夜了，赵大娘怎么也睡不着，正好碰上张志贤回来休息，赵大娘说：“你们的王队长也不是铁打的，咋能这样干呢？”张志贤说：“大娘你不知道，现在国家缺油，王队长他着急呀！眼下吊车拖拉机不够用，他宁可自己多吃苦，也要领我们手拉肩扛把钻机装上，好早点开钻，多打井，快出油。”赵大娘说：“活了大半辈子，除了那些打鬼子打

土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外，没见过这么拼命的人。你们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哪！”

赵大娘管王进喜叫铁人的事反映到工作组，工作组又反映到指挥部。4月9日至1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第一次技术座谈会。11日，座谈会扩大到500人，石油部部长余秋里作总结，在讲到怎样完成任务时，余秋里抬高了声音，说：“我们必须具有猛攻猛打、雷厉风行、严肃认真、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刻苦耐劳、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决心和信心，要发扬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然后余秋里把王进喜叫到会场中间，指着王进喜说：“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第一个英雄。”在郑重地介绍了王进喜感人的事迹后，余秋里接着说：“房东大娘管他叫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因此，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高度积极觉悟和共产主义风格。”“铁人来自大会战，大会战需要铁人，有了这样一批人，困难再大，会战也能打上去，必然夺得胜利。我们要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话音一落，人们就把王进喜抬起来整整绕场一周，全场响起“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的口号。4月13日创刊的《战报》第二期正式发出了“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的口号。

王进喜3月15日从玉门出发，3月25日到大庆，4月11日被喻为铁人，仅仅只有十多天时间，但这种精神的形成却整整经历了三十七年。铁人精神经历了孕育、形成和升华三个阶段，王进喜

在玉门生活工作的三十七年，正是铁人精神的孕育阶段。

四、会战先锋——光芒的发扬

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五天零四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六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

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持续三年多的石油会战，大庆共探明油田面积860多平方公里，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完成财税10.6亿元，除回收投资外，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

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1963年12月4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大庆石油会战不仅为我国的石油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涌现出王进喜等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劳动模范，铁人精神由此发扬光大。

1964年年底，王进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上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井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井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井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

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十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五、中流砥柱——力量的升华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

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

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

孙健初

孙健初，字子乾。1897年8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后孙密城村一个农民家庭。孙健初的父亲孙云阶是一名秀才，在乡村开办私塾教学。孙健初从八岁起在父亲办的私塾里读书，到1912年考入濮阳县高等小学，熟读四书五经，也学会了田里的农活。

1920年，孙健初从山东曹州（今菏泽县）鲁西国立第六中学毕业，父亲希望他留下支撑家业，孙健初则要求深造。

1920年9月，孙健初考取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两年后入本科。孙健初在山西大学期间学习刻苦、生活节俭，他同瑞典籍教授新常富接触较密。新常富对孙健初的刻苦精神也很赏识。新常富对地质化学造诣颇深，主办了“瑞华博物考察会”。孙健初毕业后于1927年被吸收为该会第一批地质调查员，逐渐接受了新常富“以纯正科学来救国”的思想。他后来回忆说：“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一心学采矿地质，并且把它学得很好”。1929年1月，经新常富的举荐，孙健初进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开始任地质调查员，后被提任技佐、技正。

在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地质调查活动。从1929年到1934年五年间，他三次去绥远大青山、察哈尔一带调查，发现20多处煤矿和一些石棉、水晶、石墨矿；两次去辽宁、吉林，勘查煤矿、金矿；又去安徽、河南调查铁矿、煤矿。在长期地质调查的实践中，先后写出《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

地质志》等20多篇论文和报告，其中有许多得到地质界权威人士的好评。

1934年，孙健初和侯德封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黄河上游地质调查，共同撰写了《南山及黄河上游之地质》报告，后又撰写了《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的论文。

1935年初，中央地质调查所组成以翁文灏为主任、黄汲清为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孙健初为委员，并负责青海、甘肃、宁夏地区的地质调查，历时八个多月。1937年，孙健初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安排，又参加“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开始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1938年至1939年由孙健初主持的玉门油田勘探，取得成功，转入正常开发，此后孙健初即全力从事石油地质工作。1942年至1944年，去美国考察油田，进修石油地质，写出《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和《发展中国油矿纲要》。1946年，孙健初任甘肃油矿局探勘处处长（后改为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勘探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抢掠、破坏，孙健初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职工巡逻护厂，将全部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为保护。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贺龙亲自到勘探处，对孙健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倍加赞扬。

1950年，孙健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石油管理总局探勘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健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

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健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

1952年11月10日深夜，因煤气中毒逝世，终年55岁。

康世恩

康世恩（1915至1995），河北怀安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一二〇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1955年7月至1956年9月，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55年10月起）。1956年10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书记（1965年2月起）。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9年至1971年，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江汉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1970年6月至1971年9月，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9月至1975年1月，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代组长。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

任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78年6月至1981年2月，任国家经委党组书记；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除满腔热情地做好培养青少年的工作外，还时刻关心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康世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严爽

严爽，字滢波，生于1895年。严爽的父亲医术高明，有记载说“求诊者颇多，赖以起家”。这样的家庭为严爽早期的教育奠定了条件。严爽七岁入私塾读书，14岁进入泰兴县立小学学习，

16岁在南京两江师范学校读书。开明的父母支持他继续求学深造。1913年，严爽进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后来进入矿冶系学习，从此他踏上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之路。

1919年，严爽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开滦煤矿矿场、北京石景山龙烟铁矿和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任职；1929年6月又到吉林穆稜煤矿任采煤技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祖国的半壁江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着神州大地，严爽不愿做亡国奴，于1932年愤而辞职，来到南京国防设计委员会做调查员，为中国的采矿工业奔波操劳。

1934年，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决定开采陕北石油，任命孙越崎为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严爽为主任。当年9月，在陕北延长井位，严爽担任第一钻井队队长的101井出油，日产1.5吨，这是中国人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打出的第一口出油井，严爽也成为中国石油钻井第一人。出油的第二天，他们架起了原始的卧式锅炉，用骆驼草、柳树和附近煤矿的煤作燃料，采用蒸馏的方法，炼出了柴油，随即用自己炼出的柴油启动了柴油发电机。油井出油七个月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攻占了延长。当毛泽民得知延长油矿的情况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生产，立即派人将严爽等人接到他的住处。毛泽民与严爽促膝谈心，请严爽担任延长油矿技术主管、中央石油厂主管技术厂长。此后，严爽所在的石油厂不仅为红军和边区政府生产出了煤油、蜡烛、油墨，还研制出预防冻伤的防护油膏。原来，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中多南方籍战士，北方寒冬朔风凛冽，红军战士不适应北方冬天的寒冷干燥天气，手足多皲裂或生冻疮，行动大为不便，严重影响

了战斗力。严爽专门研制的防护膏批量生产后供红军使用，作用十分显著。为此，严爽受到中央的表扬，被授予“边区模范”。1936年初，在毛泽民的关怀下，严爽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月，严爽赴日本、美国考察石油工业，8月正式进入美国诺曼大学研习石油工程。学海无涯苦作舟，严爽一生都在一边工作、一边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就连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年，还于1959年6月进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1938年6月，资源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严爽为筹备处主任，开发玉门石油。严爽和孙健初、靳锡庚同赴兰州，开始筹备所需要物资。1938年11月，严爽一行人坐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沿着刚修建完毕的简陋的兰新公路，从兰州颠簸着向酒泉进发，奔赴玉门。

1939年3月，经周恩来关心协调，由陕甘宁边区借来的第一部钻机运抵老君庙，从各地调集和招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陆续到达。5月，在距老君庙北15米处，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自喷出油，每天可产油10吨，后来又有几口油井相继出油。1940年8月，从湘潭煤矿运来的钻机到矿，严爽决定加深4号井，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钻到439.17米发生强烈井喷，从而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L层，证明玉门油田是一个储量丰富、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油田。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由孙越崎出任总经理，严爽任矿长，负责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1939年到1945年，共完成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资力量。

抗战胜利后，为了整合全国各地的石油事业，同时防止国外石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1946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石油总公司，翁文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总经理之下设四名分管具体事务的协理（即副总经理），分别是负责总务和财务的张兹闾、负责矿务的严爽、负责炼务及材料的金开英和负责业务的郭可铨，这些人都是中国石油界的元老。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把石油专业人才移至台湾，在台湾设立了分公司，让严爽担任总经理，严爽断然拒绝。作为总公司协理的严爽，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直接出面将中国石油总公司原有的“员工励进会”“员工福利会”改造成为“员工联合会”，使之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员工联合会”实际上成为中共与即将垮台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合法组织。斗争的结果，不仅保护了原中国石油总公司的绝大多数企业资产，而且将绝大多数高级技术人员留在了大陆，留在了新中国，严爽功不可没。为了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严爽曾撰写了《中国油矿纪要》，于1948年3月完成。上海解放后，严爽又编写了《中国石油事业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严爽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副司长，一直满腔热情地参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

1962年5月，严爽在北京病逝。他用自己奋斗不息的一生为中国石油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靳锡庚

靳锡庚，1900年11月14日生于河南省杞县邢口集。1928至1932年，在河南焦作工学院学习。1932至1934年，任湖北大冶煤矿测绘员。1935至1936年，任豫化督察处公路测绘员。1936至1937年，任焦作同官煤矿技术员。1937至1938年，任陕西探勘采矿处技术员。1938至1945年，任甘肃玉门矿务局工程师。1945至1946年，任美国钻井采油实习员。1946至1950年，任甘肃玉门矿务局工程师。1950至1951年，任兰州西北石油管理局材料处处长。1951至1955年，任石油管理局总供应处副处长。1956至1957年，任石油部地质司钻井处副处长。1957至1959年，任石油部地质勘探司副总工程师。1960至1964年，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1964至1966年，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66至1969年，在北京东郊农场劳动。1970至1978年，在家病休。1978至1988年，任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1988年3月退休。1998年4月17日病逝于北京。

靳锡庚是石油钻井工程专家，首次绘制出老君庙和石油沟的地质地形图和地质构造图，是玉门油田的主要发现人和创建人之一。

杨拯民

杨拯民，原名杨思毅，杨虎城之子，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

战部部长，银城市委书记，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因病于1998年10月2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经历“西安事变”后的杨拯民，对蒋介石已完全失去信心。为了追求光明，他决心到延安去。1938年3月，杨拯民怀揣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写给罗瑞卿的介绍信，来到延河之滨，进入“抗大”二大队一队，成为抗大的第四期学员。在这个大熔炉里，杨拯民很快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在战争年代，杨拯民主要从事军事工作，也曾当面向周恩来坦陈他对当时延安开展的所谓“抢救运动”的看法，并建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搞好甄别平反工作。杨拯民还亲自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从1942年到解放前夕，杨拯民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统战部长、县委书记、一野骑六师副师长、关中军和大荔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如果他继续留在军中工作，应该说前途无量。然而，杨拯民却要求投身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之中，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去工作。1950年，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是杨拯民的老上级。当杨拯民料理完了父亲的丧事后，就对习仲勋书记说出了他想搞工业的想法，并且就在大西北搞，还

指名要到玉门油矿去。那时任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是彭德怀，他是一个很爱才的人，希望杨拯民到西北空军工作。可是杨拯民考虑再三，还是想去玉门搞石油工作，为此还是习仲勋书记出面，亲自找到彭德怀司令，要求军队支持一下地方工作，这时杨拯民才如愿以偿。

解放初期的玉门油矿，是国家重点油矿，也是当时最大的油矿。杨拯民到任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油矿生产的恢复工作中。经过几年的努力，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发展很快，到1957年底，玉门油矿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成为年产近百万吨的大油矿。那时的玉门油矿职工达5万人，加上家属达10万人。杨拯民当之无愧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周恩来打报告要求调杨拯民任副省长。从此，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不久，杨拯民被关进“牛棚”。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逝世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

王曰才

王曰才（1923年5月15日—2016年2月15日），石油地球物理测井专家，教育专家，我国石油地球物理测井工程专业和教育的创建者之一，研制的“测井电模型”提高了油层的判断准确率，获石油部重大科技成果奖。

1946年8月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工学部采矿系，获工学士学位。9月，在该校物理探矿研究室读研究生，1947年底回国。1948年，被分派到甘肃玉门油矿，从事测井工作和建站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1950年，被评为玉门油矿劳动模范，9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8月，王曰才调入北京石油学院，任副教授，受命创建石油测井工程专业。1955年7月，石油测井工程专业初步建立了起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测井技术人才。1959年9月，他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卫生标兵，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生群英大会。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1979年，被任命为石油学院勘探系主任，继续中断了十几年之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4年退休，2016年2月15日22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山东省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

郭孟和

1907年出生，山东即墨县人，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外出，流落青岛，先后在私人作坊、工厂做工。1927年逃难到东北，后流落到苏联伯力。1938年回国后，在乌苏油矿当钻井工，1945年到玉门油矿工作，成为技术骨干。1949年，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9月25日，解放了玉门油矿。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迅速投入战斗。郭孟和参加了军管会组织的工会会员短期学习，向军代表提出了入党要求。1950年2月8日，郭孟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玉门油矿解放后第一批入党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郭孟和率领钻井队，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海拔2600米的祁连山下凿冰打井，开我国石油史上冬季钻井先例，被誉为“祁连山下冬青树”。他改进50型钻机的捞沙绳、猪头绳、泥浆回收器等设备，提高了工效，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恢复生产和基地建设中屡建功勋。1951年荣获全国工业战线劳动模范称号。

1954年9月21日，郭孟和领导的1207钻井队以日进尺234.3米的业绩，创造了全国日进尺最高纪录。同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郭孟和作为石油工人的代表参加。1955年，郭孟和开始从事工会工作，先后担任玉门矿务局钻井公司党委第二书记兼工会主席、玉门市总工会副主席、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会副主席、主席。在领导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保

持一贯的作风，勤勤恳恳，严于律己，胸怀坦荡。1959年他连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后连任四届、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有着丰富钻井经验的郭孟和还自觉担负起培养年轻技术工人的任务，严格要求学徒。铁人王进喜就是他带过的众多学徒中的一个。1959年，王进喜也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和师傅郭孟和一样，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孟和蒙受迫害。

1978年平反后，郭孟和担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1979年被石油工业部树为全国石油战线“学铁人”标兵。看到他年纪大、身体不好，还经常乘卡车下基层，上级特意给玉门局拨了一辆小车专用，但他很少坐，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别的同志去办公事。郭孟和的老伴身体多病，每当需要去医院诊治时，他总是叫孩子用自行车把妈妈驮上，自己在后面扶着。

1983年2月9日，新中国第一位石油工人中的劳动模范——郭孟和，走完他光辉的一生。

张复振

张复振（1907——1968），山东省莘县古云中心镇阎庄村人。1924年后，从军于冯玉祥、杨虎城的部队，后升任团长。1936年率部参加“西安事变”。1938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七团团长，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师长兼汉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5年7月，率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十七师于河南洛宁起义，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并任命他为西北民主联军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垣曲战斗、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1949年5月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军五十七师师长、汉中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8月，转任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先后兼任玉门市市长、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杨志范

杨志范，1922年4月生于陕西临潼县，1937年参加革命，曾转战于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1949年，在兰州黄河铁桥激战中负伤，伤好后调任酒泉地委组织部部长兼纪检委书记。1952年，任玉门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在主管玉门油矿工会工作期间，杨志范经常深入厂矿、车间，和工人群众交谈，与职工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关心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化解纠纷矛盾，确保团结安定。杨志范亲自处理建筑公司赤金砖厂59名工人罢工事件，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期间他吃住在砖厂，深入了解罢工的具体原因，反复劝说，耐心解释，公平讲理，批评干部，解决问题，工人们非常信服，事件得到圆满解决。

1958年1月，杨志范从中央党校结业，任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6月，任玉门市市长。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在海拔4000多米

的镜铁山找矿，不顾疲劳，半夜督战，完成了艰巨的炼钢炼铁任务。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走遍了社队各个角落，写下了298段反映农村现实情况的顺口溜，顶住“左”倾思想的干扰，实事求是地揭露矛盾，严肃认真地反映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主张农村休养生息，主张给农民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反对说假话大话空话，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刮共产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征过头粮，对一些问题坚决加以抵制，对一些干部进行严肃批评，认真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1959年春，中央对严重的“左”的现象进行纠正，开始整社。杨志范对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纠正，加强社队食堂管理，大社大队划小，划分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对“一平二调”中没收到社队的农户财物坚决算账退赔，对上级错误敢说敢顶，对社会不良现象敢抓敢管，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想为群众所想，急为群众所急，和群众打成一片，最终使整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人们称他为“杨青天”。

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庐山会议（简称“八届八中全会”）上，因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纠“左”变成了反右，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杨志范在反右倾运动中被称作“杨诗三百首”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1960年3月下放市化工厂劳动锻炼。

1962年6月，市委对杨志范问题进行甄别，撤消了处理决定。

1963年初恢复工作，1964年2月任酒泉地委副书记，仍然主抓农业和农村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打倒。1973年，因病送北京治疗，1974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年仅52岁。1978年12月平反。杨志范虽然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但他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玉门人民的心中。

历任（县）市委书记简介

玉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赵子尧

（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

赵子尧，男，汉族，河北省束鹿县人，生于1914年，家庭出身贫农，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参加革命后曾在部队任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九师民运股股长。1949年随部队解放大西北，玉门县解放，赵子尧从部队转留到地方工作。自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任中共玉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任酒泉军分区独立营副营长。领导了玉门县的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工作。

玉门县第二任县委书记——杜秉德

（1952年6月至1954年11月）

杜秉德，男，汉族，家庭出身贫农，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米

脂县。参加革命前在家乡劳动，1933年在本区由刘振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为陕北米东区游击队队员。1935年1月至3月，在陕北酒店坪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北米西区二十三支队当班长，后任支部书记。1935年6月至12月，在陕北米西六区任区委书记。1935年12月至1936年3月，在陕北瓦窑堡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36年3月，任米西县委边区部部长。1936年8月，在横山独立营任副政委。1937年3月，在蟠龙党校学习三个月。1937年5月至1938年10月，先后任米西工交委员和县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10月，在警备团民运股工作，到山西扩兵，曾任新兵营连长。1938年12月至1939年11月，在米脂县书店任经理。1939年11月至1940年4月，在警备一团卫生队任政治指导员。1940年4月至1942年12月，在警备一团直属总分支任分支书记，期间于1941年1月至12月，在延安民运训练班学习。1942年12月至1946年6月，在警卫七团直属队任政治协理员和民政股长。1946年6月，在绥德司令部武装科工作。1946年10月，在米脂大队部任大队长。1947年5月至8月曾在绥德、米脂、子川三县任工委书记。1947年8月，在米脂县委农会领导土改工作。1948年1月至1949年6月，任横山县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任敦煌县委书记。1952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玉门县委书记、地委委员。1954年11月至1955年11月，任酒泉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委员。1955年11月至1962年12月，在张掖地委工作，曾先后任地区监委书记、地委委员、地委常委、张掖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掖地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1月，调甘肃省贫下中农协会任专职委

员。1963年3月，经省委批准离休，1979年10月31日病逝于兰州，享年71岁。

玉门县第三任县委书记——鲁愚

**（1955年6月至1958年12月、1961年10月至1963年6月、
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

鲁愚，男，汉族，陕西榆林人，生于1918年，家庭出身中农，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自幼在家务农，1935年7月，在陕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甘洛县军事部当通讯员。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县粮食局当干事。1938年任平凉三区区委书记。1940年至1942年，在延安西北党校学习文化。1942年至1947年10月，先后在西北行政处当食堂管理员、新城社主任、土改工作团队员。1947年10月至1949年8月，先后在三军政治部宣传队当队员、三军后勤部粮食工作队任队长。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随三军到地方工作。1949年11月至1953年4月，在酒泉专员公署任文教科长。1953年4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酒泉地委委员、地委干部学校校长。1955年6月至1958年12月，任中共玉门县委书记。1958年12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共玉门市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1年10月至1963年6月，任玉门市委书记。1963年6月至1964年10月，任玉门市市长。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任玉门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停止正常工作。1971年调离玉门市，到国营

八〇三厂任党委书记。1976年任兰州市供电局党委书记，1981年离休。

玉门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刘长亮 (1957年10月至1961年11月)

1917年9月30日生，陕西省神木县人。曾用名刘德义、刘哲亭。中农家庭出身。先后在本村上冬学、初小，神木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1931年8月参加革命，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1932年至1933年，在本村刘家坡小学任教员。1934年1月至7月，任本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参加打土豪、开辟苏区的斗争。7月至8月中，任青年团神木县第四区委书记。同年9月至1935年2月，任共青团神木县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1月至7月，任神木县团委书记、神木东区团委书记，7月至12月，任中共神（木）府（谷）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同年12月至1936年2月，任共青团神府特委巡视员、特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2月至9月，任中共佳芦县委书记。同年8月至1937年2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2月至4月，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5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的代表会议。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5月至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到1938年1月，任中共葭县（今榆林市佳县）。县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4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神府特区组织部部长并

兼任两期干部训练班班主任。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任中共神府特区宣传部部长兼任神府县抗联主任。1942年2月至1945年7月，兼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一河防司令部政治委员兼神府县保安大队政治委员（至1945年2月）。1942年3月至1945年2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神府分区委员会书记。1942年9月至1945年1月，兼任神府县第二届参议会议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7年12月，任中共晋绥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晋绥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1946年4月至1947年12月，兼任中共兴县县委书记。1947年12月至1949年7月，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1949年3月至5月，兼任榆林军分区政治委员。5月至6月，任陕北军区榆林军分区政治委员、临时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7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共甘肃酒泉地委书记。1949年8月至1952年3月，兼任甘肃军区酒泉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9月至1952年3月，任中共甘肃省酒泉军分区委员会书记。1952年11月至1954年9月，任甘肃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副书记。1953年3月至1954年5月，任甘肃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5月至1958年9月，任玉门油矿党委第一书记。1956年至1964年8月，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1957年10月至1959年3月，任中共甘肃省玉门市委书记兼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1958年11月，兼任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3月至1961年11月，任中共甘肃省玉门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1年6月至11月，任中共甘肃省玉门市人民武装部委员会书记。1962年1月至1963年8

月，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大庆油田发现以后，顾全大局，组织力量支援大庆石油会战。在玉门工作期间，作风扎实、联系群众、一心为公、平易近人、十分廉洁，从不搞一点特殊化，工余时间和职工群众同娱同乐，打成一片。他的优良作风培养了一大批好干部。1963年9月至1970年3月，任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为石油工业培养大批人才。“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3月至1980年2月，担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治委员。历任辽河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中共盘锦地委书记、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至1983年，任石油部办公厅顾问。1983年，任石油工业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同年离休。1985年1月，任石油工业部离职离休干部第一支部书记、石油部老干部局党总支委员。1987年9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玉门市第二任市委书记——程浩 (1961年11月至1963年9月)

程浩，原名刘书绅，男，汉族，陕西临潼人，生于1923年6月30日，家庭出身中农，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38年11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任陕西临潼栎阳小学党支部宣传委员、党支部书记、青救会主任、地下党栎阳区委、三原中心县委、临潼县委

联络员、陕甘宁边区青年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于1949年7月至1952年10月，先后任共青团西北工委常委会秘书、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军体部副部长、兰州炼油厂筹建处负责人之一。1952年10月至1957年10月，任玉门油矿党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10月至1961年10月，先后任中共玉门市委（油矿党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玉门市委党校校长、玉门市科委主任。1961年11月，任中共酒泉地委书记处书记兼玉门市委第一书记。1963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甘肃省委工交部副部长、代理中共兰州市委工业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文革后期恢复工作。1973年5月至1978年10月，先后任甘肃省第七工程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甘肃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兼甘肃省建筑职工工程学院院长，甘肃省石化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10月，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化局局长、党组书记，银川化学工业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宁夏化工厂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指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石化总公司董事会董事，中国石化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1989年离休，现住银川市。

程浩同志在组织领导宁夏化工厂的建设中，在我国大型重点工程中第一家实行招标承包制，节约工程费用5411万元（不包括设备和材料费用），比同类型工程提前七个月建成，工程项目被评为优质工程，顺利通过了国家竣工验收。

玉门市第三任市委书记——白云亭 (1963年9月至1964年11月)

白云亭，男，汉族，陕西清涧人，生于1907年8月，家庭出身贫农，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自幼在家务农，1934年5月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至10月，在清涧县二郎山乡任村党支部书记。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在陕西特委技术处文书科当油印员。1935年10月至1938年3月，在中共西北办事处文书科当油印员。1938年4月至8月，在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1938年9月至1943年3月，在陕西省安塞县一、七区任区委书记。1943年4月至1946年11月，先后任安塞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6年12月至1948年6月任，山西省永和县县委组织部长。1948年7月至1949年5月，任山西蒲县县委书记。1949年6月至1951年8月，任甘肃省西河县委书记。1951年9月至1952年，在甘肃省临泽县任县委书记。1952年9月至10月，在西北石油管理局俄语训练班学习。1952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玉门油矿党委组织部长。1955年1月至1956年8月，在中央西北第二中级党校学习。1956年9月至1957年4月，任玉门市监察委员会负责人。1957年4月至1959年4月，任玉门市副市长、市委常委。1960年7月兼任玉门市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11月至1963年6月，任中共玉门市委副书记、玉门市市长。1963年9月至1964年11月，任中共玉门市委书记。1965年12月至1980年8

月，任中共酒泉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副专员。1980年9月经省委批准离休，享受正地级待遇。

玉门市第四任市委书记——鲁愚 (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

简介见前

玉门市第五任市委书记——张朝干 (1970年9月至1974年10月)

张朝干，男，汉族，安徽省临泉县人，生于1928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八日），高小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幼年因家境贫穷，随父母移居山东枣庄，读几年私塾，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1946年6月，枣庄解放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野战军二纵队警卫营二连任战士、副班长宣传员，后调独立团二营六连任文化助教，以后又调一八三团任文化干事、教员、副政治指导员，后又调到六十一师炮团任政治处宣传干事、俱乐部副主任、宣传股副股长，后担任军士教导连政治指导员。1955年调一八一团任政治副教导员、教导员、政治协助员等职。1965年10月，调玉门市武装部任副政委，后任政委。在此期间，于1968年3月至1974年9月，任玉门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玉门市委书记。1981年4月离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4862部队胶州干

休所休养。

张朝干在玉门担任主要领导期间，联系群众，爱护干部，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品质赢得了玉门人民的敬佩。他解群众所难，积极推广工具改革，亲自督战机具厂制造小皮车底盘、架子车，减轻了社员平田整地的劳动强度。他大力提倡养猪、改良畜种，繁育大骡子大马、秦川牛，检查生产徒步走在最前面。

玉门市第六任市委书记——罗世秀 (1974年10月至1984年12月)

罗世秀，男，汉族，家庭出身贫农，大专文化程度，1940年2月2日，生于酒泉市总寨镇沙河村。1955年6月25日，在总寨学校读书时由冯国俊、闫瑞隆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8年10月，在总寨公社参加工作，同年12月25日在总寨公社由张国顺、杨学存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西店区沙河乡文书、沙河乡合作社会计、团总支书记、总寨公社会计、监委干事、秘书、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在此期间，即1971年6月，为酒泉县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并被选为县委委员。1973年6月，任酒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1974年9月，任中共玉门市委书记。1984年9月至1985年12月，在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西北农学院学习。他在玉门任职期间，作风扎实、深入一线，用自己的实干精神影响干部群众。1986年4月调任酒泉

地区农建指挥部总指挥。1992年8月，调任甘肃省疏勒河管理局筹建处常务副主任。1995年4月，任省疏勒河管理局第一副局长。1998年任疏勒河管理局调研员。

烈士简介

翟贵同(1925 ~ 1950)又名翟凤桐，山西省保德县人。194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二十五团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25日随军解放玉门后，留守地方，任玉门县保安队队长，是年任酒泉军分区独立营二连连长。

1950年1月16日，翟贵同率骑兵排从玉门镇出发，进山剿匪，行至祁连山下黑崖子戈壁滩时，与土匪70多人相遇。他当即指挥部队，与土匪展开激战，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1950年9月，玉门县民众为翟贵同建立了纪念碑。

王开义(1937 ~ 1962)，玉门市黄闸湾乡黄花营村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参军，在新疆军区7969部队炮兵连任战士。1962年10月20日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因病去世。1963年被7969部队批准为革命烈士。

曹福合(1956 ~ 1978)，玉门市黄闸湾乡北湖村人。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军，在新疆军区36003部队维修连任战士。1978年12月30日驾驶汽车在新疆和静县执行任务时，发生意外事故牺牲。1979年由新疆军区36003部队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汉林(1947 ~ 1969)，玉门市清泉乡中沟村人。1966年参军，在新疆军区8138部队任副班长。1969年3月9日在新疆于田县执行

任务时牺牲。1969年由8138部队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赵占有(1926~1952)，玉门市昌马乡人。1952年在本乡西湖青山子剿匪中牺牲。同年12月区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高金玉(1933~1959)，玉门市柳河乡蘑菇滩村人。1956年参军，在兰州军区骑兵三团三连任战士。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4月29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班马县剿匪战斗中牺牲。同年被兰州军区批准为革命烈士。

雷来有(1936~1959)，玉门市黄闸湾乡北湖村人，共青团员，1954年参军，1959年在新疆军区执行战斗任务时，因患急病病故，同年被新疆军区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王天祥(1928~1954)，玉门市黄闸湾乡北湖村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4年在朝鲜新坪战斗中牺牲。同年被志愿军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永瑞(1932~1953)，玉门市花海乡先进村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3年在朝鲜病故。同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长虎(1928~1953)，玉门市下西号乡川北镇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一军七师二十一团九连任战士。1953年6月25日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上蒲坊战斗中牺牲，是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刘学贤(1937~1957)，玉门市下西号乡西红号村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参军，在兰州军区任战士。1957年7月在青海省玛曲县果洛尼格村平息叛乱时牺牲。1958年被西北军区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国家表彰的先进人物

姓 名	称 号	时 间
王曰才	全国劳动模范	1950年
郭孟和	全国工业战线劳动模范	1951年
黄金洪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5年
尚有兴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5年
郭秉善	全国邮电系统先进生产者	1956年
蔡炳东	全国石油工业先进生产者	1956年
陈 刚	全国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	1958年
车志壮	全国劳动模范	1957年
薛国邦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王进喜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孙德福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张增悦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董 全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朱立泰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彭佐猷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李生福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黄运生	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刘公之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朱洪昌	国务院先进生产者	1959年
田文宽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9年
王淑银	全国优秀民兵	1964年
魏然花	全国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	1965年

ISBN 978-7-5098-4161-7



9 787509 841617 >

定价：50.00元